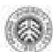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

■ 林毅夫／著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法国奥佛涅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目前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多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担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等重要社会兼职，是国内外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十几家海外英文杂志的匿名审稿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 林毅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林毅夫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7-301-07752-1

Ⅰ.发… Ⅱ.林… Ⅲ.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Ⅳ.F1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3080号

书　　名：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著作责任者：林毅夫　著

责任编辑：张　燕

标准书号：ISBN 7-301-07752-1/F·091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em@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278千字

2004年9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总　　序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是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年前在北京大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6位增加到现在的24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10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作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有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10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这次，借10周年庆祝之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整理、汇编成册，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领导汇报这10年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10年只是一瞬；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10年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10年前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4年9月

目录

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携手前进、共创双赢

——在北京大学与萧万长先生和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访问团座谈会上的欢迎致词

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

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应该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

外贸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农民与消费者的影响

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

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发展

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

关于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意见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促进农村发展的几点战略和政策思考

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再与布朗谈粮食

——对布朗就世界粮食最高单产水平和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观点的评论

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经济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评世界银行新的“惠及贫困人口的农村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

前　言

回溯160多年前，鸦片战争炮声既起，悠久的古代中华文明辉煌不再，百年屈辱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放眼今朝，改革开放号角正劲，炎黄子孙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旷古奇迹：一个伟大文明由盛而衰、由衰再兴的奇迹。自1978年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改善了资源在产业和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GDP和人均GDP分别以年均9.3%和8.1%的速度保持了25年的增长，而且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很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和世界经济史当中任何经济体的发展绩效相比，尤其是和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绩效相比，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以如此之高的速度保持如此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绩效是怎么称颂也不为过的。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围绕中国经验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我本人有幸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了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国进行经济学研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时时鞭策我辈努力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而改革开放的大潮，也为中国的经济学人提供了他人难以比拟的研究土壤。1980年末以来，我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发展经济学杂志》、《美国农业经济》、《经济

发展与文化变迁》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汇编在《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以及《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两本书中，在国内出版。尔后我和蔡昉教授以及李周教授合作，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重点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些研究的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增订版，以及《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这两本书还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韩文版、俄文版等多种版本。

除上面提到的这些论文和著作以外，我还始终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坚持用严格的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发表在国内的经济学期刊，有的是在一些研讨会上的演讲，有的是研究简报。为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这些观点，承蒙有关杂志社同意，我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以期引起对这些问题的更多的社会关注，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表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内在的联系。只有把握住这些联系，对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各种问题的分析和认识才能够到位。多年来，我自己正是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内认识和分析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为了介绍各篇文章的观点，首先介绍我一以贯之的逻辑框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和政府发展战略。

一、我的发展观

既能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根据我在一项研究中收集的资料，世界105个国家和地区按照1999年的人均GNP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高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2）低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3）低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都属于后两者之一。(1)

理解经济绩效的差距，关键是理解各国政府所奉行的长期发展战略。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来就是举足轻重的。正如巴罗和撒拉伊马丁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影响长期增长率，政府的行动可对前面我们强调的生活水准造成重大后果。作为推论，政府政策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乃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优先领域。"(2)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少、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各国（各地区）奉行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

由这些战略所内生决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那里找到原因。

20世纪的人类经济史，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经济史，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能清楚地说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初处于领先地位的阿根廷、乌拉圭等一些南美国家，到20世纪末期辉煌不再；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到现在则跃居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而发展起点和东亚经济体大致相当，甚至高于这些经济体的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绩效平平、未建殊功。

多年的研究和观察，坚定了我的发展观：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经济体的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确立适合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才能够使国民经济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增长，才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的利益。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和蔡昉教授以及李周教授合作，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增订版中，以一个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给出了一个内生的解释。按照我们的观点，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赶超战略，内在地要求形成一套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价格体系、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进而使得技术效率低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导出的必然的逻辑推论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入手点，是放弃赶超战略，确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始终顺应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决定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在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之下，相应改革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另外，由于放弃赶超战略、建立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是朝夕之功，所以，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1999年我和谭国富教授合作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论文，后来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1999年5月号上。在该论文中，我们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2001年5月我以“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为题，应邀在芝加哥大学做了“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的首讲。后来该演讲整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上。在该演讲中我正式定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核心，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基础。自生能力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

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与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相类似，自生能力概念强调了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分析中被广为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大量旨在实现进口替代和技术赶超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说在分析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时忽略自生能力问题还不至于造成多大误导的话，在分析发展中经济时忽略自生能力问题，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为快速追赶发达经济，建立了许多资本密集度超越于自身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由于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因而就没有竞争能力。这种状况在我国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为此我曾经在《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一文 (3) 中大声疾呼：“千改革、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是第一条。”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是解决我国改革诸多深层次问题的第一位的必要条件。

归结起来，我认为，任何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都内生决定于从长期来看会变动，但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是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任何经济体都必须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原则确立其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惟其如此，整个经济体中的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体的资本才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提升，技术才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得到改进，人民才能够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就是我赖以分析各种问题的发展观。我自己以及我指导的学生围绕根据这个逻辑框架归纳出来的各种可检验的命题进行的实证工作都表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和国际国内的经验事实相容。 (4)

本书第二个专题“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中收录的三篇文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对我的上述发展观的详细阐述。

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这个基本框架内，我还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侧面分别探讨了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文章收在本书的第三个专题“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中。本书的其他几个专题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这些讨论都是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写于1998年，主要讨论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尤其是21世纪的前20—3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以及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就增长潜力而言，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增长的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高风险、高资本投入和低成功率；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必须自己研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其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在技术进步的成本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等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较快的技术进步。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近40年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也维持了近40年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发展道路。考虑到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大于日本在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中国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潜力，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当然，要使经济增长的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克服多方面的问题，譬如经济波动、金融体系的安全隐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地区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三农”问题等。克服这些问题的关键入手点，是改变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立适当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是我为2002年5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亚洲发展银行“亚洲·2015”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快速发展前景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会对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成本、进出口贸易等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任何威胁，相反会有力地推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

三、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这个专题的六篇文章是对我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补充，分别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因素入手，探讨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主要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

原动力，而技术创新不等同于发明，创新侧重于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与生产者现在实际采用的技术相比较，而不是与世界总体的技术水平作比较。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从而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同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并引进适宜技术，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一些资本密集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产业区段，则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积累率，更快地提升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引进技术不仅不会永远落后，而且会推动整个经济的总体产业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当然，引进技术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主研发，在国防安全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退出的产业中的技术进步，都需要发展中国家进行自主研发；同时，引进的技术也需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制度至上的观点则是不可取的。文章《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批评了这种观点。作为制度至上论的一个代表，杨小凯教授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相对困难。他认为，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后发国家具有“后发劣势”，要克服“后发劣势”，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再来进行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在杨小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现在改革很成功，尽管俄国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是由于中国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为何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5) 然而，印度、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证表明，宪政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另外，日本发动二战的原因在于其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出现金融危机是由日本经济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苏联经济增长由快变慢是因为其推行了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赶超战略；具有“最先进的宪政体制”的英国现在也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内生的，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任何时空条件的最优制度结构，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的生产方式内在决定了最适合的制度结构；并且，制度结构是复杂的，不仅包括

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二者之间相互制约，因此，制度变迁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即使我们接受宪政改革必须先行才能保证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观点，共和宪政体制也不会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更迭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因此，只能是一面利用和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一面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俄罗斯“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绩效差异一目了然。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这种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其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按照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出现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日本经济的腾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为“后发优势”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作为一个企盼中华文明早日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学者，我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论著中惟一的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文章。五四以后，不仅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批评儒家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而且凡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样对儒家文化有很多抱怨，但二战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振兴，有人又将其归功于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岂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物层次，即国家、社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第二是组织层次，即如何组织和协调社会里面的个人，让他们共同生活、互动。它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第三是价值观念的层次，人的行为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好坏之间，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反思和艰难的现代化努力。那么，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这三个层次的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马克思则认为，器物层次的文化即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组织、价值观念层次的文化即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相应变化，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则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我倾向于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对落后国家而言，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的问题；其二，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上层建筑有没有能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不断被赋予新生命、新内容的问题。

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儒家哲学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的学者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使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调整，从而使得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能够一致。展望21世纪，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如果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国就能够利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继续保持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会随之复兴。

“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命题是经济发展理论无法回避的，我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一文中提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可能将产权明确划分到个人，并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所有者对产权稳定的预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促进产品和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推进技术进步。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分析的是与老龄化社会有关的人口政策问题。人口政策包括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两个方面。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的质量和工作能力，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在人口数量方面，我认为应该重新评估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因为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是一个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各国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但人口生育率上升一点，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

四、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2001年末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何趋利避害，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挑战与机遇》与《应该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两篇文章给出了我的回答。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加入WTO将推动体制改革的深化，有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为了阐述我的观点，首先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但是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

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受到削弱是因为资源会被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以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会被高估，而阻碍了出口。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属于这种情况。与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也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出口利润也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存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政策支持。这样国家的外汇储备会非常有限，甚至积累很多外债，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这样一个认识基点出发，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分析加入WTO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农业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将近70%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对中国不具比较优势的粮食这种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由于有进口配额的保护，影响不大。重要的是如何让劳动力密集的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养殖品、农产品加工品等，充分利用加入WTO带来的空前的发展机遇。所以，WTO对我国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适应新的形势，快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同时，除了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之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在制造业方面，不少人士认为，加入WTO之后我国的企业将面临国际大集团、大公司的激烈竞争，要使我国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大集团和大公司。但是我认为，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制造业行业，恰恰是那些资金高度密集的行业，譬如汽车行业和电信行业。这些行业违背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没有自生能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长期以来依靠国家采取的高关税、限制市场进入等多种扶持手段生存。加入WTO之后这些保护措施将渐次取消，这些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无疑将面临挑战。但是加入WTO会促进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因此，为了利用加入WTO的机遇，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快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首先，对于业已建立的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如果产品容量很大，可以用市场换资本的办法，吸引外国资本，以降低资本成本，提高竞争力；如果产品市场前景看淡，那么就应该转向劳动密集产业。其次，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吸收农业和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降低WTO对农业的冲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加入WTO也将对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应对不当将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资金实力、服务网络、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工具和产品种类等方面，都具有国内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最大的潜在影响是，有可能出现国内金融机构业务向外资机构的大转移。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内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样的潜在影响，必须利用金融业完全开放之前的缓冲期，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适当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资信水平，从而尽可能避免出现金融业务大转移的局面。

总之，加入WTO既为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我国政府将越来越难于用政府的政策来支持、保护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因此，分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要求我国政府转变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本国经济，进一步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透明的法律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

对外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传统的经验估计方法低估了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贸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文提出，应该分别考虑出口和进口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并考虑出口的直接贡献和出口增长刺激消费和投资活动而形成的间接贡献，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我们将“外贸贡献率”定义为“净出口的贡献率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间接贡献率”，并设立了包括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四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表明，90年代各个年度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接近0.1，即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个百分点。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农民与消费者的影响》讨论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对亚太地区农民和消费者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是世界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地区，粮食需求量十分巨大。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弥补绿色革命的不足，极大地改变本地区食物供需形势，增加本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对该地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但是，生物技术开发对科研能力和资金投入要求很高，亚太地区的一些落后国家自主开发能力不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容易导致没有掌握先进生物技术的农民丧失市场机会，作为消费者得到的福利增进不足以弥补作为生产者遭受的福利损失。同时，要使农民能够利用

现代生物技术成果，需要一定的融资条件。总之，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亚太地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五、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发展模式是否已经过时？如何确定传统产业和信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发展》三篇文章旨在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并不会改变一个国家应该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重要特点是技术变迁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快。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只要传统产业能够利用知识经济所提供的先进信息技术来加强内部管理，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知识经济其实为传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我国企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提供了机会。就信息产业本身在我国的发展定位来说，软件的研究开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而人力资本的差距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加强教育来消除，因此，软件业的兴起使得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中文运用软件上，取得超过发达国家的成就；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如芯片的开发，另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如产品组装，我国仍应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从劳动密集的生产做起，逐步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一文中，就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四点建议：普及信息技术；改善学科设置，我国大学应将基础教育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学生不能只学本专业知识，应重点掌握学习新知识的本领；加强科教结合，促进科研向重点大学转移，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使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使我国高校像国外大学那样处于知识创新的最前沿；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留住国内优秀人才，提高高校师资队伍的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东北三省的发展步伐相对落后于其他沿海省市。为加快东北乃至全国的发展，中央作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但中央的决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

略，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以来的落后，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首先要彻底解决大量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把东北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东北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上。这样东北三省才能利用其资源、人力资本和优良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再次胜出，切忌发动新一轮的赶超。

六、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

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0%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供给。这个专题收录了我关于农村发展、城镇化、粮食问题的八篇文章，反映了我在这几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关于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意见》着重分析如何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水平的问题。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因此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进而内在地要求城乡分割的政策。因此，要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赶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农村的现代化，给8亿农村居民提供上水、下水、电力、道路等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是农村现代化的必要内容。

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促进农村发展的几点战略和政策思考》反映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应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这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其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包括统一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

——是关键。其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其四，为了推动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还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出口，为此，需要通过发展中小银行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如上所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则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农业科技的投入水平，这几个方面都要求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加强农村教育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保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实现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同时应该重视进城农民工的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选择。

与城市化和“三农”问题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粮食问题，即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中国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的问题。我在《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再与布朗谈粮食》和《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三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回顾过去，尽管1959—1961年中国发生过饥荒，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粮食问题始终没有出现大的问题。1978年以后，在人口不断增加，而耕地锐减、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条件下，中国却能够实现粮食产量持续增长，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中国过去成功养活自己的关键在于粮食单产的大幅增长，这应归功于现代要素的投入增加、现代农业研究系统和支持系统的建立，尤其是以农业耕作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不仅对粮食的需求会增加，而且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不仅土地，而且劳动、水和其他资源都将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其他更有利可图的农业和非农业产品。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仍然采用粮食自给战略，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否养活自己？1994年以来，美国学者布朗多次提出，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不足以支持未来的人口增长。但我认为，中国未来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从技术潜力看，中国的粮食实际单产与世界单产的最高水平，或者我国的最高试验单产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我国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来增加粮食产量还有很大的潜力。当然，要实现这种潜力，需要政府进行一系列政策改革，包括：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资，提高农业科研人员的待遇，克服造成实际单产和

最高试验田单产之间差距的技术约束；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网络，放开粮价，稳定农地使用权，增加农民采用新技术、提高土壤肥力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政府遵循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放弃粮食自给政策，则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的进程，中国会出口更多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产品和劳动密集、高附加价值的农产品，资源配置的改善将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中国人民甚至会更好地养活自己。

七、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任何发展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专题中收录的四篇文章从发展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经济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了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为他们提供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价格。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遵循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在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快速提升、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相反，如果采取赶超战略，扶持少数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则会扩大人际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和《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三篇文章从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入手探讨了经济发展战略对于缓解贫困、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意义。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中国当前的反贫困形势仍然非常严峻，2003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仍然有2900万，同时已经脱贫的两亿多人口收入还非常低，只要发生疾病或是自然灾害，就会有大量的人口回复到贫困状态。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相对贫困的问题也日益凸现。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首先必须认真分析贫困人口的特点。无论是农村贫困人口还是城市贫困人口，他们惟一拥有的可以获得财富、提高收入水平的资产是他们的劳动力。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城市的失业人口能够重新就业，使得农村人口能够转移到非农产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方面需要融资体制、市场环境和产业政策等各方面的协调；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为贫困

人口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加其利用就业机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建立一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少数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远远没有穷尽这些问题，这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因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与发展战略有关系，而阐明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都需要从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出发，所以这本书中部分文章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之处。但是考虑到各篇文章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在编辑本书时保持了各自的原貌。我愿与所有期待民族复兴的人士一道努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添砖加瓦。同时，收录在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是和我多年来的合作伙伴蔡昉、李周以及我的学生胡书东、刘培林、李永军、孙希芳等合作撰写的，在此感谢他们的支持。这本文集由孙希芳编辑成册，该文集的出版她功不可没。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子女，他们的支持是我能够完成这本文集中的诸多文章的最重要保证。

林毅夫

2004年9月

---

(1) 参见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2003年。

(2) 巴罗、撒拉伊马丁著，何晖、刘明兴译：《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3) 刊登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

(4) 具体可以参见：

（i）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

（ii）林毅夫等："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iii）林毅夫等："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2003年。

（iv）林毅夫等："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v）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vi）刘明兴：《比较优势、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vii）李永军：《我国外商投资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viii）章奇：《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金融结构：国际经验与实证分析》，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5)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 1，No. 2（Nov. 2000），pp.435—491。此文可从http://www.aeconf.net/nov2000.htm上下载。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亚洲经济的未来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1)

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至1997年间，中国GDP增长年均高达9.8%，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期，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8%，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6年的35.2%，从外贸依存度来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也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在这段时间提高了3.6倍，同时有2亿人摆脱了最低贫困水平。这20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堪称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尤其是和同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东欧和苏联国家的经济崩溃相比，这些成就更值得所有炎黄子孙同感骄傲。

中国经济在1997年取得了成功“软着陆”的成就，然而，市场疲软，启动乏力的现象接踵而来，零售物价已连续5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连向来最具活力的乡镇企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重重的局面。虽然中国政府几度下调利率，放宽信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并未达到预定的8%的目标。199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估计也不会好于1998年的情形。

亚洲四小龙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小虎的经济也曾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取得了将近二三十年的奇迹般的增长，但终于在1997年爆发了始料未及的金融风暴，多年的建设成就一下倒退十数年。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远未完成，国民经济中仍然存在许多带有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虽然过去20年的增长成就可称得上是人类经济史上的旷古奇迹，而且，在最近这场横跨亚洲、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独能幸免于难，然而，在1998年和1999年，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欲振乏力的局面。到底这只是短期的调整，并为未来长期、稳定、快速、持续的发展做好准备，还是预示着以渐进方式进行体制变换的改革策略已走到尽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即将终结，渐进改革积累下来的矛盾将会总爆发，而使过去20年来的建设成就毁于一旦，中华民族的复兴功亏一篑？

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

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的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来说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于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各界方家。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于在1997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着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着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1998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自1978年底的改革以来，通常中国政府只要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马上会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1999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将199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主动下调为7%，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全面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2年以前的不到5%，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的15%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1995年、1996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就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账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于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账，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于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

的积极性，企业也就有贷款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不脱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也不愿发放贷款，即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1997年11月起，6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率，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像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于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助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很差。因此，在强劲的外贸需求受制于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而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中的过剩，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人口和收入增长所创造的内需的增长，以及淘汰无效率企业所带来的臃肿的生产能力的消化，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在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因此，目前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这种过剩以及与其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早晚可随着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而烟消云散。

对中国自身、东亚以及世界经济格局来说，更具根本影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萦的强国愿望。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到30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于以下三因素：（1）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3）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

步。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做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差别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的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即便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1/3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已经被证明了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经济的快速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远大于日本于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说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就应该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的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是美国。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5年中国

的人均GNP为620美元，美国为26980美元，只有美国的1/43。中国的人口规模为美国的4.6倍，所以，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在1995年时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10。但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99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92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1/2。在过去这20年中，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只有3%左右。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因此，21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

二、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很大。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8%，为同期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说明了这个潜力的存在。但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恶化，很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崩溃。归纳起来，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六个方面：

1．经济的周期波动。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增长快时，每年的增长率可达13%—14%，增长慢时，每年的增长率则只有3%—4%。从1978年底到现在，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4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四五年就有一个。伴随着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如果这个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那么，这些代价也许还可忍受。但不幸的是，这种波动有波动幅度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心国民经济会不会在这种上下波动中突然崩溃，如果崩溃了，前面所说的到21世纪中叶前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的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2．银行体系的弊病。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据估计，目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的比例在20%—25%之间，和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银行的呆、坏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由于银行业还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当前这场金融风暴。但是，如果呆、坏账的比例继续提高，储蓄者总有一天会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同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3．贪污腐化滋生。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在提高人们积极性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利，换取各种物质利益，而难以被察觉。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横行，扩大了改革后原本就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为某些偶发事件的刺激，使整个社会失去稳定，使经济生活出现极端混乱的局面，使经济发生倒退。

4．国有企业的亏损。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降到现在的1/3左右。但国有企业仍然雇用着中国2/3的城市劳动力，占有中国2/3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19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改革前，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税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补贴成为财政的一大负担，使得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持许多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改善，财政总有一天会背不起这一沉重的负担，而如果许多国有企业同时关闭、破产，城市里将出现大量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社会稳定将成为问题，经济的发展也将变得不可能。

5．地区差距的扩大。改革初期，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1985年以后，地区和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已经比改革前的情况还严重。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对政策产生不同的需求，东部期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集权。因此，中央政府难以制定和实施让大家都满意的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也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于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东部地区打工。据估计，目前农民工的人数已达8000万到1亿之间。在经济发展得较好的时期，农民工给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农民工也大多省吃俭用，将收入汇回老家，成为中西部的资金积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6．粮食生产的问题。“无粮则不稳”是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1978年底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粮食生产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政府有信心将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城市。1984年以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的情形。但是，今后中国对粮

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于以下几方面：（1）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比目前增加30%。（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对肉类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类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之一，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最近有些研究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每年大约需要进口2—4吨粮食，而现在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才2亿吨。因此，有人担心，届时中国把世界上的贸易粮食都进口了还不够，而且，如果中国把世界上的贸易粮食都进口光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将会因此而出现饥荒。

在展望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上这六个问题，任何一个恶化了都将造成社会不稳，更何况，这些问题有可能交织在一起总爆发。到底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是怎样？是如乐观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还是因为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爆发类似1997年以来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国民经济突然崩溃，而使民族复兴的努力功亏一篑？

三、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就像俗语所说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任何一个时代，即使从后来的回顾来看属于黄金时期的时代，也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关心时局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能否洞悉问题的根源，以及整个社会是否在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前节中所归纳的6个问题看似很复杂，其实，都和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造成经济体系内部的制度不配套有关。而经过了20年的改革，还不能将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彻底解决的原因，则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找到出路，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中的一些扭曲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建设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

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不利于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于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剩余主要来自于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难以投资大型项目。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农业经济的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来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出现全面短缺，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掌握企业的剩余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对微观经营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也产生了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所要解决的就是生产积极性低和产业结构失调的问题。苏联、东欧的改革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两个问题。但和苏联、东欧采取休克疗法意图将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扭曲在短时间里全部解决不同，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针对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微观经营严重缺乏活力的问题，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为了落实微观经营单位的自主权，改革然后才逐步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层面。这种改革策略避免了发生如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所带来的经济崩溃，而且，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但这种渐进的改革也使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不配套，由此产生了前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在所有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中，最为滞后的是利率政策的改革。银行的利率尚被人为控制，名义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因此，每当出现高通货膨胀预期时，真实利率就不断下降，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着下降，导致投资贷款增加、储蓄减少，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拉动的过热。反之，当通货

膨胀预期下降时，真实利率就不断升高，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着上升，投资贷款减少、储蓄增加，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下降的过冷。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而忽冷忽热，上下波动。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就会随着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变动而变动，自动调节投资和消费的行为，成为国民经济的稳定机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并把“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作为1993年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改革的首要目标。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生存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4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8万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间的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利率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为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只好被搁置。

同样，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比例高，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差，还不起贷款，结果，贷出去的款也就变成了呆、坏账。

经济生活中贪污腐化的横行，也是因为政府对利率和某些商品价格的低价控制，使得市场价格和官订价格之间存在价差，成为掌握这些廉价资金和资源的官员手中的一种可以依其意愿而分配的、某些企业和个人可以不劳而获的“租金”。在1994年，单单银行的低息贷款一项所存在的租金总数即高达4000亿元，为了获得这笔租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都会开展无孔不入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又低得不足以养廉，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要政府官员不为所动也难。而维持低利率和某些产品的低价政策，同样是为了使已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和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有关。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比较优势，东部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的优势则在资源产品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加速重工业的发展，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和主要矿产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在逐步放开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压低。东部发展越快，一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从中西部拿到的低价补贴也就越多，相当于由较不富裕的中西部来补贴较富裕的东

部。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在粮食供给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人多地少在我国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事实。只要政府给予农业科研足够的重视，并给予农民足够的价格刺激，在过去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中国的农民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在未来依靠现代技术，中国的农民生产足够粮食养活中国人的能力应该不容怀疑。但问题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低工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的价格也就难以放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粮食供给在中国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彻底所致，改革难以彻底的原因则在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问题则在于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如能源、交通）的价格依然被人为压低；（2）传统低工资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沉重的职工养老和各种福利负担；（3）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为了解决城市里的就业问题，经常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方式，因此，冗员问题严重；（4）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其存在是出于政府的战略考虑，其生存有赖于传统体制下的各种扭曲的保护。

政策性负担的存在造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使得人们无法客观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使得国家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信息指标，国有企业可以把各种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政策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因此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硬化。在企业预算软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放权让利的改革在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也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减弱。

取消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优劣，并根除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借口，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国有企业没有政策性负担时，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这样就可以放开银行的利率和各种物价，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就能得到缓解，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企业效率的提高，银

行的呆账、坏账比例就会降低。各种以行政力量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行为的减少，将使寻租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对贪污腐化问题的存在，可产生釜底抽薪之效。同时，政府也就可以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地区差别和粮食问题将得以缓解。

五、把握千载难逢之机，改变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民族曾经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维持了一千多年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地位。可是，在欧美发生了工业革命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救亡和图强成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上个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开始，各种思潮、运动风起云涌，然而，直到本世纪的最后这20年，在改革开放大旗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中国的落后源于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落后，因此在1949年，迎来全国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以后，政府采取赶超型的发展战略，动员全国力量，加快步伐去建立一批资金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冀图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这是一百多年来救亡和图强愿望的体现。然而，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这批先进的产业缺乏自身的生命力。依靠宏观政策扭曲的保护和行政手段的资源动员把这一批产业建立起来，使中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发射卫星、试爆原子弹，固然让中国人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但是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和对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挫伤，最终导致这种发展战略以失败告终。

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一个国家的技术、产业结构的总体发展水平，其实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的水平，也就是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程度。一个国家要在技术、产业结构的总体发展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先在资源禀赋结构的水平上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于一个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亦即利用其劳动力相对丰富的优势，多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增加社会的剩余，加快资金的积累，提高资源禀赋结构的水平。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改变，以小步快走的方式，不断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快速、持续的增长，实现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略思想，这种发展模式可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思想。

经过最近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改革还未最终完成，传统的赶超思想还深植人心。一个国家

的经济体制内生于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改革能否最终完成，中国经济能否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实现稳定、快速、持续的增长，在走出新的一千年时，实现一百多年来重新崛起的愿望，当政者能否从赶超的战略思想转变到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关键。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1998年第19期。1999年9月27日至29日，我受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球财富500强论坛”，并以“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为题做主题发言。后来本文发表于《中国外汇管理》2001年第2期。

携手前进、共创双赢 (1)

——在北京大学与萧万长先生和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访问团座谈会上的欢迎致词

尊敬的萧万长先生、尊敬的迟惠生校长、尊敬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代表们：

在这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五月，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代表北京大学欢迎来自台湾地区的乡亲。我也很荣幸能在这个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和诸位乡亲共同探讨两岸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和合作的可能性。

今年是21世纪的第一年。回顾20世纪的最后22年，中国进行了一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6%，是同期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4.6%，2000年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进口总值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成为全世界最为开放的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改善了国内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对东亚及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7年爆发东亚金融危机，中国是惟一货币没有贬值的东亚经济体，而且在1998、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维持了7.8%和7.1%的高速增长，成为东亚经济稳定的基石和迅速复苏的动力。

当然，在这一个新世纪的起始之年，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对这一点，我个人相信中国有可能在未来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维持8%—10%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在2020年左右赶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升级是关键的决定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后发优势，也就是可以利用引进的方式，廉价而快速地获得技术升级。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80年代末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则从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同样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的奇迹靠的就是后发优势。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利用和发达国家技术存在差距的这个后发优势。在1979年时中国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总体差距比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差距大得多，如果利用好后发优势可以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至少也可以有40年，甚至50年或更长的快速增长的潜力。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才22年，因此，中国至少还有可能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权威国际机构预测中国会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然要实现上述增长的潜力，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及良好的资金积累和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和创新的机制。

与祖国大陆一样，台湾地区经济在20世纪后半叶也有傲人的成绩，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也越来越平均，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功典型。我个人在祖国大陆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是从总结台湾地区发展经验而得来的。我对台湾地区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也同样充满信心。我相信台湾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年内超过美国。1999年台湾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12333美元，美国当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为29340美元，台湾地区为美国的42%。新加坡在1979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70美元，美国为10140美元，新加坡为美国的41%，但到1996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0590美元，美国才为28390美元。新加坡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41%，到超过美国，只用了17年的时间。同样，日本在1970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940美元，仅为美国4770美元的40%。到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1470美元，已超过美国的18500美元。日本用的也只有18年的时间。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相同，日本人、新加坡人在十七八年内能做到的事，我们台湾人没有理由在20年内做不到。

当然，上面谈的仅是潜力，要把潜力变为现实，台湾地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内部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外部必须要有和平的

环境；经济上必须有产业上的不断升级，因劳动力价格上升而失去优势的产业必须能够适时向外转移；稳定的而且不断扩大的产品市场。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验印证，祖国大陆是台湾地区产业转移的最好地点和产品的最好市场。

经过14年的艰苦谈判，中国应该可以在今年之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加入世贸组织后祖国大陆的市场会全面对外开放。由于祖国大陆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跨国大企业都视祖国大陆为21世纪最有开发潜力的一个大市场，都跃跃欲试，唯恐落人之后，而失去在祖国大陆大展宏图的良机。台湾地区要实现在未来20年内人均生产总值超过美国的目标，必须在祖国大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在祖国大陆学界工作的台湾子弟，我能为台湾乡亲做的只是在各种场合进行一些呼吁。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祖国大陆市场开放的机会应让台湾地区的企业充分分享。今天我利用萧先生来访的这个机会再次做两点呼吁：

1．两岸同属中国人。台商到祖国大陆应该享有中国人的待遇：凡中国公民可以合法投资的行业，台商都可以投资；凡中国公民可以合法经营的企业，台商都可以经营。

2．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过去许多不准外资进入的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以及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业，将允许外商合资或独资经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凡在入世协议下允许外商投资经营的行业，应优先开放给台商经营。

今天在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起始的年份，回顾过去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除了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这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文化、经济最为繁荣昌盛的国家。展望未来，如果两岸能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祖国大陆经济实力有可能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赶上美国，台湾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有可能在20年里赶上美国。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重新腾飞，两岸的中国人会有能力和智慧携手前进，共创双赢。今天萧先生和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诸位乡亲不远千里而来，让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心。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1年第27期（总第249期）。

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未来 (1)

一、前　　言

要探讨中国的发展对未来亚洲的影响，我们需要简短地回顾一下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从1978年底到2001年的23年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9.5%，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5%。 (2)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3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7倍，对外贸易增长了24倍。现在，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七；若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二。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这几年，中国也为其他亚洲国家作出了不少贡献。比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压力保持了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而有助于避免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竞相贬值该国货币，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早日恢复作出了贡献。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但是中国还仍然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正如表1所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发展指标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水平接近。

考虑到日本曾经在整个20世纪60—80年代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同样也具有保持较高发展速度的潜力。众所周知，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中国还只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可以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这种低成本的创新方式来推动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正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60—90年代所做的那样。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20年乃至30年里保持GDP平均每年增长7%—8%的经济增长速度。 (3)

表1　中日主要社会发展指标比较

	中国		日本	
平均寿命	女	男	女	男
（单位：岁）	72	68	72.9	67.7
	（1998）		（1965）	
婴儿死亡率	31		30.7	
（每千人）	（1999）		（1960）	
第一产业	15.9		16.7	
占GDP的比例（%）	（2000）		（1959）	
城镇地区的	39.2		38.8	
恩格尔系数（%）	（2000）		（1960）	
人均用电量	1071		1236	
（kwh）	（2000）		（1960）	

数据来源：关志雄（Kwan，C. H.），《克服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2002年4月22—23日，在东京召开了由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研究所组织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现状和未来”研讨会。《克服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是原文作者向大会提交的论文。

然而，这只说明中国具备这样的增长潜力。要充分发挥这一潜力，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中国需要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以改革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既要缩小城乡差距又要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稳定。(4)

除此之外，要使中国的发展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中国还需要推行正确的发展战略。这一点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5) 在1978年以前，尽管当时中国具有同样的发展潜力，但是中国却没能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推行了错误的发展战略。正确的发展战略，在我看来，就是要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中国具有丰富而低廉的劳动

力。因此，为了充分地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利用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巨大的技术差距，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部分。

同时，中国还需要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以利于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国的入世加速了其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根据协议，中国将降低关税，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赋予外国企业到国内进行投资、贸易和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市场准入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将在降低了的关税水平上，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完成。因为这些措施将大大减少中国政府对于国内企业的支持和保护，从而可以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保证中国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经济。(6) 不仅如此，中国的入世还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同东亚经济的融合。

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1980年—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2.6%；同期，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13.3%。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到了中国贸易总额的55%—60%。(7)

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加快，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现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将推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两个论据的基础之上。一个论据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将促进中国的出口，从而挤占东盟国家的国际市场份额。一些人甚至认为随着IT技术的发展，中国甚至有可能挤占日本和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的份额。持这一观点的另外一个主要论据是：由于中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可能会吸引大部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锐减。(8)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情况。20世纪80年代，每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仅20亿—30亿美元。1992年这一数字陡然上升。到1993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每年吸引45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世界上也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图2

里，黑色线表示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位于下方的灰色线表示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投资，包括由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提供的投资。尽管官方投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而，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资本却在1991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也正是在1991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增加。从图1和图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90年代迅速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国际上私人部门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实际上，自1993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流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流入中国的资本越多，流入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本也就越多。另外，流入祖国大陆的资本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而流入东盟国家的资本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而且其投资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多于美、日在华的投资。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通过抢夺别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的。

其次，从劳动力成本方面来说，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很低，平均而言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50。然而，中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尤其是在制造业，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25以及日本的1/26。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将劳动力成本进行分解，那么美国每生产1美元产值所需的工资成本仅比中国高1/3。同时，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相对而言是很低的。在2000年，中国的平均增加值仅26%，大大低于美国49%和日本43.6%的水平。(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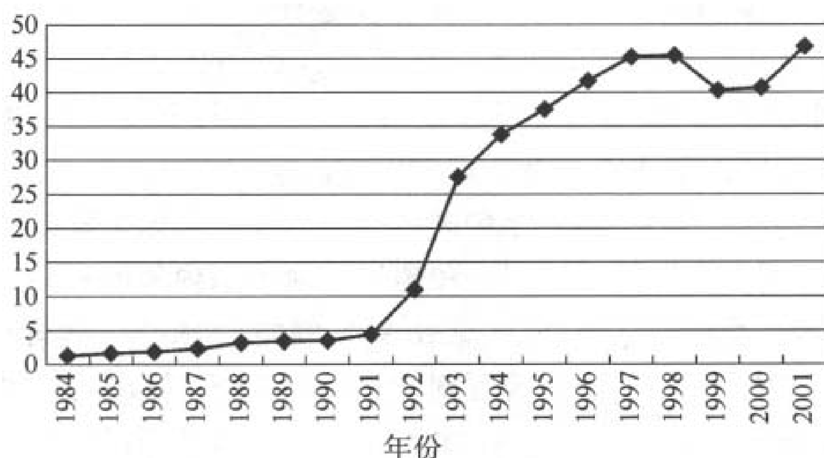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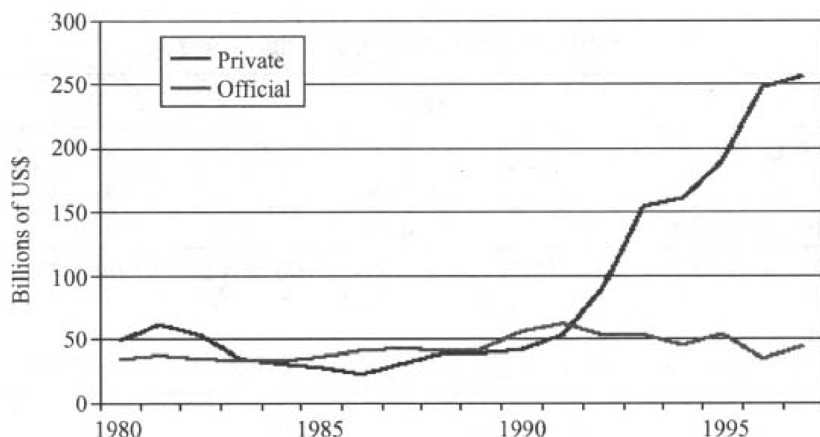


图2　Long-term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资料来源：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1998.

此外，中国的各个行业在技术上主要依靠引进，没有多少行业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主要是靠加工型企业。实际上，中国55%的出口是来自于加工型企业。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出口的增加，中国的进口也会相应增加。平均来说，中国出口每增加100美元，中国就需要增加50美元—70美元的进口。因此中国的出口越多，中国的进口就越多。在这样一种贸易模式下，中国外贸的增长无疑将会有利于其他亚洲国家。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对亚洲各国出口的增长是慢于进口的增长的。平均而言，出口的年增长率要低于进口年增长率2.5个百分点（参见表2）。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00年中国内地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中存在着顺差，仅有日本和香港地区例外（参见表3）。例如，2000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20亿美元，台湾地区对中国内地的贸易顺差达200亿美元，而东盟国家对华的贸易顺差也达50亿美元。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获得如表中所列数字那么多的顺差。因为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有42%是由中日合资企业生产的。由于日本已经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且在其国内已不具有竞争力的制造工序转移到中国，等到生产出制成品时再从中国进口，因此，在中日贸易中，中国

所获得的收益要远小于图表数据所示。

表**2**　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1980—1999**年）

	出口	进口
总体增长率	13.30%	11.80%
亚洲	12.20%	14.70%
亚洲（不含香港地区）	12.40%	14.8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表**3**　**2000**年中国内地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情况（单位：**10**亿美元）

	贸易总量	中国的出口	中国的进口
总量	474.3	249.2	225.1
日本	83.2	41.7	41.5
美国	75.5	52.1	22.4
欧盟	69.0	38.2	30.9
香港地区	54.0	44.5	9.4
东盟	39.5	17.3	22.2
韩国	34.5	11.3	23.2
台湾地区	30.5	5.0	25.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591—593页。

由于日本以及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许多在本国或本地区不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在中国内地的出口中，合资企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2000年中国内地出口额的50%是由合资企业生产的。IT行业是一个近几年在中国内地发展十分迅猛的行业。去年，其出口占中国内地全部出口的25%。表4显

示了台资企业在中国内地IT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从中可以看出，IT行业的大部分出口是由台资企业创造的。比如，在中国内地，90%的电源插座、85%的扫描仪、72%的光驱都是由台资企业提供的。不仅如此，大多数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对于一些技术更加密集型的产品如笔记本电脑等，其市场占有率却是0%（参见表4）。

表4　2000年在中国内地制造的IT产品中台资企业所占的份额

电源插座	90%
扫描仪	85%
光驱	72%
机箱	71%
显示器	56%
主板	46%
台式电脑	45%
数码相机	42%
笔记本电脑	0%

数据来源：关志雄，《克服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2002年4月22—23日，在东京召开了由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研究所组织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现状和未来”研讨会。《克服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是原文作者向大会提交的论文。

结　　论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改革，努力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因此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其发展还会给它们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将会为它们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同时还会为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便于其将其国内不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相反，中国的发展将会有力地推动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

(1) 本文是我为2002年5月10日于上海召开的亚洲发展银行“亚洲·2015”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感谢陈勇根据我的讲话录音所做的整理工作。后来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和第147页。

(3) 林毅夫：“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1998年第19期。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5)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2003年第51卷第2期。

(6) 林毅夫：“入世和中国的国企改革”，《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入世的反响》（李昆泰、林毅夫、金济中主编），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2001年版，第55—79页。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8) 关志雄：《克服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

(9) 陈清泰（音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动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该文是作者向2002年4月22—23日东京举行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现状和未来”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 (1)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形形色色的赶超战略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做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不得不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优先发展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早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为了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其他产业则将得不到最起码的资本。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成长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少数几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发展，而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的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换句话说，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

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时，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从而利润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业在作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反之，当资本变得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就应该相应变得相对便宜。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有利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取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最为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蓄的倾向也会高。所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总体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最快。

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使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除此之外，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会相当迅速，从而要求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须相应作出迅速的调整。为此，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关于哪些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较优势，以及新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种准公共品。任何企业固然可以出钱出力去获取这种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传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会方案应该是让所有企业知晓。此外，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过程具有规模经济。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应该充当这个集信息收集、处理和分布的职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作为个别企业选择产业和技术时的参考。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需的相关变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由于资金的限制和风险的存在，单个的企业不会在所有领域进行投资，而有时这种投资活动的不配套会导致结构升级的失败。例如，要从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以轻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基础设施及进出口活动等都要有所变化；而从轻加工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同样需要有相应大范围的调整。单个企业是不能胜任这种协调职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决定朝哪个方向努力，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分析，提供引导和支持，帮助单个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作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实现社会上各个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对那些遵循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来说，作为创新者，与任何创

新者一样，它们的创新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表明这个社会的比较优势尚未达到如此高的阶段，或是对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其他企业得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新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价值，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创新企业提供的外部性一定的补偿，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速度将比社会最优的速度慢。

上述的产业政策和赶超战略下的产业政策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相背离的，而上述的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和变化中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19世纪后期德国依靠“铁与血”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常常被作为政府以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这种政策所以成功正在于，当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为英国的60%，比法国还略高，所以，它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钢等产业。二战后，我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最近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遭受更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总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表明，除了赶超战略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条道路，并没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之说，但把它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成功经验，从而把不自觉的行为变为自觉的行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

(1)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1999年第8期。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

自从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其《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一书，竞争优势理论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对世界各国的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对竞争优势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个主要的缺陷是，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往往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看做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或者认为提出竞争优势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比较优势理论。 (2) 本文认为，这种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完全割裂、相互对立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该认识可能引导国家（或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选择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一个以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决策反而会危害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的前景。

为了澄清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必须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进而揭示这种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意义。我们的分析将说明，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

按照上述研究目的，文章的结构相应地划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我们首先对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两种理论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第四部分阐述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意义。

一、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观点

为了研究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对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既然波特理论被公认为阐述该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的讨论自然也就以波特的观点为核心。

在《国家竞争优势》发表之前，波特研究的重点是企业战略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3) 波特将其在企业竞争力领域的研究心得扩展到产业和国家的层面，进而形成了其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认为，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来源通常有如下几个方面：特殊的资源优势（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其他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发展规模经济。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之所以被称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因为：（1）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成功的差异型竞争优势通常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而代表更高的生产率水平；（2）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差异型竞争优势更难被竞争对手模仿，从而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

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企业惟一的选择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因此，一个有利于企业的持续投资和创新的环境是企业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提出的“钻石体系”模型正是对这种投资和创新环境的描述。具体来说，“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参见图1）。它们分别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的生产要素（一般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的质量、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各个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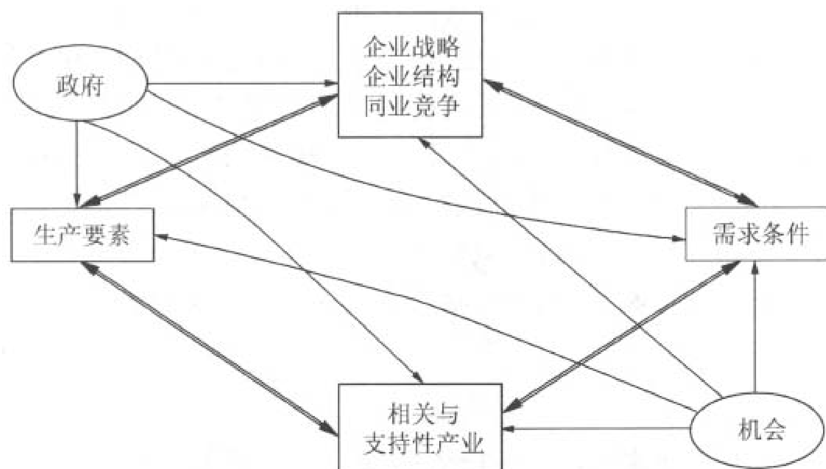


图1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体系”[(4)]

按照波特的分析，形成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一般并不需要钻石体系的全部因素来配合。通常，低成本竞争优势仅仅需要具有足够丰裕的初级生产要素就能够形成。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从而取得成本上的优势是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常见来源。但是，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需要钻石体系中的各种因素相互配合才能够形成。比如，高层次人力资本、专业化的研究机构、优良的基础设施为企业的研究发展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市场上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以及激烈的同业竞争为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压力和刺激；最后，同样拥有竞争优势的供应商保证了设备和原材料的质量。

在上述四种因素之外，还存在两种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两种因素就是政府和机会。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影响钻石体系四种核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达到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另一方面，新的需求、新的技术出现等机会因素则为落后企业追赶先进企业提供了最佳的时机。不过，波特通常认为，在其钻石体系模型中，四种核心因素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四种核心因素的存在和相互配合，单纯政府的影响和机会的出现通常并不会使企业取得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一方面，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另一方面，“政府的影响虽然可观”，但“政府本身并不能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5)]

通过其“钻石体系”模型，波特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在此之后，波特将这一企业竞争力理论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按照波特的逻辑，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使其国民取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则决定于该国企业（或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既然只有发展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才能够使企业获得高层次的生产率水平，那么，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也就同样取决于该国的企业能否获得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了。这样，波特就将其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将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二、比较优势和贸易理论的发展路径

与竞争优势理论的起点不同，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直接源于人们对贸易模式的关注。因此，任何对比较优势理论自身发展过程的介绍以及任何试图对比较优势理论在贸易理论的总体框架中所占地位的评价都离不开整个贸易理论的发展演变进程这个大的背景。

一般来说，人们将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看做比较优势理论的起点。按照李嘉图的论述，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生产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形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但是，从李嘉图理论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的角度看，这些局限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2）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该理论在解释比较优势来源时发生困难。

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种种发展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份额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异方面来寻找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一般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上就是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为蓝本的。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以及因此而提供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里昂惕夫难题”的提出使得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导致两种结果：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通过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而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来考虑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就能够解决难题。这些研究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上述改进基本上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并不满足于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简单改进。他们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条件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其中，两个方向的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其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按照规模收益递增理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来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其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的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

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对于前者，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但是，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它们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具有差异的；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产业方面的生产技术。因此，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二者开发出来的最终产品相同。这样，两个技术能力相同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对于后者，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国际贸易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然后则改变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和标准化的产品。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需要对一个核心的问题进行解释，即为什么新的技术和产品总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研究者一般将研究和发展的能力与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贵且具有非常高失败概率的研究和发展的费用，因此，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开发成功的。

与上述理论相关，研究者也分析了收入水平的差异与消费者偏好进而与市场需求的关系。研究结果倾向于认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特征。这样，当一国的厂商计划进行跨国经营时，它们最有可能进行开发的市场首先应当是与自己的收入水平相当的市场。单纯从这个角度讲，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应当是比较大的。

贸易理论的上述新进展与国际贸易现象的发展是同步的。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然而，20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表明，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占有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这样，贸易理论就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新贸易理论，包括其对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对技术可获得性的分析、对分工和专业化与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不同国家之间市场需求差异的分析等，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另一方面，20世纪中期之后的国际贸易现象表明，不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占全球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并且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主要部分是行业内贸易。于是，新贸易理论又被用来对行业内贸易进行解释。具体来说，人们将行业内贸易划分为同质产品的行业内贸易和差

别化产品的行业内贸易。前者的出现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原因进行解释，比如转口贸易的增加、生产的季节性因素和较高的运输成本等。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差异性产品的行业内贸易。在其解释过程中，规模经济、专业化造成的技术差异、高收入水平造成的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

最后，我们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问题。简单地说，按照已经进行的针对各种对象的计量分析结果，上述理论中的多数理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形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各种理论流派——大体上都获得了支持。但是，结果发现并不存在哪一种解释因素具有压倒性的解释能力，或者说，包括要素禀赋结构、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消费者偏好进而市场需求特征等“新”、“旧”贸易理论所提出的多种解释变量对国际贸易现象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参见Deardorf，A.，1984；Perdikis N.and W. A. Kerr，1998）。

第二，既然实证检验并不能简单地排除某一种贸易理论，人们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一个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将各种贸易理论综合起来构造一个包含多种解释变量的更加一般化的贸易模型。但是，到目前为止，沿着该方向进行的研究工作都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另一种想法就是，不需要对各种贸易理论进行综合，而是将贸易现象划分为主要的类别，并确定对不同类别的贸易现象最适合的解释工具。比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用来解释同等发达程度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或者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两种想法各自拥有自己的支持者。

三、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分别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进行综述之后，现在我们转向文章的核心部分，即对两种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前文已经指出，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往往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看做两个完全对立的范畴，或者认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替代比较优势理论。本文则认为这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误解。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说明该问题：

首先，我们讨论作为一种贸易理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关系。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竞争优势理论所要解释的是企业或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因此，竞争优势理论直接构成一种国际贸易理论。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两种理论的对比放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总体框架之下。

按照波特的阐述，竞争优势理论虽然也讨论“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该理论的重心在于解释企业、行业和国家如何形成“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进一步讲，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种贸易理论，竞争优势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和行业内贸易现象，因而属于新贸易理论的范畴。

第二部分的讨论告诉我们，在比较优势理论（或者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对立的或者相互替代的关系。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6) 由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多因性，我们很难期望仅仅通过一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贸易现象。因此，理论界通常使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两个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而使用新贸易理论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不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行业内贸易现象。这正如我们简单地使用运输成本而不使用更为复杂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或者分工与技术复杂性理论来解释一个大国在其相距很远的两个地点上同时分别进口和出口几乎完全相同的高运输成本产品一样。

另一方面，第二部分也已经指出，贸易理论的各种实证检验也证明了不同的贸易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比较优势理论难以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行业内贸易现象就简单地拒绝该理论。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新”的贸易理论已经发展出来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仍然在流行的贸易理论教科书中牢固地占有主导地位的原因。

其次，我们按照波特的“钻石体系”模型来分析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的四种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方面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都强调生产要素在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力过

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个企业在其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中，必须充分利用该经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才能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所不同的是，围绕“创新”活动这一核心，竞争优势理论更加强调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比如高级的人力资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的重要性。波特正确地指出，“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其创造的途径则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7) 但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的来源只能是企业和整个经济通过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a、1999b）和林毅夫（2002）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相反，如果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该企业就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利润，甚至经营亏损或者失败。此时，整个经济积累经济剩余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用于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数量也必然会减少。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和物质资本的作用是互补的，单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而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本与其配合，高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作用，结果，将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大量往有高物质资本的国家流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脑力外流”的原因就在于此。反之，只有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没有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与其配合，新投资的机器设备也将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力，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最新的技术设备时，无法充分发挥这些机器、设备设计能力的原因之一。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也是不断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

（2）同业竞争方面

波特认为，激烈的同业竞争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增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和研究发展活动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是，对一个特定的行业来说，只有该行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同业间的良性市场竞争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政府决定推动该行业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良性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①赶超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技术方面的优势；②这些企业又不能利用经济的比较优势来形成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两种优势都不存在的条件下，在竞争的市场中，该行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惟一理由就是政府保护措施的实施（林毅夫，2002）。在存在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该行业不可能出现波特意义上的激烈竞争。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赶超的结果必然是行业的垄断。很明显，与通过创新来增加竞争力、改进经营绩效相比，垄断使得企业更容易地取得利润。因此，在垄断的条件

下，行业中的企业所热衷的是通过寻租活动来保护垄断，而不是积极创新。所以，一个国家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3）需求条件方面

需求条件包括多种内容。一些内容更多地属于外生性条件，因此不必进行深入的讨论。比如，对于国家来说，市场规模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外生变量。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选择能够利用这些外生变量的竞争战略。需求条件中的另一些内容则是有可能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整的。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将“内行而挑剔的客户”列为需求条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波特认为，这些客户的存在能够推动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但是，波特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客户会“内行而挑剔”，有些国家的客户则不会。实际上，他似乎更多地将该因素看做一个纯属外生性的条件。不过，我们则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否定该因素的外生性。设想一个行业属于“赶超”性行业，那么，客户就很难去挑剔该行业的产品。这是因为，赶超通常意味着政府的保护。在保护政策存在的条件下，政府的政策总会或多或少地偏向于保护生产厂商而不是客户，这就使客户“挑剔”企业产品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赶超又总是与垄断纠缠在一起。在垄断的条件下，客户进行选择的余地会明显地缩小。两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难以出现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了。

（4）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或者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必须指出的是，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性质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在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首先，如果一个产业不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完全的民间投资就难以持续赢利，进而也就不会有足够的民间投资进入该产业。这样，如果政府选择某个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在某个产业选择违背经济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它就需要利用财政资金直接在该行业建立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向民间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由于国家能够建立的或是能够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总是有限，这样，赶超企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相关和支持性企业来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直接进入或者扶持又必然涉及相关企业的计划协调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计划协调的成本可能会相当高。其结果是，政府宁肯将主要的生产过程都包括在同一个或者为数很少的几个企业之内。这也正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企业经常是一些“大而全”或者“小而全”企业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

下，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或者一个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相反，在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将不断出现，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所出现的产业集群都属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上述四种因素都说明，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或者说，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与必要性条件。波特在钻石体系的第一项中特别强调高级人力资本和研发的重要性，这和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有关。(8) 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质资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新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各个产业中的新产品研发区段。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需要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才能较好的克服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具有高物质资本水平的国家的企业，必须雇用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强调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这是这些企业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和表现。

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讨论前文的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按照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的论述，对国家竞争优势进行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达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不能，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要讨论的最终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a、1999b）则指出，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因此，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种理论虽然都直接地构成一种国际贸易理论，但是，两种理论的自然延伸又都构成一种经济发展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多数都是在某个或者某些产业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国家。(9) 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拥有属于自己国家的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所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低收入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是应该越过低层次竞争优势阶段直接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即实行某种形式的经济赶超以便寻找实现经济跳跃性发展的路径），还是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首先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即波特所谓的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业开始，通过逐渐积累和投资来形成自己高层次的竞争优势。

对于上述问题，第三部分的讨论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按照第三部分

的分析，一个国家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其竞争优势。因此，赶超型的跳跃式经济发展战略最终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形成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国家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充分地利用自己当前的比较优势。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10) 在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资本积累。一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正因为如此，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其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够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对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对比来进行说明。在表1中，我们分别给出了韩国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icity）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的研究和发展（R&D）密集度和其经营绩效的数据。多年来，三星电子一直致力于通过密集的研究和发展活动来提高自己的产品竞争力；而TSMC则主要从事芯片代工，并不需要太多的新产品研发投资，其研发投入以层次相对较低的生产流程创新为主。但是，数据表明，大量投资于研究和发展活动的三星电子在经营绩效方面与相对较少进行研发投资的TSMC相比相差甚多。图2则给出了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研发密集度对比与人均收入对比的变化路径。我们发现，与企业的例子类似，虽然韩国的研发密集度比台湾地区高出许多，但是其总体经济发展绩效却并不比台湾地区更好。

表1　R&D密集度与经营绩效：Samsung与TSMC（单位：%）

年份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利润率		R&D密集度	
	TSMC	Samsung	TSMC	Samsung	TSMC	Samsung
1994	43.8	8.2	32.5	10.4	2.8	—
1995	52.4	15.5	31.2	18.5	2.6	7.0
1996	49.2	1.0	26.5	1.0	3.8	—
1997	40.9	0.7	16.6	0.5	5.7	7.0
1998	30.6	1.6	12.4	1.5	3.9	8.3
1999	33.6	12.1	15.2	12.8	4.7	6.1
2000	39.2	17.5	19.1	22.4	4.3	5.3
2001	11.5	9.1	4.3	10.6	8.5	7.5
平均	37.6	8.2	19.7	9.7	4.5	6.9

数据来源：Samsung Electronics， *Annual Report* ，1994—2001；TSMC， *Annual Report* ，1994—2001.

上述事例与我们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在发展问题上，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发展活动以图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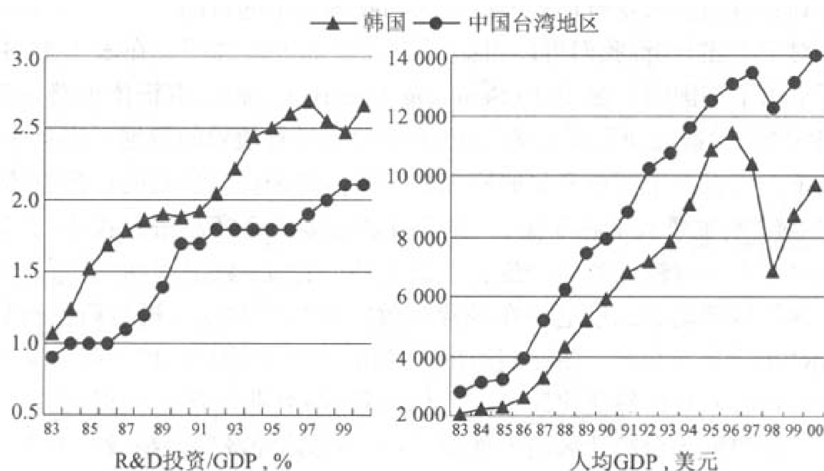


图2　研发密集度与经济发展绩效：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数据来源：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应统计网站。

结　　语

对竞争优势理论的片面理解，使有些学者误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倡导由政府来推动竞争优势的提升，以进行经济上的“赶超”。这种“赶超”创造出一批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国家只好抑制市场的作用，给予这些企业直接、间接的保护补贴，导致寻租、低效率等问题丛生，和竞争优势理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然而，本文无意于否定竞争优势理论的价值。比较优势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理论，虽然指出了企业和国家在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等生产活动时，在要素相对密集度方面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一个企业不可能进入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所有行业，甚至整个国家的所有企业加起来也不可能如此，所以，在符合这个国家比较优势的所有行业中必须有取有舍。取舍的原则为何？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给出有参考价值的答案。相反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国内市场规模、产业群聚等原则，则是企业和国家在选择行业时有用的参考原则。

参 考 文 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215页。

［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300页。

［4］［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5］［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6］［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7］Deardorf, A.（1984）, "Testing Trade Theorie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mics* , ed. R. W. Jones and P. B. Kenen, Vol 1, Amsterdam：North-Holland.

［8］Perdikis N. and W. A. Kerr（1998），*Trade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UK.

［9］Krugman, Paul.（1994），*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 合作者李永军，本文发表于《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2) 实际上，波特本人大体上就持这种观点。参见迈克尔·波特（2002，中译本），第10—15页。

(3) 参见迈克尔·波特（1997a，中译本）和迈克尔·波特（1997b，中译本）。

(4) 根据迈克尔·波特（2002，中译本）第三章图3-1改编。

(5) 参见迈克尔·波特（2002，中译本），第116—120页。

(6) 实际上，新贸易理论的最主要倡导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一书中，就是持这种观点。

(7) 参见迈克尔·波特（2002，中译本），第70—81页。

(8)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所研究的国家包括：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10个国家。

(9) 拥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即所谓资源型国家——除外。在波特所举例子中，资源型国家包括石油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10) 通常，当人们使用“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一词语时，其含义是指企业或者国家由于专业化地进行某种生产和“干中学”效应而获得或者加强自己的成本优势。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在本文的含义上使用该词语。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1)

——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

在《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一文中，作者在对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以后，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2) 进而，作者认为，“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作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要支持、促进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有保护的出口促进战略的取向，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重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合理运用。”(3) 然

后，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

鉴于原文的基本论点建立在对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批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评论表明作者和作者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章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理解有诸多的偏颇，因此，本文拟对林毅夫等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作一较完整的阐述，说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所隐含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含义，并对《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一文作一简要评论。

一、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从经济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赶上发达国家，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此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与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基于对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观察和若干经验教训的总结，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系统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

1．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

不论传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中心一外围理论”等各种发展学说，还是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做落后经济与发达经济的根本差别，因此，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作为经济发展和赶上发达国家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

林毅夫与其合作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所谓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各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般在0.5%—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别的资源是资本 (4)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资本的存量上有很大的差距；不同国家在资本的积累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甚至4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通常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5]）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这是因为，要使得经济产出的成本最低，该国的产业、技术结构必须与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决定于本国的禀赋结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怎样才能较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们所指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探讨的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所执行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的安排。按照其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发展战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CAF）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CAD）。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既包括政府人为提升经济系统中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Catch-Up Strategy）[6]，也包括政府在某些利益集团的驱动下对落后产业提供保护的情况。[7]

前面谈到，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含义通常指提高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或者说提高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量。而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和社会的储蓄倾向。经济剩余的规模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可供积累的剩余量也就会大。而在同样的经济剩余水平下，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是稀缺的要素，如果要素价格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资本的价格（即利率）必然很高，而利率同时也是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如果一个经济的发展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就会相对较高，从而现时消费的相对价格较高，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较低，因而社会就有积极性去抑制现时消费，增加储蓄倾向。

总之，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也会由相对昂贵逐渐变为相对便宜。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因此，任何政府在制定其经济发展政策时，要素禀赋结构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则是最重要的决策变量(8)，其他经济变量，如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积累率、增长速度等均内生于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发展战略的选择。另外，发展中国家是否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也将会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收入分配的平等、金融发展、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林毅夫，2002）。

2．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首先，要使整个社会能够对比较优势作出正确的反应，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而在资本变得相对丰裕的禀赋条件下，资本就相应地成为相对便宜的要素。然而，要素相对稀缺性在要素价格结构上的准确反映只有通过市场的竞争才能达到，任何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要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就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要素价格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产品价格能够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追求利润目标的微观经济主体就会依据价格信号自动作出反应，在其产业、产品和技术选择中尽可能多地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才会具有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微观主体理性的产品和技术选择的结果就会形成与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相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违背本国的比较优势，实行某种形式的赶超战略，人为地扶持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建立和成长，那么，执行这个战略任务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就不具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为压低工资率、实行金融抑制、扭曲价格体系和控制市场准入等行为都内生于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并且，这些优惠条件只能有选择地进行配给，某些部门和机构就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贪污、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这不仅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损失，还由于激励、信息等问题导致技术效率低下

和各种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的存在。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缺乏，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产业区段以劳动相对密集使用为特征。要推行赶超战略，人为地提升本国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而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将造成诸多严重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其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具自生能力，必须依赖于政府的保护才能生存。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这些产业尽管可以成长起来，并在统计意义上改变国家的产业结构，但是这些产业必然缺乏竞争力。其次，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形成的产业所能创造的经济剩余少，积累能力差；而受压抑的产业发展资本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积累。这样，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就会非常缓慢。再次，推行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大抑制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甚至造成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

因此，一国的经济制度内生于该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内在地要求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而推行赶超战略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体系的人为扭曲。

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方式与经济收敛

许多人担心，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落后经济是否会永远落后？其实，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但不会减少，相反能够增加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

首先，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由于资本相对稀缺，资金的回报率高，其资本积累率会高于发达国家。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可以快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并不等同于技术发明（technological invention），前者指一个生产者在下一期生产中所采用的技术比这一期生产运用的技术好，效率高，但新技术不必是最新的发明。发达国家必须在资本密集度很高的产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来生产，这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因为在发达国家的要素

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金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因而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否则就没有技术创新。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传统的产业如纺织业，还是在现代的信息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靠发明来取得新技术，也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包括买专利、模仿等等，获得技术创新。新发明，尤其是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中的发明，不仅需要巨额投入，而且风险很高。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最前沿技术进行研发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如果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例如，大量投资于研发活动的韩国三星电子在经营绩效方面与相对较少地进行研发投资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相比相差甚多；另外，图1给出了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研发密集度对比与人均收入对比的变化路径，可以看出，与企业的例子类似，虽然韩国的研发密集度比台湾地区高出许多，但是其总体经济发展绩效却并不比台湾地区更好（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虽然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来看，确实绝大多数新技术是由发达国家发明的，但是由于投入高、风险大，发达国家每年新发明的技术和现有的技术存量相比是有限的，技术创新的速度并不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由于成本低、风险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所以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当然，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就能够运用，引进来的技术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而且，引进技术也应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的比较优势，选择并引进适宜的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

总之，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会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因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的提升速度，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也会比较快。因此，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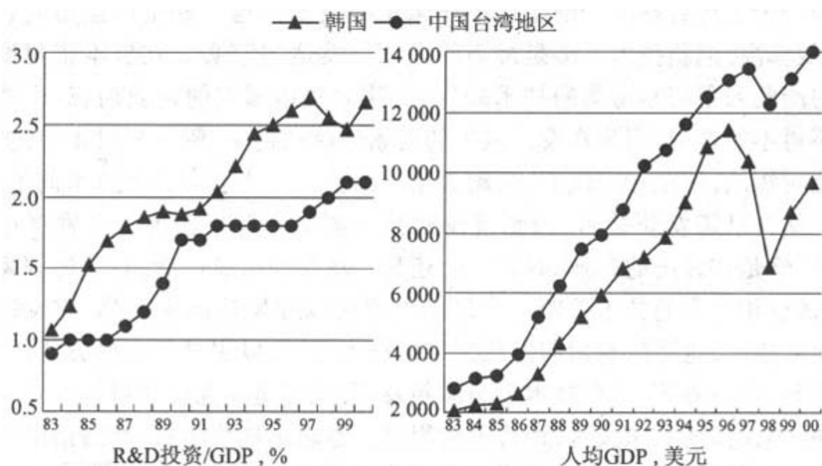


图1　研发密集度与经济发展绩效：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9)

数据来源：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应统计网站。

4．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恰当作用是什么，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旷日持久的论题。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情况下，发展战略内生地要求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价格信号准确及时，因此，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理想政府的作用那样，首先政府必须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性，比如：建立市场规则和实施反垄断法，这是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关键；采取适当的方式，参与建设和投资能源、交通、教育等具有明显外部性的产业等等。

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可以化解稀缺资源不足所造成的瓶颈制约，资本积累速度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会很快，从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化也会相当迅速，企业生产活动的规模、风险等会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信用、产权等制度安排的需求也会变化很快。这些都要求政府在信息、协调和促进制度演化等可能出现市场失败的方面发挥比“守夜人”更为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政府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根据信息的半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当在收集、处理关于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与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潜力等信息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将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为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提供参考；另外，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补偿企业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时

面临的外部性，当然，政府的这种干预是在要素禀赋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提供的补贴仅为补偿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外部性，范围和数量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像在赶超战略下那样，用于保护、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

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经验验证

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愿望。对二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真实发展故事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难发现以下的情况：几乎所有的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都因为忽视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仅未能实现预想的发展结果，反而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而一些没有采取或较早放弃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成功与失败的发展实践的对比足以表明，遵循比较优势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1953年的“一五”计划起，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为止，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为了动员稀缺的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中国政府人为扭曲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用国家计划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对企业实施国有化和农业经营人民公社化，从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经济体制下，尽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济力量。中国农村工业化成功的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遵循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而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赶超战略的政策性目标，其生产成本过高而产品又不符合市场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换言之，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超过国有企业的关键是因为它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因为乡村政府给了它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另外，赶超战略在轻工业领域所造成的市场空白也使得乡镇企业在发展伊始能够轻而易举地打开市场销路，实现迅速的增长。林毅夫、姚洋和刘明兴

（2002）利用中国1978—1997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和几种不同的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其研究发现：能否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农村工业发展成败的根本；同样是国有企业，更遵循比较优势的地区的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其他地区。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绩效主要是由其营运策略对本地比较优势的背离程度所决定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只有与本地的禀赋结构相吻合，才能达到持续增长的目的。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被称为“东亚奇迹”，经济学界提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它们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少，资源配置有效；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积极干预了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了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第三种观点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地区实行了出口导向战略。上述解释分别触及到了事物现象的某个方面，但是都没有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因此，各个解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本文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都基本遵循了，或者说较少地违背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除了香港地区以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尝试过推行某种具有赶超性质的产业政策，但是，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太少，每次要推行赶超战略，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因此，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政策无法维持下去。因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都没有将按照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而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常是被迫放弃赶超以后的结果，但是，与其他实行赶超的国家相比较，不难看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实质上都在于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至于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则更是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

仔细分析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及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可以证明上述观点。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确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但替代的是轻工业产品，韩国在60年代发展轻工业产品，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到了70年代，随着资金、技术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继续升级，也要求产业、产品、技术结构跟着升级，许多原来进口的产品就变成国内生产，所

以，进口替代其实是不断发生的。而且，在进口替代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出口替代，这些替代进口的产品，会因为具有比较优势而成为出口产品，而原先出口的某些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失去比较优势而不再出口，甚至变为进口。韩国在70年代初也曾经试图赶超，197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重工与重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时提出这个战略有两个目的：其一与我国50年代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的是一样的，认为面对朝鲜的威胁，如果没有这些重工、重化产业，就不会有完整的国防；其二认为这是一个发达国家所必须要有的产业。但是，韩国在1971年提出重工、重化产业优先发展以后，第二年就出现高通货膨胀。然后，这个战略基本上停顿了，这样，整个经济的发展就继续沿着60年代以劳动较为密集的加工业为主的方向发展，这当然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在80年代以后，韩国1971年提出的重工、重化产业优先发展战略又被重新提出，这时韩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已经比70年代提升很多，但是有些项目还是属于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盈利能力很低，必须依靠国内银行的廉价资金和国外借款来保护和补贴这些企业，这也是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林毅夫和李永军，2000）。 (10)

与韩国在70年代的情况相似，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地区当局也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但马上就出现高通货膨胀。因为要保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就要给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多补贴，但是当时的台湾地区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银行的存款很少，只能依靠财政直接投资，但是财政的税收能力也很低，大量的财政投资必然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从而导致货币的大量发行，所以第二年就发生高通货膨胀。后来在蒋硕杰、刘大中等院士的建议下，台湾地区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提高银行利率，鼓励民间投资（S. C. Tsiang，1984）。台湾地区也是每四年就制定一个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中充满了赶超的思想，可是，台湾地区当局没有配套的财政手段和银行贷款手段来补贴赶超的项目，因而这些计划得不到实际的执行，这样台湾地区的发展就较好地遵循了其比较优势。

郭克莎的文中认为，在发展过程中，韩国政府和我国台湾地区当局都采取了干预市场、确立工业发展顺序的产业政策，因此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不是遵循比较优势的。从上面的分析看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理解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内涵。考察一个经济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不在于政府是否出台了经济发展计划或者产业政策，而在于其实际发展路径是否遵循了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而且，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政府也可以制定产业政策，对创新企业提供一定的支持以补偿创新所产生的外部性。所不同

的是，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是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后的比较优势的，所以，在前者，政府的支持是帮助企业克服缺乏自生能力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帮助企业克服在产业或技术升级中所伴随的外生性问题，前者提供的支持远远大于后者。

郭克莎的文中还认为，日本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时期所推行的不是遵循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并以1972年日本通产省副相的一段话证明这个结论。然而，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并非永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按照比较优势，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提升，产业自然也要升级到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根据麦迪逊（Maddison）的研究，197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5.5%（Maddison，1995，pp.196—197），在全世界17个最发达的国家中排名第14位，因此，当时的日本当然要放弃一些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而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否则就违反了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日本通产省副相在1972年所说的话，反映的正是这种由于要素禀赋的升级所要求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即使在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也反映了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要求。以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在60年代，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各种机械行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很多生产零部件的企业已经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这样，汽车厂的投资规模就比较小，因为大部分零部件可以外包出去，拉动了那些外包企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需求溢出效应”。实际上，日本政府在60年代提出汽车产业优先发展政策时，只是支持了日产和丰田两家汽车厂，但是，本田、铃木等10多家公司抵制通产省不准进入的道德劝说压力，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汽车产业，也发展得非常成功。既然这10多家汽车公司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在没有日本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情况下都能发展得相当成功，就证明这些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它们所在的产业是符合日本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后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所以，在20年代60年代中期，日本通产省推动制造业升级到汽车产业，是符合日本当时的比较优势的。

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它们远远不具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的要素禀赋条件。以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产业为例，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开始推行其汽车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时，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5%，其要素禀赋结构远低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条件（林毅夫，2002）。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南美洲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失败，也

在于违背了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南美洲国家在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优势，可是如果不去发展这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样无法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比如，在19世纪，澳大利亚和中南美洲的阿根廷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一直比较好地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出口较多的资源产品，其人均收入一直居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南美洲的国家却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认为出口矿产资源、进口制造业产品会被剥削，提出进口替代战略，违背本国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的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超过30%，比澳大利亚的相应比重（15%左右）高出一倍，但现在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只有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三、两个相关问题的再说明

主张不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学者经常用的理论依据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依据，前一种理论具有逻辑缺陷；而把后一种理论作为发展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依据，实际上是对这种理论的误解。

1．关于动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的思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克鲁格曼（Krugman，198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阿姆斯登（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斯蒂芬·雷丁（Stephen Redding，1997）认为，发展中经济会面临着这样一种选择（trade-off）：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还是通过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建立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进入那些当前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通过生产力的增长在将来可能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他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过去的技术变迁路径内生决定的，并同时决定着现在的技术创新速度，因此，存在这样的可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可能会降低本国的社会福利，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却可能增进社会福利。[1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经常被用来作为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但是，许多被用来支持动态比较优势的例子，比如德国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推行的铁血政策，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电信产业的政策，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这些国家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例如，俾斯麦

在推行铁血政策时，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为英国的58%，美国在1900年的人均收入已经为英国的87%，而日本在提出发展汽车产业时，其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的40%（Maddison，1995，pp.196—197）。所以，这些国家在协助企业克服一些产业升级所可能出现的协调等外部性问题以后，这些新建立起来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正常管理就能盈利，政府就不再需要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所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制定其产业政策的，而并非违反比较优势，这样的政策是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林毅夫，2002）。

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实际上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按照这一观点，应当建立并扶持现在那些没有比较优势、未来若干年后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建立起来以后，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这些企业本身不能创造剩余，而且会挤占稀缺的资源，抑制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从而延缓了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动态比较优势或者实行赶超的时候，需要保护的通常不是一家企业，而是某几个产业部门，这样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是关税保护是不够的，结果很可能出现对资金、外汇等一系列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寻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宏观经济不稳定等问题，经济发展停滞，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提升，从而延长这些产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时间。如果出现这种不幸的后果，本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10年、15年以后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会成为永远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实际上，斯蒂芬·雷丁（1997）也承认，要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转变为实际政策是非常困难的。

郭克莎的文中将林毅夫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称为“静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认为中国应该“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作者没有意识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在实践中应用这个理论所可能产生的政策扭曲及其后果，也没有真正理解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内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每一个决策时点上，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其比较优势是外生的；但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尽快提升，因此，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比较优势又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不断演变的，是动态的。

2．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

在国外学术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般被用于讨论同等发展程度的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关系。支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认为存在由知识或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潜在市场失灵；另一类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 A. Brander）、斯潘塞（B. J. Spencer）首先提出的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在郭克莎的原文中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这两种理由都只适用于发展程度基本一致、具有大致相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价格相差不大的发达国家，而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支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理论依据。因为最新技术的开发研究是资本投入最密集的、风险最大的生产活动。例如，在信息产业的新技术研发方面，美国的IBM公司一年的R&D投入达50亿——60亿美元，加拿大的北方电讯一年的投入为40多亿美元，芬兰的诺基亚一年的投入也有30多亿美元。显然，对一个人均收入不到1 000美元的国家的企业来说，进行这种新技术的研发活动不是力所能及的。(12) 而就第二个理由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都能达到，但发达国家的资金相对便宜，在同样的规模经济上，发达国家企业的产品会比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的产品便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可能在没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上依靠达到规模经济而比外国竞争者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而具有成本优势是成功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提之一（郭克莎，200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是，这一理论仅作为发达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也受到很多批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贸易政策的实际运用所需要的信息收集、处理与判断能力可能是任何政府都难以达到的。政府需要选择应该给予扶持的“战略性”产业，并决定扶持的方式、范围和数量；同时政府扶持这些特定产业必然与其他产业争夺资源，从而使其他产业的成本上升，因此，政府还要权衡从这些特定产业得到的收益是否能够弥补给其他产业带来的损失，等等。这些决策都需要大量的、准确的信息，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其次，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是以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提高本国福利的政策。因此，即使政府能够解决上述信息和决策难题，这种政策也可能会受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从而有引发贸易战而使各方均遭受损失的危险。

下面再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例子来讨论一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把钢铁工业作为发展的一个优先目标。(13) 从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生产增长了3倍，不仅能够满足本国经济发展对钢铁的需求，而且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但是，正如克鲁格曼（2002）所分析的，一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成功，不能简单地用目标产业的增长或市场份额来衡量。日本政府的政

策固然成功地促进了钢铁工业本身的成长，但是由于日本钢铁产业的利润率大大低于其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 (14) ，这项政策使资源转移到了收益率相对较低的领域，因此在客观上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日本经济总体上为此付出了福利损失的代价。 (15)

四、结语——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贸易政策含义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以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为目标，并以创造有利于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政策环境为手段。

在对外贸易方面，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相对偏离程度越小，企业就具有越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就会持续增加，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地区有能力进口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程度和贸易规模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参数。 (16) 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以国内生产替代资本密集型制造品的进口，即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那么它的进出口贸易都将受到削弱。资源被用于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出口必然减少，而且，为了促进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本币价值可能被高估，也会阻碍出口。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与较好地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这些国家的增长绩效很不理想。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同时鼓励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拥有很高的出口比率并且技术进步的速度很快，出口也会是没有利润的，其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保护、银行的优惠贷款和其他的政策支持。因此，并不是更为外贸导向的政策就是促进欠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好的政策。如果将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种贸易政策来人为提升贸易规模，从长远来看，这些做法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贸易结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它们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并按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调整产业、产品技术结构。但是由于赶超的主观愿望，即使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有些违反比较优势之举，虽然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因其总体经济发展的成功，不少学者误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

功之道在于逆比较优势发展，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片面理解更加深了许多有赶超愿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东亚成功经验的误读。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均资源贫乏，无法长期支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林毅夫，2002）。理论研究和争论的目的则在于厘清事实，揭示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所蕴藏的道理，以期人类能如恩格斯所说的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希望同郭克莎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学界朋友的争论，能让我们都向这一目标迈近一步。

参 考 文 献

［1］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林毅夫：“与林老师对话：发展战略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3年8月。

［3］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3年第58期（总第400期）。

［4］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1月，269—300页。

［5］林毅夫和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02，2003年2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6］林毅夫和李永军：“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国际贸易》，2001年第9期。

［7］林毅夫和李永军：“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金融风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0017，2000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8］林毅夫和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01，2003年2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9］林毅夫和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10］林毅夫、姚洋和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发展论坛，2002年8月15日。

［11］刘明兴：“禀赋结构、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发展论坛，2002年8月15日。

［12］刘明兴：“适宜的技术选择与内生增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发展论坛，2002年8月15日。

［13］［美］保罗·克鲁格曼和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等译：《国际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

［15］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Paris: OECD, 1995.

［16］Rau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49，No. 2，251—273，May, 1959.

［17］Stephen Redding,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1997.12，http://www.nuff.ox.ac.uk/economics/papers/1997/w16/redding.pdf.

［18］Tsiang, S. C.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Less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rnold C. Harberger, e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84.

---

(1) 合作者孙希芳。本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

(2) 引自郭克莎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

(3) 同上。

(4)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二者的增加都是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资本与其配合，因此，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将使人力资本不能合理使用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或外流；同样，如果物质资本过度积累，却没有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与其配合，物质资本也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率。因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增加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最大贡献（林毅夫，2002）。为了行文方便，除非在必要的地方，本文所指的资本将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者。

(5)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许多产品、技术和资金密集度差异很大的产品区段。例如，信息产业可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

(6) 在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发展途径是多数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愿望。在新中国建立伊始，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救国图强的愿望。

(7) 在现实的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政策并非完全自觉地按照上述分类来选择，所以只能说，相对而言，某国在一定时期遵循了某种发展战略。而且，我们也不排除在同一时期内政府同时采取两种策略的可能。例如在支持某些产业进行赶超的同时，为了就业的需要，又对某些落后的产业予以保护。但是，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总是有限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将得不到必要的资本而受到抑制。

(8) 从长期来说，要素禀赋是可变的；但是对任意一个决策时点的任何决策者来说，要素禀赋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对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是其政治或发展理念的内生变量；但是对经济中的其他决策者如厂商、消费者等来说，发展战略则为外生变量。

(9) 转引自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

(10) 与计划经济国家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遵循比较优势的，所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但是，和日本以及其他“小龙”相比，韩国的经济发展又是经常试图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所以，韩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和波动都比日本和其他“小龙”差。

(11) 如果“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由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政府必须对产业升级时率先进入新产业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助，以补偿创新的外部性，这个观点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大多数学者在运用这个概念时，指的是发展现在没有、将来才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12) 以国内信息产业中最成功的联想集团为例，其一年的营业总收入尚不及300亿人民币，显然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和IBM等公司进行新技术研发的竞争。

(13) 这个案例分析主要参阅克鲁格曼（2002），第276页。

(14)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的资本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平均收益率的一半多一点；在70年代，钢铁工业的收益率则更低。（克鲁格曼，2002，第276页）

(15)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时发展钢铁产业，基本上还是符合日本的比较优势的，1955年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为美国的25%，和中国以及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同样的钢铁产业优先发展政策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5%大不相同。所以，日本的钢铁产业还是有自生能力的，并且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还是能盈利的。只不过日本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目标，使其规模过度扩张而减少了应有的利润。

(16)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问题的提出形成了对整个“贸易、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或者说，近十几年来大量的文章将“openness”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解释变量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技术、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界则有争议。本文从四个方面来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对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研究，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一般是国家的规模扩大，人口增加，但是人均产量不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改善。现代经济增长是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人均产量也增长，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在工业革命以后变得越来越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就只有在技术创新的速度上比发达国家更快，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发展目标。

但对技术创新的含义，经济学界和科技界的理解不完全相同。经济学界所谓的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是指一个生产者在下一期生产中所采用的技术比这一期生产中采用的技术好，效率高，这个“新”技术不必是最新的发明。在科技界里则习惯地把创新（innovation）和发明（invention）等同起来。发明是从无到有，是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的一个增量贡献。但在经济学里则把发明和创新分开，创新侧重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和一个生产者现在实际采用的技术比较，而不是和世界总体的技术水平作比较。

最发达国家各个产业所采用的技术在世界各国的相同产业中通常处于最先进的水平，既然如此，发达国家在下一期生产时要采用比现在更好的技术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新发明。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传统的产业如纺织业，还是在现代的信息产业，和发达国家都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靠发明来取得新技术；也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包括买专利、模仿等等，取得技术创新。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在这两种可能方式当中到底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应该依成本和效益的比较而定。关于发明，尤其是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发明，投入非常巨大。例如，IBM每年的研发投入是50多亿美元，摩托罗拉是40多亿美元，英特尔是30多亿美元，朗讯是40多亿美元。而且发明的风险非常高：一般在最前沿技术上的研发投入，100个立项中到最后大约只有5个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在10个申请专利的技术中，大约只有一两个具有商业价值。也就是说，在100个研发项目中，最后只有一两个项目对企业的投入有了回报，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如果只看这个最后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研发项目，它有专利的保护，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如果其他国家的企业要用这项新技术必须付专利费，这项技术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会相当高。但是如果把那99

项失败也算是取得这一项成功的必要成本，那么，在最前沿技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有许多实证研究发现，拥有核心技术、领导世界技术新潮流的全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甚至经常是亏本的。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靠自己的研发取得新技术，在最前沿的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竞争，那么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顶多和发达国家一样。但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筹措如此巨大的资金？如果发展中国家依靠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是买专利，买专利当然要成本。买的专利越新，成本就越高，过了专利期10年，甚至5年以上的技术，基本上就可以免费引进。根据一些研究，即使是买专利，成本一般也只是这项专利技术研发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必然是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可以避免自主研发所可能遭遇的99%的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虽然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确实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发明的，但是，由于投入高、风险大，发达国家每年新发明的技术和现有的技术存量相比是有限的，技术创新的速度并不快。发展中国家，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由于成本低、风险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大量引进现成的技术，所以，虽然取得新技术发明专利的数量比发达国家少，但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却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二、引进技术并非永远落后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因而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否则就没有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必须在资本密集度很高的产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来生产，这对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金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一个企业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的结构下，必须进入到能够用资本来替代劳动的产业，采用能够用资本来替代劳动的技术，在市场当中才能够有竞争力。所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资本、技术密集的特征，是一个“果”，它的“因”是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相对短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在产业、技术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先在要素禀赋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提高整个经济当中每个劳动者所能使用、支配的资本量。

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量？资本来自于每一期生产当中的剩余的积累。每一期生产当中扣除了各种成本以后，就企业而言是利润，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则是剩余。剩余可以作为两种用途：增加当前的消费，或是作为积累，以增加下期生产可使用的资本。所以，在每一期生产中剩余

越大、积累越多，每个劳动力可以使用的资本就会增加得越快。

一个经济体如何才能在每一期生产当中创造最多的剩余，实现最高的积累？关键在于每一期生产都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当这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时，必须进入到能够更多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少利用昂贵资本的产业，并采用能够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代昂贵的资本的技术。处于中国目前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就应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进入到一些资本密集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产业区段。以信息产业为例，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区段：研发、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和组装。研发是资本和技术最密集的，像IMB每年的研发投入达50多亿美元，这是资本投入最密集的区段；核心芯片的生产，一条8英寸芯片的生产线投资要13亿美元，等于100亿元人民币，一条12英寸芯片的生产线的投资要20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资本比较密集的区段；零部件和组装则是劳动力相当密集的区段。作为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像传统的纺织业、家电产业，或者是进入到新产业里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既然这些产业或区段合乎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中就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领最大的市场份额，赚取最高的利润，获得最大的剩余。而且，因为资本的投入小，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最高。一方面剩余最大，另一方面资金的回报率最高，这样将剩余用来作为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也会最快。

如果反其道而行，一开始就想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哪个产业、哪种技术上有优势，就直接动员力量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是否能够更快地赶上发达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政府的行政主导力量很强，有能力动员许多资源来发展一些在全世界最尖端的产业、技术。但是，由于我们的资金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成本要高，最尖端的产业又是资金最密集的，其生产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资金的成本，因此，即使是用国家的动员力量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国家的持续的保护和补贴，这样的产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也是不能生存的。

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并不是有一两个冒尖的产业赶上就可以了，而是要整个国家总体的产业水平赶上才可以，总体的产业水平赶上的前提是整个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赶上。如果发展中国家靠政府动员来发展少数几个高精尖产业，首先，建设这些企业要非常多的资本投入，而且发达国家在这个产业的科技水平是不断在进步的，两三年以后现在的技术水平就过时了，要想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

的产业保持在同一水平，就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不断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是，在最前沿技术上的研发投资每项动辄数十亿美元，这样的投入水平不是我们这种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担的。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建立了汽车产业，重机、重化产业，但是这些产业自从建立之后就停留在那个技术水平，十年以后就变成了古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承担不起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产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企业就不能获得利润、创造剩余，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就不能作贡献。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把有限的资本用在资本密集的产业的建设上，剩下的能够用在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上的资本就所剩无几。这些符合比较优势、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发展就受到抑制，也就难于创造剩余，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作贡献。

以我国的实际经验来说明。劳动力多、素质高、价格低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在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才是这样，1978年以前就是如此。但是在1978年以前，由于国家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得不到任何资本投入，无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力多的优势不仅没有发挥出来，而且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调整了发展战略，投入到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产业区段的资金增加，劳动力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的25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3%，是同期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绩效形成强烈对比，背后的道理就在于此。

最近，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请我回去做了一个演讲：从理论上来说，发展中国家（地区）都有可能靠引进技术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现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可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这个理论预期，其他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扩大了。我利用1960年到2000年将近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发现那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主要原因在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的战略，想一下子就去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战略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叫斯大林模式，在印度叫重工业优先发展，在中南美洲叫进口替代战略，名称有异，本质相同），经济发展绩效都不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好的少数几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充分利用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水平。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

主要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是高科技产业里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若两者都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因为资本相对多，回报率相对低，每一期生产当中所创造的剩余有两种用法：消费和积累。既然资本的回报率低，愿意把剩余积累起来作为投资的积极性就低了，所以，储蓄率相对低。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左右，而比较好地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东亚经济的积累率可以达到40%左右。由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高于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发达国家的积累率将近一倍，所以，发展中国家现在每个劳动力可以使用的资本量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决定长期趋势的是增长率，而不是起点时的存量。所以，二三十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差距就能大大缩小，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就可以趋近。

三、引进技术是否也需要有自主研发

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取得技术创新，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不等于说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从事新技术的研发。首先在国防安全方面，有些技术绝对必要，没有这些技术，就没有国防安全，而且，这些技术不可能从国外引进，或是不适合从国外引进，当然就只能自己来研发。这里须注意的是，这些技术的范围要把握得很好，比如说汽车产业，过去被认为是国防产业，现在则更多地被认为是民用产业，通讯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产业事关国防安全，对每个国家来讲，都应该不以经济回报为考虑的出发点。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国防方面的科研也是由国家以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持的。

发达国家在国防安全上的科技研发，对于民用产业的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外溢性。比如美国在航天产业上的技术研究，相当多地被转移到民用航空器上，很多军用信息技术被转移到民用以后，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高潮，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之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以国防产业技术研发对民用产业的外溢性为由，来投资国防产业？如果从国防产业技术的先进性来讲，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同美国应该是不相上下，有些领域比美国还强。但是，在美国，国防产业的技术对民用产业的技术有很大的外溢性，而在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则基本没有这种外溢性。原因在于美国产业，不管是民用或是军用，总体的水平都很高，技术都非常先进，由于差距不远，在国防产业上研发的技术很容易就转移到民用产业上来。而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则是资金稀缺的国家，为了在军备上和美国竞争，已经把大量的资金都配置到国防产业，所以民用产业非常落后，与国防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以及技术水平的差距太远，在国防产业上研发出来的技术，民用产业很难利用，所以外溢性小。我国三线建设上

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三线建设的产业都属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但是，由于当地的经济总体水平太低，三线建设起来的产业在当地就成了一个个的孤岛经济，每个都是大而全、小而全，很少和当地的经济有互动，对当地产业、技术的发展也很少有外溢作用。相反，在东部沿海的国有企业，虽然很多在技术水平上还赶不上三线产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乡镇企业的技术、工程人员却来自这些国有企业。

除了国防产业之外，还有一些产业也必须靠自己来研发新技术。发达国家在每个产业上的技术创新都必须靠自主的研发，是因为每个产业的技术在全世界的生产链当中都属最先进的。因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已经退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产业，我们现在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很可能没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产业上有优势，并继续生产，因此我们就成了全世界这个产业的领头羊了，这样的产业要技术进步，就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例如，以电视机的产业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最先进的，当时重要的技术研发，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的发明都发生在美国。到了60年代以后，美国退出电视机生产，日本成为生产电视机的最发达国家，所以，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电视机的技术研发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到了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退出家电产业，韩国成为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最发达国家，彩色电视机的新技术也更多地来自于韩国。我相信很可能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会取代韩国成为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最发达国家，那时候越南可能也生产彩色电视机，但是，我们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越南高，彩色电视机，或是VCD、DVD的技术创新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研发。所以，在某个产业上要不要自己从事新技术的研发，主要决定于有没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相同的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如果有的话，技术创新尽可能以引进为主，如果没有，就只能自主研发。

最后，即使有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个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可以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也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就能够运用。引进来的技术必须经过改进、消化、吸收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即使靠引进，也必须保持一个研发队伍。例如，我们现在汽车产业大量和国外合资，很多技术是从国外转移过来；在日本或是德国的汽车厂，基本看不到工人，大部分的生产是自动化。由于国内的工资水平低，在许多生产环节，用人工比用机械生产便宜，所以，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向是用自动化来节约劳动力的投入，把这样的技术引进到国内以后，则应该反其道而行，技术研发的方向是改进现有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在可能的地方用廉价的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技术设备。又比如，五六十年代我国东北的国营农场引进了很多苏联的大型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大部分不太耐用，原因并非苏联的拖拉机

质量有问题，而是东北的小麦单产比苏联西伯利亚的单产高了很多，适用于低单产地区的拖拉机，到了高单产的地方就难免经常发生故障，所以需要加以改进。由于在发达国家研发出来的技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要素相对价格水平和生产环境，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这些技术之后，也必须有一定的研发能力，才能最好地吸收、运用、改进这些技术。保持一定的研发能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当其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变化，某个产业成了全世界的领头羊时，从引进技术转变为自主研发技术。

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如果在现阶段以引进技术为主，我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快速增长？何时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一般说来，理论分析只能指出某项政策的影响是正是负，但无法决定其效果的大小、实现效果时间的长短。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实证经验中推测出来。日本是以引进技术为主而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最近，日本东京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关志雄博士将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日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作了对比，发现两者非常接近。例如，每个人的预期寿命，中国目前是男性68岁，女性72岁，日本在1965年的时候是男性68岁，女性73岁；婴儿死亡率，中国目前是每1000胎31个，日本1960年时是每1000胎30.7个；我国目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是15.9%，日本在1959年的时候是16.7%；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即收入当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比重——现在是39%，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是38.8%；我们每个人使用的电力，现在是每年1071千瓦小时，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是每年1236千瓦小时。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指标都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日本靠大量引进、消化、改进技术，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从1960年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当然，日元的汇率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400日元对1美元，升值为120日元左右对1美元，也是日本人均收入赶上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也走和日本同样的发展道路，固然不能乐观地认为，跟日本一样也只要再用28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就能赶上美国，但是即使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1/5，由于我们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5倍，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也就能够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到那时，如果我们和美国一样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5%用来搞新科技的开发，我们的投入的总量也就能够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许多领域也就有可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全世界的专利、全世界的科技进步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中国。

处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想在产业和技术水平上直接迎头赶上发达

国家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这样的努力经常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靠发挥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引进技术为主、自主研发为辅来取得技术创新，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在市场中最具竞争力，最快速地积累资本，最快速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水平，以小步快跑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3年第58期（总第400期）。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1)

——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在《经济学（季刊）》本期发表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以下简称《宪政》）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 (2) 他们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该文同时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俄罗斯改革目前看起来比中国失败，但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将来俄罗斯会超过中国。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发展由快而慢，日本为何发动二战，以及为何现在出现金融危机

等，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宪政》第1、2、3节）。

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提出几点商榷。文章结构如下：首先探讨后发优势的来源；其次，讨论后发国家是否必须先完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辨析英美的宪政体制是否就是最优制度；第四，讨论经济转型的模式和绩效；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一、技术创新和后发优势

（一）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技术层面说，一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于三方面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和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进行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18—19世纪有些国家通过殖民地而增加土地供给，但对21世纪的国家而言，国土面积是外生给定的。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国与国间差异不大。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2%—2.5%，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差异比较大的是资本积累，有些国家资本积累非常快，达到GDP的30%或更高；而有些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不但没有资本积累，而且甚至因为折旧而呈负增长。据世界银行1999年数据，发达国家的平均资本积累率在20%左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后的中国，则在40%的水平（World Bank，2001，pp.298—299）。所以，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越来越低。除非保持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从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和产业。工业革命后，新产业不断出现就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例如，纺织业是原有产业，因为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果把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又如，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汽车制造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等，都是新技术的结果。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经

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只要看这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二）技术创新的成本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来源可以不同。最发达国家的企业采用的技术已在最高水平，其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明（invention），只有投入资金和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R&D）以发明新技术，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除了技术发明外，还可以通过从比较发达的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本国新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发明或引进到底哪种方式好，要看哪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这个问题无法从理论上解决，只能从经验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例如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在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上投资43.45亿美元(3)，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4)，英特尔38.97亿美元(5)；又如医药技术，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的研发投资达23.44亿美元。(6)

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大，但成功率并不高，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取得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另外，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非都有商业价值，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喜欢。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例如，IBM最早的个人计算机用微软的DOS操作系统，后来升级为OS系统。当微软出了更受市场欢迎的Window系统后，IBM放弃了自己的OS系统，改用Window系统。有些研究表明，申请专利的技术中，10%—20%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另外的80%—90%被束之高阁。如果项目研究成功，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可能会有全世界的市场，以及专利技术20年左右的保护期保证其垄断地位，从而有较大的市场回报率。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包括95%的研发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的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风险很高，回报率低。

如果发展中国家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的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和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在引进技术中，成本最高的是购买专利。研究表明，总的来讲，购买专利的成本大约相当于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7) 发达国家如果不付出99%的失败成本，就不会得到1%的成功。而对于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大约该项技术

发明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一定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可以避免发达国家所面对的99%的失败。因此，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所以，从技术层面说，发展中国家具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8)

（三）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被称为“东亚奇迹”。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维持了30—40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过程中，没有多少新技术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发明的，它们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我国在改革前后的情形也是如此。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自力更生，试图“10年超英、15年赶美”，在尖端技术和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改革后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是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突破，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后发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1999年我国人均GNP为780美元，世界排名第140位，仅为同年美国人均GNP30600美元的1/40。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NP同年达3291美元，也只是美国人均GNP的10.7%（World Bank，2001，pp.274—275）。人均GNP的差距是衡量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高收入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代表技术差距大，利用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内外专家和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二、共和宪政体制和后发劣势

（一）何谓后发劣势

杨教授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中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他认为国家间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差异。他比较了19世纪英法两国的发展水平 (9) ，认为法国落后于英国是因为英国从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之后，已经实现了宪政体制，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他又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很困难，后发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发展，但是会助长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在演讲和《宪政》中进一步提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认为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 (10) ，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失败。所以，他认为落后国家有“后发劣势”，要克服后发劣势必须先完成共和宪政体制的改革，想获得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杨小凯，2000）。

《宪政》一文还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取得的成功是因为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后来的失败则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Sachs，Woo，Yang 2000，pp.443—447）。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上的困难也是因为宪政改革不彻底，虽然学习西方，但仍保留了东方模式的银企关系，形成了大量呆坏账，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

《宪政》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先发挥后发优势，进行技术模仿，而不先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改革，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因此，逆其道而行是不可取的，顺其道而行，虽然开始时可能会有短期的困难，但从长期的发展来讲是值得的。 (11)

（二）共和宪政体制是否为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是否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的先行必然会出现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掌握国家政权的精英们会因此进一步妨碍宪政体制的改革，长期经济发展必然就会出现《宪政》所预测的困境？是否只有像英国那样，先

改革宪政体制，才能避免后来发生的困难？

从经验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例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竞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是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后发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印度经济仍然比较困难。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尤其是改革后，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中国都比印度好（Rosen，1992；Srinivasan，1994）。由此可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的。

按照《宪政》的说法，日本被认为是直到90年代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的国家（该文第2节）。新加坡基本上是独裁政治，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可是，1988年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新加坡1996年时人均收入也达到美国的水平。这说明，后发国家即使没有进行彻底的英美式宪政改革，也能在经济发展上超过有了宪政体制的英美发达国家。亨廷顿（1998）在其影响甚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总结了从20世纪初土耳其的凯末尔以来的经验，也发现许多把西方化作为现代化前提来努力的发展中国家，并未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西方化。而且，具有该文认为是最理想的共和宪政体制的英国，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现在只排在全世界第22位，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了英国（World Bank，2001，pp.274—275）。

《宪政》主张共和宪政体制改革要先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先进行技术模仿，没有在宪政体制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少数政治精英就会利用国家政权掠夺经济发展果实，使制度模仿更难进行，经济发展最终将陷入困境。但是在二战前，日本天皇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不干预政治，也没有利用权力去为皇亲贵族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新加坡固然有国有企业，台湾地区也有“国营”企业和“党营”企业，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抑制私营企业来保护“国有”企业和“党营”企业。同样，中国改革伊始，也未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在各行各业接近于垄断，但现在国有经济不断退出，私有经济不断扩张。固然有政策保护国有企业的，但观察告诉我们，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这些实证经验说明，技术模仿使得经济发

展很快，并不一定会像《宪政》预言的那样使国家机会主义的行为恶化。

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人民的支持。19世纪法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英国实施了共和宪政体制。然而法国的税收却远远低于英国，法国政府的权力虽没有共和体制的多党制衡，但“因怕人民造反而不敢征高税”（杨小凯，2000）。[(12)] 这正说明了即使在中央集权国家，当权者也并非杀鸡取卵。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者，并不一定都把价格定得很高以剥夺消费者的剩余，尤其是在可能有新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出现竞争的情况下，更加不会如此（Baumol，William J., Robert D.Willig，and John L.Penzar，1988）。

总之，从上述经验看，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该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不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见得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三）宪政改革是否可在短期内完成

假定我们接受《宪政》的观点，宪政改革必须先行才能避免国家机会主义，保证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成功。那么，是不是有办法用“休克疗法”来改革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呢？因为只有存在这样做的可能，强调宪政改革先行才有意义。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或地区，先用50年甚至100年的时间完成宪政体制改革，然后才来发展经济。

宪政体制改革其实并不仅是立宪，即使宪法规定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也并不代表现实中必然有这样的制衡。根据诺斯的研究，北美与南美的宪法本身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北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程度很高，而在南美，国家机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相当普遍（North，1990）。由此可见，所谓宪政体制改革，不仅是立一部宪法，必须要统治者愿意遵守，统治者不遵守，被统治者群起而攻之，法才是有效的。实际上《宪政》指出，法国的宪政体制改革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宪政》还认为日本的宪政改革没完成，才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苏联和东欧遵行了《宪政》一文的作者之一萨克斯的建议，在经济上推行了休克疗法，在政治上推行了欧美的宪政体制，可是休克疗法给苏联和东欧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世界银行最近对苏联和东欧10年转型所作的回顾性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生产水平和各种社会指标都远不及转型前（World Bank，2002），可是《宪政》的作者认为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失

败，而是因为宪政改革还没有完成（该文第3节）。宪法已经改了，政权已经换了，人的行为方式依旧不改，有什么办法呢？

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如《宪政》所言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从经验上看也不是只要愿意，就可以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而在一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其实，英国的共和宪政也不是仅因为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英王威廉三世在1689年宣布大宪章完成的。从12世纪以来，英国封建贵族的力量逐渐强大，贵族废立国王的事件时有发生，国王的统治越来越需要取得代表贵族利益的议会的支持，威廉三世本身就是英国贵族从荷兰迎立来取代他们不满意的詹姆斯二世的。(13) 如果没有贵族本身力量的强大，即使通过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宪章，统治者仍可随时撕毁宪章或将宪章束之高阁，就像在法国、德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先发展经济，建立多元的政治、经济力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宪政体制。更何况本文所引用的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共和宪政体制改革既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三、共和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

（一）共和宪政体制是否为最优体制

有关“后发劣势”的关键点还在于英美式共和宪政制度是否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时最好的制度，以及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近20年来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制度是重要的，任何国家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都会有影响。第二，制度是内生的，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14)

例如，许多人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因为在私有制下，所有者会关心所拥有的东西。在经济生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所有，剩余所有者在经营上就会努力工作，且不会有道德风险的行为。如果是公有制，我的东西可以被别人分享，别人的东西我也可以分享，就会产生“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公有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可是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水平很低，一个猎人出去打猎不一定能够打到猎物，打到猎物之后也没有办法保存。在那样的生产力水平和储存条件下，公社里一个猎人让大家分享他的猎物，他也有权利分享别人的猎物，是使每个人生存机会最大化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因

此不能简单地讲私有制一定好于公有制。

另一个例子是交换媒介。现代社会用货币，原始社会则以物易物。能不能说货币经济一定比以物易物的经济更有效？前提是交换密度有多高。如果交换密度非常稀，一年才交换一两次，要找第三种大家共同接受的物质做货币反而不方便。而且一种物质做货币，要让社会共同接受，就必须有国家政权的保证，成本非常高。因此，货币经济并不是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比以物易物的经济更有效。

再一个例子是市场。市场的发展是漫长的过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多余物品放在路边，如果有人需要就以物交换，这是最原始的市场。慢慢地利用神的生日举办庙会，一边参拜神灵，同时交换多余物品，后来就形成墟。从一个月，到十天，后来变成五天、三天，最后每天都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每天都有的市场，使人们买卖东西很方便。但是能不能讲现在的市场，比以前一月一次的集、一年一次的庙会，甚至原始社会把要交换的东西摆在路边人躲在树后更有效呢？这要看交易的密度有多大。如果交易密度不够，越固定的市场交易成本就越大。国内在改革初期鼓励建市场，很多地方建了市场之后没有足够的交易，最后荒芜了。

因此，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否则，即使通过宪法，也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宪法，固化其垄断权。台湾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谓“宪法”，一方面统治者将其中的很多内容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还用其中的条文为国民党的政治垄断进行辩护。后来经济发展了，台湾人的经济力量提升了，力量的天平从倾向于掌握统治权的外省人转而倾向于掌握经济权的本省人，国民党才失掉了对台湾政治的垄断。所以，即使欧美的共和宪政体制在经济发达以后，有几个经济、政治力量可以相抗衡的集体时是最优的，也不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是最优的。而且，从发展水平看，日本、北欧都赶上了美国，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

（二）一些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否因未实现共和宪政而起

《宪政》把二战以及苏联、东欧、日本等国的经济困难，说成是相应国家没有完成宪政体制改革所致（该文第3节）。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日本发动二战并不是因为天皇保留过高的权力，从而推动日本参战的。日本历史上由幕府大将军执政，明治维新以后改为由民选的内

阁总理大臣执政，天皇只是受崇拜的偶像，在内阁会议中一言不发，是虚位元首。日本发动战争是因为军国主义思想造成的。德国在一战以后已经推翻了专制的帝制，推行过宪政体制改革，执行了分权的议会内阁制。但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马上随之改变，所以希特勒上台后，照样可以将权力集中到手中。这两个国家的情形说明，文化、意识形态并不是随宪政体制的改革就马上改变。

日本现在的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是不是因为其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没有完全如英美一般？能不能把任何经济困难，都认为是宪政体制改革的问题？难道英美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之后就没有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了吗？美国1929年出现过经济大萧条，比1991年以来日本出现的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也从工业革命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宪政体制有问题呢？《宪政》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十分意识形态化的。(15)

依我的分析，日本目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二战以后，日本依靠后发优势，利用技术引进维持了40年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很容易出现股市和房地产经济泡沫，房地产、股票价格飞涨。80年代时人们常讲的一个比喻是，日本如果将其全国房地产卖掉，可以买下八个美国。其股票价格最高时，日经指数达40000点，现在跌到12000点左右。泡沫在吹起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有钱，需求十分旺盛。日本主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内需要，虽然外贸出口总量很大，但仅占GDP的8%—9%，91%的生产是为了国内的消费。当泡沫破灭，财富急剧萎缩，需求也跟着萎缩，出现了两个困难：一方面金融体系急剧恶化，原来用房地产、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现在成为呆账，形成了金融危机(16)；另一方面需求不增长甚至下降，原来在高消费需求时形成的大量生产力就变成过剩生产能力，形成了通货紧缩。(17)因此，虽然日、美的宪政体制有所差别，但是造成当前日本经济困难的原因，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后造成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

苏联从3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在5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后来增长速度放慢了。《宪政》认为是因为模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但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产权制度，造成国家机会主义而最终致使经济发展失败（该文第2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和中国都推行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早期靠大量的资源动员而有一段由投资拉动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可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维持必然要求加速动员资源，当资源动员遇

到极限，快速增长就无法维持下去。苏联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所以这种靠大量资源动员的增长方式从30年代一直维持到70年代。(18) 而中国的人均资源非常少，在“一五”计划时期资源动员力度相当大，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到“二五”、“三五”计划时期，资源动员越来越困难。所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维持不住，开始向地方分权，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并调整价格来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农产品价格为例，1978年之前已经把计划价格提高了四次，计划价格和农贸市场价格的差距一般只有20%—30%。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在开始时都有一段投资拉动的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后来经济增长都难以为继，其问题根源同样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林毅夫，2002）。(19)

四、发展战略、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和改革的途径

（一）发展战略、后发优势与劣势

如本文第1节所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既然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而具有后发优势，为何从二战以来，真正利用了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缩小或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仅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困难重重？其原因其实在于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且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且便宜，由此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是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如果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区段不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产业区段中企业的产品不会有竞争力，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只有靠国家的保护才能生存。如果企业数量少，可以用税收的方式进行补贴。但在赶超战略下，要优先发展的往往不只是几个企业，而是和重工业有关的好几个产业部门。靠财政税收来补贴力不从心，只好以政策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由行政力量直接配置各种有限的资源到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并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部门的发展（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在这种赶超战略下，无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都将被抑制，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企业没有积极性改进生产，整个经济效率很低。在市场经济国家，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Lin and Tang，1999）、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林毅夫和刘培林，2002）、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林毅夫，2002）。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制度扭曲。

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林毅夫，2002）。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提升其产业结构，必须先提升其要素禀赋结构，即增加经济中每个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诱导其企业较好地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则每个企业都会有“自生能力”，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补贴，就预期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林毅夫，2002，第272页）。这样的经济在竞争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创造更多的剩余和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也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最低，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如《宪政》所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未完成宪政改革，但他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实现了后发优势，赶上或大幅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些违背比较优势，想在产业和技术上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已经实行了宪政体制改革的印度，还是未实行宪政体制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或中南美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有的甚至还扩大了（林毅夫，2002）。所以，如果后发国家有可能出现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出现不在于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体制的改革就进行技术模仿，而在于技术模仿的赶超，不得不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

（二）经济改革和发展绩效

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在二战以后推行了赶超战略，导致后来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不得不对原来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其中中国和苏联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自1979年开始，到80年代末已经相当成功。但是在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没有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推行的是双轨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以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为主。因此不少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俄罗斯和东欧其他国家在90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杰弗里·萨克斯等人主张，要改革就必须与计划经济一刀两断。他们当时常打的比方是改革好比砍小狗的尾巴，渐进改革是一节一节地砍，而休克疗法是一刀砍断。当时提出的休克疗法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私有化，推行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私有制，激励机制才会健全，预算软约束才能消除；二是价格自由化，价格必须由市场竞争决定才是供求均衡价格，资源配置

才会有效率；三是财政硬化，不能有太高的通货膨胀，必须减少财政赤字，否则市场和价格就不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20]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推行休克疗法后，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等种种困难。如何解释休克疗法的失败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呢？《宪政》对此所作辩解的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国有制，产权不清晰。但无可否认，乡镇企业对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出口来看，1987年乡镇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11%，到1993年提高到35%。从雇佣劳动力的角度看，到1994年，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1.2亿，比国有企业的1.1亿还多。但是《宪政》认为乡镇企业不是制度创新，只不过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制度的翻版（该文第5节）。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办企业是国有的，中国“洋务运动”中的企业也是国有的，都不是地方政府所有。第二，日本的官办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当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企图拿来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进入当时最先进的产业，而我国的乡镇企业一开始就面对市场，以获利为目的，发展的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两者之间不管是目标还是产业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进一步从制度的内生性来说，在乡镇企业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意识形态以反对私有制为主流。乡镇企业能在这种背景下生存，既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容，又能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进步，又何必非私有不可呢？再者，与其选择私有制，却因意识形态的强大而终遭夭折，还不如发展一种中间形态。事实证明，在推动经济发展后，乡镇企业逐步私有化，因为意识形态对私有经济更能接受了，这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相反，如果当年不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得不到发展，那么今天也就等不到发展私有经济的机会了。因此，《宪政》关于乡镇企业这种制度会导致和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妨害经济发展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其次，中国的农业改革在国际上普遍被视为最成功的。但是《转轨》的作者在其英文原作中认为，中国的农业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其依据是把中国1952到1958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往后推到1978年、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业生产增长率正好与1952—1958年的增长率一样，所以认为这种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没什么了不起（Sachs，Woo and Yang，2000，p.462）。但这种观点是牵强的。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三四十年里的增长都是无法用三四十年

前某个时段的增长率来外推的，即使是美国的经济，也不能从长期的增长中找出某个时段的增长率，然后划一条直线，就推导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并且因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是一样的，就说这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第二，1952—1958年是农村生产组织集体化的过程，从个体变为集体，按《转轨》的理论是属于国家机会主义强化的过程，既然对这种所谓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又岂能将当时的增长率作为正常增长率往外推呢？

《转轨》作者在英文原作中否定的第三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做法，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是一个糟糕的制度（Sachs，Woo and Yang，2000，pp.471—476）。双轨制固然会造成贪污腐化，但是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以计划来配置物资；一是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机制。前者没有效率，已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后者却会造成很大混乱，原因首先在于，原有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能让他们倒闭，因此，预算软约束不会因为实行私有化而消除，实际的结果是不减反增（World Bank，2002）；其次，市场放开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大量的垄断仍然存在，私有化后的垄断者会乘机抬高价格，造成市场混乱；最后，休克疗法后，原来经济当中的很多经济链条断掉，使生产崩溃，经济剧烈下滑。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和配置，政府可以继续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避免了经济崩溃和失控危机；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让有自生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虽然在转型过程中，双轨制确实导致大量的贪污行为，但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决策是按照市场价格信号来作的，因而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计划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市场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放弃计划轨也就更加容易，现在除了金融市场以外，其他的价格都已经从双轨制并到市场的这一轨来。

双轨制的存在使国家可以不断利用市场价格来调整计划价格，所以两种价格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保留计划轨会滋生腐败，在政治上的代价很高，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放弃双轨制的经济代价变小，实现市场单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所以双轨制是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宪政》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由于双轨制既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给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所以，实事求是地讲，它是一个远比休克疗法成功的改革方式。(21)

结　束　语

《宪政》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为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作辩护的。本文通过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发现，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要先实现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可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不知道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实是内生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直接定位在产业和技术向发达国家的赶超，使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遭遇种种困难。

虽然后发国家不必像《宪政》主张的那样，先进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等宪政体制改革成功了以后再来发展经济，然而并不是说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了，市场交易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提高了，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这样上层建筑才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的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和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起来，可能非驴非马，也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在将来被扬弃，但只要能推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好的制度。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后发国家中远大于发达国家，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推行相应的政策，才能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力量得到最快速的提升。随着微观主体相对经济力量的提升，以法治来界定政府和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经济基础也会越来越厚实，后发国家只有在制度创新上有足够的弹性和活力，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动，满足上述制度创新的要求，才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亨廷顿、塞缪尔：《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年1月，第269—300页。

［3］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5页。

［4］林毅夫和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2002007，2002。

［5］Lin, Justin Yifu and Jeffrey Nugent,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Jere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 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33，Amsterdam：North Holland，1995，2301—2370。中译文收入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5页。

［6］Baumol, William J., Robert D. Willig，and John L. Penzar,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New York: Harcourt，1988.

［7］Easterly，William,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World Bank，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meeting in Cairo，2001.

［8］Lin，Justin Yifu and Mingxing Liu,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in Lagging Reg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5th World Bank's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o be held in Bangalore, India on May 21 and 22，2003.

［9］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of 1999，Vol.89，No.2，426—431.

［10］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Paris: OECD，1995.

［11］North, D.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Rosen, George, *Contrasting Styles of Industrial Reform: China*

and India in the 1980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3］Sachs, Jeffrey,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v.2000，Vol. 1，No.2，435—491.

（此文可从http://www.aeconf.net/nov2000.htm上下载）。

［14］Srinivasan, T. N. ed.，*Agriculture and Trade in China and India: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since* 1950s，San Francisco：ICS Press，1994.

［15］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6：*From Plan to Marke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6］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7］World Bank,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2.

---

(1)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4期。

(2) 该观点也见杨小凯2000年12月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演讲全文见“后发劣势”，《天则双周》181讲，2000年12月1日（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181.htm）。《宪政》的英文原稿见Sachs，Woo and Yang（2000），翻译成中文时略有删减。在本文的商榷中，涉及天则研究所的演讲及英文原稿的观点时，将直接注明出处。

(3) www.ibm.com/flat/fncl/3-5-18-fncl-notes.html.

(4) www.prolytix.com/mot/table2.html.

(5) www.intel.com/intel/annua100/f-sumary.htm.

(6) www.anrpt2000.com/financialhighlights.htm.

(7) 大部分技术的基本理论并不复杂，重要的是如何将基本理论变成商业和生产上可行的产品，这是生产要素、生产流程的组合。发明前要进行许多尝试，一旦发明出来很容易就被学会。在这方面制药最明显，比如新药的发明，要经过无数次尝试，进行临床试验，成本相当高。一旦发明，生产成本很低。在这种情形下，专利出售价格不能太高，否则会鼓励侵犯知识产权。当然发明人可以向多家公司出售专利，总回报率也可以相当高。

(8) 由技术决定的增长潜力是否可以实现还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经济体制和交易费用的高低等。这些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内生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详见第4节的讨论。

(9) 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1820年法国人均1　218美元、英国人均1　756美元（Maddison，1995，p.194，p.196）。

(10) “There is a universal institutional core that is essential for long-term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Sachs，Woo and Yang，2000，p.455）.

(11) 在讨论中许多学者把“后发劣势”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存在许多缺点，需要改进。在此我想指出，“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特指的是后发国家会“因为技术模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阻碍了制度模仿的积极性，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致使长期经济发展变为不可能”。基于这个观点，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像苏联那样先进行宪政体制改革。

(12) 杨小凯关于共和宪政和国家机会主义的观点其实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不先实行共和宪政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又说，19世纪时法国和英国比起来是轻徭薄赋，因为法国是专制主义，不像英国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又说薄赋轻徭是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杨小凯，2000）。如果薄赋轻徭真是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那么，共和宪政就不是限制国家机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了。

(13) Britannica，2002 Deluxe Electronic Edition，“Revolution of 1688”and “Bill of Rights”entries.

(14) 参阅林毅夫与Jefferey B. Nugent合作的《制度与经济发展》一文，原文发表于Hollis Chenery与T. N. Srinivasan主编的《发展经济学手册》第3卷，中译文收入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 在《宪政》和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中，共和宪政的改革与否似乎成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败的标签，例如在讨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成功时，日本的成功被归因于实现了宪政体制改革（杨小凯，2000）。可是在《宪政》中又说是因为未实现宪政改革，日本才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及出现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

(16) 泡沫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特别容易产生。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随着经济发展需求将增加，供给弹性愈小的价格增长愈快，土地、房地产、公司股票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供给弹性。人们预期经济发展，整个社会需求会往外移。当价格增长大于银行储蓄利息或投资于产业的回报时，人们会购买房地产、股票以赚取涨价的收益，购买者很多会把价格推得更高，出现投机。成功有示范效应，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投机，价格就愈涨。房地产、股票在泡沫经济期间常会一年涨20%—30%，甚至更高。投机者会向银行抵押贷款来投机，以赚取更大的收益，投机的钱愈多泡沫吹得愈大。出现更多的投机。银行因为有不断增值的房地产和股票作抵押，愿意借出更多的钱。问题在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之后，供给弹性低的产品价格跌得更快。当人们预期经济增长放慢，会有降价的预期，手中有房地产、股票的人就会抛售，泡沫就会破灭，抵押的房地产、股票就不值钱，于是出现了银行危机。日本在1991年以后出现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在1929年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萧条都是由于上述机制造成股市、房地产泡沫破灭而造成。

(17) 生产能力过剩就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降。企业有过剩生产能力时，企业开工不足，盈利下降，员工工资与就业预期也随之下降。永久收入的预期变坏，消费也会下降。当投资与消费都下降，就会使生产力更加过剩而进入恶性循环。

(18) 苏联是世界上人均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经济学家说，如果苏联将开发出来的资源全部运到国际市场卖掉，国内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苏联人会生活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到美国对肯尼迪总统说“我们会将你们埋葬掉”，因为当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苏联还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动员。90年代本币高估，造成生产积极性不高，必须大量进口来满足一般人的生活需求，而能出口换汇的制成品和农业产品很少，只有出口黄金、石油、木材等自然资源。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要维持同样的增长速度，所要动员的资源越来越多，不能长期维持增长。

(19) 《宪政》以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来解释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早期的成功，如果这是主要的原因，在转型前，苏联和中国除了军事工业外，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程度都还有很大的差距，模仿的空间应该还很大，经济应该还可以维持快速的增长。

(20)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当时是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后来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时也邀请他担任顾问。

(21) 伊斯特利（Easterly，2002）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在1960—1979年间和1980—1998年间的发展绩效后发现，在前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5%，后一个时期普遍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休克疗法即是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提出的），但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下降为0.0%。林和刘（Lin and Liu，2003）认为其原因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赶超战略的事实，许多制度扭曲是内生于原来的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先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而遽然替换原来的制度，会使原来的次优结果变为三优、四优。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 (1)

传统中国的文化地位

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文化。中国人一向以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为荣。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明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成就。

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一般认为，在公元元年的时候，西汉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分崩离析，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反观中国，自汉朝以后，虽然分分合合，但合的时间多于分的时间，在唐、宋、元、明以至清帝国早期都曾出现脍炙人口的盛世。 (2)

中国长期的文化、经济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非常羡慕、崇拜，而且对周邻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著名的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文化。 (3) 中国文化还影响到韩国、越南、泰国等周邻国家。 (4)

工业革命以前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 (5)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古典希腊传统，重读古希腊哲学，摆脱中世纪神学对思想的钳制；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以人为本

的儒家哲学。总之，中国文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现代化努力与中国文化三层次

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国力日渐式微，不复为世界中心。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甚至有亡国亡种的可能。在那种状况下，很多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从单个人来比较，中国人不傻笨，为什么中国不如西方？在东西文化的冲击当中，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想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吃人的礼教，中国要复兴，必须打倒孔家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中国人有很多劣根性：保守、乐天知命、圆滑、不求甚解、自私 (6) 、特别容忍恶势力和社会不公正 (7) 、夜郎自大。中国人行为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彻底地拿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对抗，以今日之我来否定昨日之我。必须打倒孔家店、改变文化才有可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他们把中国所有的落后、一切的困难都归罪于文化。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的头脑里还根深蒂固。

最近则有一股新思潮大力肯定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出现新兴工业化经济，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日本人均收入在1988年超过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在1996年赶上美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全世界除了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外，就只有这些东亚经济真正赶上或大幅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脱颖而出，发展这么快？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共同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俭、刻苦、重视知识 (8) 、重视长幼次序 (9) 、重视朋友有信 (10) 。这些学者又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全都归功于儒家文化的优点。有趣的是，这种说法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持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11)

可是儒家文化在东亚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五四以来，不仅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批评儒家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而且凡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样对儒家文化有很多指责 (12) ；今天该地区的经济振兴了，人们又全部归功于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岂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儒家文化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阻碍了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成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哪一个说法是对的？是两个都对，还是一个对、一个错，还是两个都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

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这正是本文想探讨的主题。

要谈中国文化的作用，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文化。当然文化有各式各样的定义，我个人比较接受费孝通先生的老师Malinowski的定义 (13) ，他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在一个国家、社会里的人们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样。当然这个层次的内容还包括国家打仗时用什么武器，是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第二是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等等。第三是价值观念的层次，人的行为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 (14) 这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文化的有机整体。

有例为证：在原始公社，从生产工具来看，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游猎社会，打猎一般用长矛、箭，矛尖和箭头是石头打造的；从社会组织来看，原始公社社会可能有一个领袖，但其他社员基本上很平等，也有一些分工，比较进化一点的分成武士、猎人等，组织方式与现代很不同；从价值观念来看，很多东西不分你我，共有共享 (15) ，而现代社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16) 。人类文化学者考察原始社会时，主要记录用什么工具生产、组织方式是怎么样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的。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在不同社会、不同地方或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都不相同。不妨再举一个关于市场交易的例子：原始社会人们打猎以后，自己吃穿以外还有剩余，就要进行交换，把物品放在路边，路过的人看到就知道这个物品可以交换，可以拿走，放物品的人会躲在树后看有没有人来拿走，拿走时有没有留下物品来交换，这是一种组织方式；今天如果你在街边看到别人的物品，绝对不能拿走，否则别人可能把你送到警察局，告你偷窃。原始社会放在路边的物品别人可以拿走，当然也有一些行为准则，拿时必须留下一点交换的物品，如果拿了物品而没有留下交换的物品，原始社会的人可能会千里追杀，进行报仇，这都是价值观念。现代人看到自己的物品被人拿走，会向警察举报，但不会千里追杀，或派个人来暗杀，否则会以预谋杀人的罪名被告到法院。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包括器物、组织、行为规范的不同。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任何一个文化中的器物、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会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使用这个定义来观察中国近代一些历史演变，很多社会政治运动特别容易理解，而且可以进行分段。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文化全面领先于西方，不仅中国人这么认为，亚当·斯密和许多外国学者也接受。 (17)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且在接二连三战

败后开始进行反省：到底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从一个一两千年来基本上是独霸一方、万方来朝的国家，突然间变得屡战屡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中国有亡国亡种之危险，在这种状况下，怎样使中国强盛起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最早的思考认为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是好的，中国被西方打败，是由于枪炮不如西方，没有铁甲船。反思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思潮。在这样一个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30年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购买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海战之前，中国人和许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会打赢。因为按照吨位计算，当时北洋舰队位居全世界第五位、亚洲第一位，按照武器先进性，中国海军用的是当时世界最新的大船、最新的武器装备。同时期的日本，在美国海军上将佩里率领的舰队威逼下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甲午海战之前，日本的船比中国小，而且很多是日本自己造的，也不先进。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外国评论员看好中国，结果中国却败于日本。(18)

甲午海战对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日本一两千年来长期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以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短短的时间里即能够打败中国呢？原因在于改革比较彻底，他们除了学习西方的洋枪大炮之外，还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政治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内阁制，由在国会里面获得多数的政党组成内阁；在军事方面，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属于各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在教育方面，推行西方的义务教育；在经济方面，建立西方的现代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除了学习西方器物层次的洋枪大炮之外，还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其中有两派不同的想法：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主张在清廷基本框架之内进行与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改革，推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制度；另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即使进行改革也不行，必须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实行同美国一样的、以总统为国家元首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包括其他的经济社会教育制度。(19) 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虽然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比洋务运动时的认识深了一层，认识到除买枪炮外还要有社会组织改革，但是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让中国马上强大起来。(2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加战胜的协约国一方，可是战胜以后，被德国强占的租界青岛却被强行转让给另外一个列强日本。

第三层次的思考就是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认识到中国要强起来，不光在军事方面要有洋枪、洋炮，现代化的军

队，也不光在政治方面要有宪法、总统、议会，或建立像北京大学[21]这样的新学，还要有文化方面更深一层的东西，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只有实现了这些行为取向、是非标准等价值观的现代化，中国才能够强大起来。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中国从一个万方来仪的天朝大国遭逢时代巨变，沦为差点亡国亡种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运动的认识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到精神层次不断深化，但是怎样才能让落后的中国重新崛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作参考。

第一种理论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也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两三代人。为什么全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发达国家都是在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强大呢？当时看来，资本主义跟一国的强盛有一定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强调储蓄、辛勤劳动、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新教卡尔文教派先提出的一个价值准则，这个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认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过去的伦理道德确实有不少跟现代精神不符合的地方，中国应该如五四时期提出的那样，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换言之，不仅要有西方的器物和组织，而且在精神价值层次也要“全盘西化”，才可使中国重新站立起来。这个观点对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大。[22]

这种观点理论上也许自恰，但实践上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并非作为基因与生俱来，而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学来的。[23]即使我们接受韦伯的观点，认为必须在价值文化上先改变，或是像《河殇》作者那样主张全盘西化，在价值、伦理上全部接受西方，可是，只要让中国人在中国社会里长大，长大以后就还是中国人，就不能在伦理、价值这个层次上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接受西方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基本上就没有重新强盛的希望。

另一种理论则是马克思的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该理论认为，文化的三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组织、精神、伦理等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就会跟着变。而根据韦伯的理论，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我自己比较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24]

比如，原始社会特别强调互助、合作，共有、共产，这是一个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经济基础有关。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原始的枪、矛，生产方式是原始的游猎，野兽比人类跑得快、力量大，人类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办法捕获野兽，所以形成原始的部落社会。每个部落可能分成好几组人出去打猎，有的组打到了，有的组没有打到。打到的组把猎物拿回来以后不见得能一次吃完，如果不让别人分享，也没有办法储存，所以最好还是共产、共享，这样下次这个组如果没有打到猎物，也可以分享别人的猎物。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共产、共享的价值准则可以分散每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风险，使公社内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更大的生存可能。后来生产方式从游猎变到农耕。和游猎比较起来，农耕有以下特点：其一，农耕社会生产水平比较稳定。播种以后虽然也受天气影响，但产出多少、什么时候产出基本上能预期。其二，生产出来的东西较容易保存，粮食吃不完晒干放到明年还是粮食。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共享作为一种保险手段的需要就减少了。因此，生产组织由公社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积极性，有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市场交换的制度也发生了改变。(25)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一个文化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也会不断变化。当两个不同的文化——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另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接触以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怎么发展的问题，二是上层建筑怎么演化的问题。成功的现代化必须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同时得兼，就有孰先孰后的问题。既然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那么，对于一个原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处于自恰状态的文化体系来说，其现代化必须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入手点。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不断的调整，不断被赋予新生命、新内容。否则，落后的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妨碍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中国文化的上层建筑能不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调整？尤其是精神层次的东西。(26)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应该是可以非常乐观的。因为要看一个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发展，主要看三方面：其一是要素增加的可能性有多大。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的增加，因为土地一般是给定的，劳动力的增加

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能够增加得比较快的是资本。其二是生产结构。把给定的生产要素由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产业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经济也会增长。其三是技术。给定同样的要素、生产结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也能发展。

在这三种主要来源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因为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投资报酬就会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会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率。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所以，结构变迁的可能性也同样取决于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就是说，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含义不同。如果是最发达国家，那么innovation等于invention，创新等于发明，发明来自R&D，必须花很多钱来开发、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innovation可以等于invention，但是除了invention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叫imitation，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差距来获取新技术。因为创新的含义只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活动当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新，比现在的技术好，但不见得是最新的技术。对于发达国家，创新只有发明一种方式，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可以既是发明，又是引进。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到底选择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是对成本的考虑。通常，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R&D是非常昂贵的。现在的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最热门产业，在2000财务年度，IBM的研发投资是43.45亿美元(27)，英特尔的研发投资是38.97亿美元(28)，摩托罗拉的研发投资是44.37亿美元(29)。而且投资不见得都能成功，有点像买彩券，有一定的中奖概率，但中奖概率很低。根据一些研究，平均起来100项研究当中，大概只有5项是成功的。成功的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获得20年的专利保护。但获得专利的技术也不见得都有商业价值，因为很多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喜欢，没有人买，或价格太高，消费者买不起。根据研究，在10项获得专利的技术当中，到最后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大概只有一两项。从这种角度来讲，在100项最尖端技术上面的R&D当中，最后有商业价值的可能只有一项。成功的这一项的回报率会非常高，但是，如果把99%失败的成本也算进来，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研究的回报率其实并不高，而且风险很大。另外，要跟IBM竞争的话，每年要投入40多亿美元，即使靠政府的预算也难以为继。我国中央政府在2000年的预算不过就是七八千亿人民币，也就是1000亿美元。如果说IBM一年用40亿美元搞研发，25

家IBM这样的最前沿的公司一年就是1000亿美元的投入，我们是很难负担得起的。

技术创新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一般来说，引进技术比发明技术便宜多了。因为一个技术专利保护期是20年，超过20年的可以免费使用。即便是引进20年之内的技术，研究表明，顶多也只需要付原来发明这项技术的成本的1/3左右。而且引进的技术一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而不会是那些99%的不成功的、没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所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依靠引进技术可以有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由于引进技术成本低，引进就可以多、快、全面。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靠引进技术，技术变迁的面与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广与快，因而有可能以比发达国家快的速度来发展。很多人在分析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也反映了这个事实。改革之前，我们想在技术上面自力更生，实现赶超，于是花很多钱去搞最尖端的东西，技术创新的成本很高，经济发展也就困难重重；改革之后，我们大量引进技术，技术创新的成本低，经济发展也快得多。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未来三四十年、一两个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对这一点，我个人是相当乐观的。我想至少未来30年内，中国有潜力可以维持像过去20多年那样8%—10%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从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维持了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也维持了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如果他们以引进技术为主能有40年的快速增长，我国至少也同样可以有40年的快速增长的潜力。而且我相信，我们至少可以有50年或是更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不是说中国人比日本人、韩国人聪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开始以引进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在1979年，1979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大；而且即使未来20年像过去改革这20多年那样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赶上美国，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时人均收入才是美国的1/5。而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那就表明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还可以继续利用引进技术来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

我在提倡发展中国家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的观点时，经常引起两个质疑：首先，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完全不能也不要做R&D？其次，

如果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越来越近，能引进的技术就越来越少，总有一天要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国人会不会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而在将来失去发明创造的能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提倡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能，也不用自己作些R&D。一个企业引进来的新技术要和该企业现有的技术配套使用，新、旧技术双方可能都必须有些改变，这些改变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发明和创新。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对已有技术也要不断改进，许多小专利（minor patent）和生产程序专利（process patent）就是这种在生产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不断改进的结果。一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改进越多，和一个其他条件相同但技术改进较少的企业相比，竞争力自然也越强。同时，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当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一产业有一定比较优势，而没有那些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产业更有比较优势时，这类产业中的产品要改进，生产技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该产业中的企业也要自己作R&D来取得技术进步。但发展中国家除了国防安全方面绝对必要的原因之外，不应该在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风险又非常大的最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的R&D。其实，我们可以把R&D作为一个产业来看，这个产业也和一般产业一样，可以按资本的密集度区分为不同的区段。发展中国家在选择R&D的区段时，也应该按其要素禀赋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区段来从事。

不少人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担心，是看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现在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有些学者将日本现在的问题归结于日本人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人。对于这个担心，我想是不必要的。其实，在最尖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能投入多少钱。在最尖端的技术发明创造所依赖的科学原理其实已经是学界共知的知识。(30) 但要将这种最基本、人所共知的科学知识变成一个新技术开发出来，大部分的努力是在不断地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尝试错误很花钱，能花的钱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就像买彩券。(31) 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5倍，美国现在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大约是GDP的2.5%，如果到那时我们以同样的比例投入最尖端技术的R&D，投入的资金将是美国的5倍，我们成功的概率就是美国的5倍。当然，技术发明不是只靠资金的积累就可以，还要靠科学家的努力。科学家作研究，要有多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后天学习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先天的能力。对于后天学习来的能力来说，只要把功夫用足，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在起码的条件

有保证的情况下，一个科学家成就大小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其先天的才智。“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越多聪明的人从事科研，技术发明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所以中国的天才是美国的5倍，如果我们的资金投入是美国的5倍，我们天才又是美国的5倍，那么我们成功的概率将远大于美国。现在日本跟美国竞争，为什么日本这么困难？原因就在于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加上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美国是靠世界各国的天才，日本是靠自己的天才，所以日本技术发明的速度不如美国。而中国将来自己搞尖端技术发明的话，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天才就比美国多，而且我们到那时候可以打开国门让外国天才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决定因素是国内市场的规模。新产品、新技术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就越有竞争力。新产品、新技术的普及运用需要有一个技术标准，标准很难说哪个好，但标准是由政府来制定，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政府定的标准使用的规模就越大，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生产成本就越低，产品就有越大的竞争力。当中国人均收入和美国相等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市场规模也是美国的5倍。现在日本跟美国在尖端技术的创新上吃亏，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有些技术虽然是日本的企业先发明的，但后来美国政府定了不同的标准，日本的企业也只好跟着美国的标准来生产。但将来，如果我们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5倍，那么我国定了标准，美国的企业也必须跟着我们的标准走，在技术发明上我们就会有先手之利。

前面讲的是经济基础，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还有另一个道理：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随着经济基础变动，它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来看，中国的前途应该可以很乐观，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套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能不能与时俱进？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累赘？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儒家文化是否保守进行一些分析。儒家以孔夫子为代表，孔夫子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因为孔夫子讲自己“述而不作”(32)，言必称三皇五帝。既然是“述”，把三皇五帝时的那些典章制度整理出来，好像是复古，没有新东西，是不是真这样呢？其实不是。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孔子，“圣之时者也”(33)。他是一个能够根据时代、地点、环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但是恰当的行为的圣人。虽然“述而不作”，然而，他并不是把远古的东西原原本本地照搬过来，在“述”的时候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整理消化并且创新性地阐述过去的价值标准、典章制度。他的“述”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他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然后，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提倡能够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组织形态与伦理价值。所以，孔子并不是食古不化的顽固派。另外，不仅孔子，而且其

他儒家的大师们也都不是抱着传统，食古不化。例如文天祥对儒家哲学的总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仁尽而后义至。"孔子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孟子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以义为代表。仁与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里有二十几处讲到仁，比如"仁也者人也"(34)，仁是以对待自己那样的心来对待别人，所以孔子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5)，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6)，我希望有成就，同时我也帮助别人有成就。仁是以感同身受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里的其他人。那么，义又是什么呢？"义者宜也"(37)，就是合适不合适，与仁不一样。"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8) 孟子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39)。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而且孟子倡导"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40) 的精神。我内心反省我做的事情，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就是天下人都反对，我也应该勇往直前。直到后来宋明时代，儒学发展到理学，理学一方面是儒学对佛教哲学冲击的反应，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朱熹讲的宋明理学与孔孟所讲的原意有差距，朱熹主张"格物致知"(41)，什么叫"格物"呢？按哲学的解释是分析事情，分析它背后的道理，观察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然后去分析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以得到了知识。理学后来又发展到王阳明，王阳明讲"致良知"(42)，他认为每个人天生具有能够辨别一切是非善恶的良知，"格物"是把蒙蔽良知的私欲去除掉，以恢复人的良知、良能。所以，儒家哲学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每个时代的学者不断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赋予它新的生命。儒家哲学这套文化体系是可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扩大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能够和经济基础在动态的变化中一致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在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东亚经济中，才出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奇迹。

按照韦伯的看法，一个国家或地区必须全盘西化，在价值观念上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现代化。但是经验事实证明，日本、亚洲四小龙并没有那样做，日本人没有把所有小孩全部送到美国去读幼儿园，在那边长大然后再送回日本，台湾人也没有那样做，他们还保留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日本人到现在还是很尊重权威，跟西方精神有很大差别。美国、欧洲的精神强调平等，而不重视等级观念。可是日本不是也现代化了吗？我国台湾地区、韩国不也现代化了吗？

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让生产力尽快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会改变。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绝不会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准则。事实上是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到21世纪中叶，当我们的经济变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时候，我们文化上也会变成全世界最令人羡慕的文化。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在20世纪初，讲美国文化侵略其他国家的文化，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今天连欧洲都在提防美国文化的侵略。其道理是美国经济强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美国社会不管在组织方式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出现了与其相适应的方式。比如麦当劳是为了节约时间，还有摇滚乐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听古典音乐，要听很久才能听懂，而听摇滚乐每个人都会；学舞蹈的三步、四步要花较长时间，而学摇滚舞，只要会走路就会。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如果要赶上西方一定要在器物上赶上西方，在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交易组织方面可能会越来越趋同于西方，但是到最后中国人还是会保存让国外人一接触就知道是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就像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日本人仍然各自保持其文化特质一样，我们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文化还会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等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以后，中国文化到底会有哪几点特征呢？我没办法预言，因为这是在发展过程中，由社会竞争选择出来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只能说，在器物层次上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只要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发展道路，就能把技术潜力很快变为持续增长的生产力(43)；我也知道上层建筑如果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的话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国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其上层建筑是不断随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变动的，而且从东亚的经验来看，中国是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产生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当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中国的新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最后它是橘子还是苹果？到那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但我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会跟着复兴。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2年第9期。原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本文根据2001年6月6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所作的题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整理。感谢董先

安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笔记的同学在整理此文上所提供的协助。

(2) 宋朝武力虽不是最强的，但在国外研究中国科技、经济的学者认为宋朝比前几个朝代成就更高；元时出现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清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大帝国，从版图来看，清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济成就、文化发展的程度是当时全世界最领先的。与中国相比，当时欧洲处在黑暗世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国是一个发达、进步的工业经济，全面领先于西方。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中国整个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是以一种非常崇敬的眼光描绘的。

(3) 诚如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当时日本派遣唐使、遣唐生来中国学习各方面文化。唐朝长安的模样，有一个实物的模型，就是日本京都，规模虽然比长安小，但整个建筑布局完全照搬长安。此外，日本人读中国四书五经。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崇尚明朝王阳明的理学。

(4) 韩国非常好地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越南河内至今还有关帝庙、观音寺；泰国大王宫画的门神与中国的寺庙的门神一样。

(5) 直到19世纪中国人仍觉得外国人是蛮夷，我们是“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中心。当时对英国人的称呼“英吉利”的旁边加“犭”。

(6) 从中国俗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见一斑。

(7) 把中国人同犹太人作对比，有很明显的不同。在二战中，中国人遭受日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近两千万中国人在二战中死伤；在欧洲，德国屠杀六百万犹太人。今天，犹太人还在世界各地，哪怕天涯海角，追缉当时的纳粹分子，可以说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但是二战结束后，蒋介石竟然以德报怨，甚至把屠杀中国人的冈村宁次等请

为座上客甚至坐上师，请教怎样打仗，表现出中国人对社会不公、恶势力很容忍，没有原则。

(8)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重视知识似乎特别合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9) 社会比较稳定、有秩序，不会乱糟糟的。

(10) 做人要讲信义，重信用与现代商业文明相当吻合。

(11)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在他著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

(12) 比如我自己在台湾长大，70年代以前要批评中国落后，最简单的就是批评儒家文化，说它讲的是吃人的礼教，以及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凡事差不多就行等等。

(13) 在费孝通等译的《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中，对Malinowski的文化三因子论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14) 比如宋江偷偷把犯人放出去，被人敬称为“及时雨”，成为梁山水泊的大哥；如果一个美国狱官偷偷把犯人放走，就会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坏人。

(15) 当时，如果一个猎人打到猎物带回来，整个公社里的成员都可

以来分享。当然，如果这个猎人没有打到猎，别人打到猎物回来，他也一样可以分享。

(16) 要是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我到你家把东西拿来用，你要把我送到警察局，说我偷你的东西。这与原始社会很不同。

(17)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描述中国："China has been long one of the richest，that is，one of the most fertile，best cultivated，most industrious，and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in the world."（p.71）；"China is a much richer country than any part of Europe，..."（p.189）（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first Modem Library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37）。另外一位研究工业革命前欧洲的学者Cipolla在比较中国和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情况时，则写到"the West in the Dark Ages was essentially agrarian and，in comparison with China，was poorer and under-developed."（Carlo M. 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1980，p.171）.

(18) 有一个稗官野史的记载。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所以甲午海战之前，为了让日本人知难而退，清政府就在上海黄浦江举办了一个阅军大典，请各国驻华武官来参观中国最先进的海军，目的主要想对日本人说甭打了，中国武器这么先进。日本当然很谨慎，派一位海军驻华武官来参加阅兵。但是阅兵结束，日本海军武官报告给他们的参谋本部说，他认为日本能够打败中国。因为，他参观海军阅兵的时候发现，军舰上的武器确实很先进，那些士兵也雄赳赳、气昂昂，但是就在黄浦江边还有几条没参加阅军大典的中国海军舰艇，舰上的中国水兵玩乐之外，还在烟囱旁边晒内衣内裤。他认为这样一个没有秩序、现代精神的军队必败无疑。

(19) 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很快就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戊戌变法少数的、也许是惟一的成果是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但是慈禧太后到了

义和团运动招来八国联军之后也认识到不改革不行，把六部尚书改为内阁制，成立议会，废除科举等，不过为时已晚。

(20)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的想法颇似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想法。后者以为，只要推翻了旧制度，马上可以过和西欧、美国一样的生活；当时中国人也认为，只要把清朝异族统治推翻了，建立起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制度，中国就应该马上强大起来。

(21)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22)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个电视系列片叫做《河殇》，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提出所谓黄色文明、蓝色文明，认为中国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发展出来的黄色文明，是一个以保守、落后、农业经济为主的文明。西方是一个海洋文明，蓝色是对外的，是征服自然的。《河殇》这种看法，事实上继承了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这一套想法，认为中国要强起来，整体的文化必须改变，不只是必须有卫星上天、有原子弹，有现代的组织，而且必须有现代的、跟西方一样的价值伦理。

(23) 中国有句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在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在七岁以前就定型了。人一生下来，就跟父母兄弟朋友邻里互动，从这些互动当中学习对、错、善、恶，对、善会受到奖励，错、恶会受到惩罚，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就由此形成。

(24) 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长期中一个文化应该是自洽的体系。在有外力冲击、有竞争，在一个快速变迁尤其是在经济基础中生产力的变迁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情形下，这个自洽的整体中可能有一些层次是先变动，有些是后变动，体系就会失去内部的均衡而产生矛盾、不适。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接触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器物层次的不同，这也是最容易学习的层次；其次是组织层

次，这也是相对容易学习的层次；最后才会是精神层次，精神上的东西既不能简单地学习过来，也不能强加上去，而必须有一个消化、再创造的过程才能在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

(25) 因为生产力水平低，没有很多剩余产品可以交换，原始社会将剩下的物品放在路边等待他人来交换，而没有固定的市场。为什么原始社会的人把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后，而不是人站在东西的旁边？因为如果要站在东西旁边看守，就必须浪费一个劳动力，而且不知道何年何月会有人路过；而躲在树后，到底人在那个地方还是不在，路过的人不知道，可以有时候看，有时候不看，这样劳动力就可以释放出来。当然，这样东西可能被白白拿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当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来交换的东西时，一定要千里追杀。因为如果不追杀，以后就不会有人把东西留下来交换。

(26) 上层建筑当中包括组织、精神两个层次。相比较而言，组织层次并不难学，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西方的宪法简单地抄过来。但要是没有相应的精神层次的东西，抄过来的宪法并不能产生相应的功能。许多人将美国的强盛归因于美国的宪法，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和美国的宪法基本相同，但拉丁美洲并没有强盛起来。“淮南为桔，淮北为枳”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

(27) www.ibm.com/flat/fncl/3-5-18-fncl-notes.html.

(28) www.intel.com/intel/annua100/f-sumary.htm.

(29) www.prolytix.com/mot/table2.html.

(30) 超导的原理，计算机芯片的原理，电容、电阻的组合形成0、1的开关来进行运算，这些基本理论在大学里就都教了。

(31) 如果中奖的概率是1%，买100张彩券的中奖概率就是买1张彩券的100倍。

(32) 《论语·述而》。

(33) 《孟子·万章章句下》。

(34) 《孟子·尽心章句下》。

(35) 《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

(36) 《论语·雍也》。

(37) 《礼记·中庸》。

(38) 《孟子·离娄章句上》。

(39) 《孟子·离娄章句下》。

(40)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41) 在朱熹看来，每个特殊事物从“理”和“气”这两个领域接受的先天之“禀”就构成它的“命”，并力求找到这个“天命”。

(42) 所谓“致良知”，是指先天知识、道德意识、良心或直觉知识的扩展。“良知”是原生意识。

(43) 关于怎样把潜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的理论和经验实证，请参阅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002）。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1)

联合国《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说：“环境恶化构成了对人类安全的威胁。”今天，中国已能确切地感受到这种威胁：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及温室效应；水土流失和不断恶化的土地盐碱化、衰退化和沙漠化；令人担忧的生物种类、数量的减少乃至枯竭……仅以空气污染为例，在我国，由于空气污染每年造成了近1100万急诊病人，这不仅加重了医疗卫生系统的负担，而且每年因此损失的工作时间相当于740万人年。据估计，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大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严峻的形势把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提上了日程。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已有很多人论及，这里不再多说。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是哪些因素令资源（包括水、森林、矿产、土地等等）以及环境消耗和退化的速度超过了其再生、补充或人造资源替代它们的速度，从而使发展变成不可持续？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手段或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一般说来，弄清楚了第一个问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知道了如何解答第二个问题。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1．严权界定和稳定

资源被过度开采和利用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家对资源都有使用权，而个人对资源的损耗、枯竭不必承担相应的成本。经济学教科书上常用的“公地的悲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有些地方，一个村庄的公共牧场，村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自由放牧，免费使用。由于土地数量以及牧草生长速度存在限制，每个牧场每年有个最合适的放牧数量。当超过这个数量的牛羊进入牧场，牧草会变得稀疏，草场会受到破坏。如果这个牧场是属于某一个牧民拥有的，多放牧得不偿失，自然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可是，当这个牧场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从每个牧民的角度来看，多放牧一头牛羊的好处是属于他自己的，而草场因此而稀疏的坏处是由村民平均分摊的，个人的得益大于个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每个牧民可能都会多放牧牛羊，最后，过度放牧就把这个公共牧场给毁掉了。

“公地的悲剧”说明的是，资源不是个人拥有，使得个人使用资源的成。本和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间产生差距，从而使资源被过度使用，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许多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其内在发生机制和上面所举例子的性质并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对清洁空气的无偿共享导致空气被严重污染，对河流的公共所有导致许多家庭向其中倾倒垃圾，企业向其中排放污水，对森林资源的共享导致林木被乱砍滥伐，对渔类资源的共享则鼓励了滥捕滥捞的行为……像我们日常所见的如北京、武汉这样的一些大城市的交通堵塞，也具有“公地悲剧”的特点：无偿使用的街道是公共资源，新车方便了新的车主，但每一辆新加入的车都会使交通更为堵塞，迫使所有先前的车主将车速减慢。

相应地，如果想改变目前许多公共资源（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或生长周期过长的资源）被过度利用的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授予个人。经济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科斯定理，该定理证明，一旦产权被明确规定，而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谈判、签约等等的成本足够低，则无论将产权划归给谁，最终总能达到该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和使用。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直接明确许多公共资源的产权到个人头上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显然不能规定清洁空气归谁所有。“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使用该资源的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当产权难于明确到个人头上时，政府可以使用征税来增加企业或个人使用该资源的成本，使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一致。也可以仿效国外一些政府的做法如发放许可证，直接规定污染的排放量、渔船的捕捞量等来控制公有资源的使用量。政府具体该怎样做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基本思路应该是大致如此的。

必须指出的是，产权稳定和产权明确同等重要。如果个人对产权的稳定没有信心，即使把产权明确到个人，那么，他也会对资源进行掠夺性的使用。在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承包期太

短，农民担心下一回承包的土地不会是同一块，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农民缺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掠夺性经营的情形。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合法地位的稳固以及承包期延长到30年之久，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也加强了。在把山林刚承包给个人时，许多承包人对承包合同没有信心，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乱砍滥伐山林的情形。但只要农民对承包合同的长期性具有信心，农民就会把树再种回去。同样的，在前面所举的公共牧场的例子，如果公共牧场是这个村庄的牧民长期拥有的，那么，在这些牧民之间也很有可能会形成相应的乡规民俗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2．比较优势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很不相同，有些地区在粮食作物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些地区则在非粮食作物或其他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各种产品有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下，前一类地区将多生产，粮食和后一类地区交换非粮食产品，而后一类地区则少生产或不生产粮食。这样，不仅双方都能从地区间的贸易中获得好处，而且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其资源禀赋条件相吻合，也有利于各类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可持续使用。

历史上，我国西南和西北的许多省区靠其植物、矿产和草场资源的优势发展当地经济，部分粮食则经由市场从华南和华中的省份获得。但自20世纪50年代推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各地区的粮食自给自足变成了一个政策目标。结果，那些本来在粮食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被迫将大量的山坡林地或是草场改种粮食作物，这一方面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还破坏了植被，造成了水土流失、草场沙化。因此，以市场为纽带，让各地区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分工的程度和市场的规模成正比”。同样的道理，各地能将其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什么程度也决定于市场的规模。市场的规模则和运输成本、仓储成本、通讯成本等成反比。各地要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不单要考虑本地的自然资源、人口和资本存量，而且还要考虑市场交易的成本，若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运输非常困难，即使政府没有诸如粮食自给自足之类的政策限制，当地居民也可能将大量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而不是发展其他经济作物或产业。因此，改善交通等和市场有关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另外，不仅国内的各地区经济应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世界各国也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面积相对较低，由于粮

食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我国在粮食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我国要达到全国的粮食自给自足，势必要把许多不太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也用来生产粮食，这样，环境的压力、土地资源的耗费就会较大。如果进行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就相当于进口了我国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既有利于我国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加入WTO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有益的。

3．人口迁移

我国地域辽阔，有些边远地区自然生态条件十分恶劣，土地贫瘠，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优势资源，而且交通困难，信息阻塞。那里的居民不得不毁林造田，在坡度很高的山岭地种植粮食，通过对周围贫瘠的自然资源，的直接索取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有这些活动都增加了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在自然生态条件十分恶劣，交通运输建设又十分困难的地方，改善人民生活，减轻环境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这些地区的居民迁移出去，以避免他们对周围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的使用，从而达到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4．经济发展

有人认为，保护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发展了，环境也会改善。

第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通常是人们直接以自然资源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的结果。任何国家处于低发展水平时，大量的人口总是从事以自然资源为直接投入要素的农业、采矿业等第一产业。经济发展了，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经济越发展，从事农业、采矿业等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就越少，而从事工业、服务业等自然资源使用量少的产业的劳动力就越多。经济发展实际上能减轻人们对自然环境直接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压力。

第二，环境保护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投入，经济越发展，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越多，可用于环境保护的资源也越多。而且，“好的环境”作为一种产品，人们对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很大。经济越发达，人们的收入越高，对包括拥有一个干净清洁的环境在内的生活质量的要求就越高，因而经济发展将从需求上推动着人们去寻求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造成环境恶化的首要原因常常不是别的，而正是贫困。而贫困显然只有靠经济发展才能彻底解决。

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要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又有赖于依照我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当前我国资源禀赋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积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将使我国的经济最具有竞争力，占领国际和国内的最大市场份额，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剩余，最好地积累资本，最快速地达到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快速的“小步快跑”的升级。而且，在当前阶段，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可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采矿业转移出来，直接减轻人口对环境的压力。

实行按比较优势“小步快跑”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要求产权界定明确和稳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可持续发展就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直接联系起来。

5．技术进步

有些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具有不对称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进步速度远远快于环境保护技术，因而技术进步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虽然在客观上，技术进步对环境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有赖于技术的进步。

第一，经济的发展以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为基础。只有在新技术的直接推动下，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才有可能将大量人口从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的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同时，只有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单产的不断提高，才能以更少的土地和农业人口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并满足人们不断改善食品结构的要求。

第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健康舒适的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将推动社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环保型技术的研究、发展、推广和运用。

总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可能将产权明确划分到个人并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所有者对产权稳定的预期，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促进产品和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推进技术进步，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年第11期（总第143期）。

人口老龄化和我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1)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13%，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统计学推算，到2010年，老龄人口将突破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8%；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1.5亿，占10%以上；到203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2.5亿，占总人口的16%。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增加需要照顾抚养的人口数量，另一方面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对一个社会的积累、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老龄化大多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它们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较多。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所幸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还会继续提升，必须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贯彻执行，以最大限度避免在将来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时，需要抚养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任何社会对老龄人口的照顾都必须有一定的安排，以使老有所养。传统的方式是靠自我储蓄和“养子防老”，以解决个人年老不能工作时的需要。但是现代社会人口、就业的流动性大，几代同堂的情形已不多见，家庭的规模变小，家庭成员间分散风险、相互保险、相互照顾的能力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来解决养老的需要，经常会有些人出现得不到最起码的必要照顾的情形。因此，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除个人在工作期间的储蓄仍然是个人养老时的最重要资金来源外，各发达国家还都建立一些辅助的体系，以满足最低的保障要求。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职工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每个人在工作时的工资并无养老金的成分，退休后的养老靠政府的财政拨款，通过工作单位发放给职工退休金来满足生活的需要；在农村，养老则靠农民自我的储蓄、子女的奉养和集体对无子女及无其他近亲直系家庭成员的老人的“五保”。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后，尤其是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怎样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建立一个长期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各界的讨论已经很多，一般认为必须是“个人积累、企业贡献和国家税收”三结合，在此不拟多加述说。

本文要分析的是和老龄化社会有关的人口政策问题。人口政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人口的质量和人口的数量。

人口的质量与教育有关。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若能提高劳动人口的工作能力，他们创造的财富和能够抚养的人口的比例就会增加，可用的资源多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由教育部领导亲自组织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课题报告中，对此已有较好的分析和规划，各界的看法不会有分歧，今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按照这个共识，在教育上，尤其是农村的教育上多下力气。

人口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口数量的问题。所谓人口老龄化就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过一定标准、年轻人占总人口中的比例低于一定的标准的一个现象，这是近期生育率低以及过去高生育率下出生的庞大人群陆续成为老年人的结果。如果生育率继续降低或是仍然保持在现有较低的水平，将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底开始严格执行的一个国策。十六大报告里仍然主张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对于人口数量问题，我们常讲毛主席错批了马寅初，造成中国多出生了几亿人，因此，现在不得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否则人口数量过多，会成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沉重负担。

回顾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那场争论，是不是马寅初的观点就必然对，而毛主席的观点就必然错？毛主席认为，一个人有两只手、一张口，双手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张口吃的多，这样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可以作出贡献，人多不是坏事。但是，从后来实践的结果，大家认为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观点是对的，而毛主席认为人多好办事的观点是错的，其原因其实在于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改革之前，我国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不仅不能把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市非农部门，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除了一个工作岗位安排三五个人来做，还必须让大量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各个部门人浮于事，效率很低；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在生产中得不到足够的资本和其配合，效率也非常低。这样人多不仅不是好办事，而且事实上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

可是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多是否必然就是坏事？从改革开放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发展最好、最快的却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且，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东亚的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或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经济体的人口密度都非常高，甚至比我国内地还高。比如，2000年我国内地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5人，而日本则是337人，韩国是479人，台湾地区是616人，这些都属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经济体。为什么人多在东亚经济体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却反而成了优势？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沿海省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多且便宜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非常有竞争力。日本和东亚的几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则是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在早期人多资金少时，就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随着资金的积累，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资金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产业才逐渐升级，发展资金、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这样看来，只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时，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就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得就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得快。而且，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的观点来看，只要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口较多的地方有以下特征：（1）市场规模较大；（2）生产活动较为密集，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包括纵向的支持（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程度会较高；（3）同行业的竞争会更为激烈。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发展战略是对的，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可能是一个优势。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政府可以用来补贴、保护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政策空间很小，经济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很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人口密度高的省份由于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不仅促进了这些省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每年从中西部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工。所以，在改变了传统的在资金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重工业的战略，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时，毛主席的人多好办事的理论就不再是不正确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今后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人多不会再像

过去是一个沉重负担。现在又逢已经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生育率上升一点，对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好处。因此，应该重新评估现有的人口数量政策，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如能这样，会是利大弊小的一项政策选择：现在农村中”三农”问题相当严重，原因之一在于干部人数太多太臃肿，其中不少是计划生育干部。需要养的干部多了，农民的负担就重。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又经常会引起矛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国际社会对此也有不少看法。在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点有利于上述农村问题的解决。而且，根据各国的经验，只要经济发展得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同时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至于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没有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以及诸如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等亚洲与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生育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改进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的原则，应该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

---

(1) 本文根据2003年1月11日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召开的“人口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感谢曾毅教授对本文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

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应该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 (1)

二战以后，以喷射机为基础的现代航空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通讯迅猛发展，交通和通讯成本大大降低，为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企业从单纯追求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过渡到跨国投资和经营，资金、技术、人员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自由，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技术可能性，将一个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细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并把不同的阶段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国家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的有利条件，是国际经济中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新组织形式。

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要素禀赋及相应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在微观上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就是一方面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在生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利用他国的比较优势，实现更为细致的分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低成本地利用本国和他国已有的技术、资金和资源，成为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不二法门。我国当然也不能自外于这个规律。

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的目的有二：一是开拓中国市场，推销其产品和服务；二是将我国作为其整个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利用我国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当前而言，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它们的到来一方面给我国提供了比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生产要便宜得多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获得更高的回报。同时，也给我国企业提供了从事现代化生产经营活动的学习样板，通过直接与这些跨国公司打交道，可以在技术、管理和经营方面学到很多东西。跨国公司雇佣我国的劳动力，也是对我国的白领和蓝领工人的一种职业培训。上述几方面，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十分有利。

至于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对此有正确的认识。跨国公司推销到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会增加我国生产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的竞争压力，但是，只有存在这种压力，才能提高我国企业的素质和效率，使我国的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这种压力也有助于我们清醒地看清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实事求是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只要我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更好更快地积累资金和人力资本，随着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必然会带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公司组织结构的升级。到那时，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大公司也可以

在全球的范畴内和现有的跨国公司一较长短，我国的大公司也有可能像现在充分利用当前劳动力便宜优势的家电企业在国内把日本、韩国等国外著名的家电厂商挤出中国市场一样，把现在的全球500强请下位来。另外，对于少数确实有可能在中国市场上产生垄断的跨国公司，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规范。对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到来我们应该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31期（总第111期），后来本文发表于《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挑战与机遇 (1)

1999年11月15日，我国和美国终于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有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我国朝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国与欧盟的谈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果不出意外，我国不久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继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第二次对外开放，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即将加入WTO的前景引起经济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有的人对此持欢迎态度，认为加入WTO利大于弊，将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国经济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顾虑重重，担心我国经济太脆弱，经不起加入WTO可能出现的巨大外部冲击，现在加入WTO弊大于利。实际情况究竟怎样，需要全面评价加入WTO对我国的影响。我国与欧盟的谈判尚未结束，但估计不会有太令人意外的内容。我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无疑是最全面的，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和美方达成的协议来进行分析。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在这次中美达成的协议中，农产品贸易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同意：立即放宽对美国小麦、肉食和柑橘等的动植物检疫规则。到2004年将农

产品平均关税降至17%（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关税税率降至14.5%）。大豆进口量无限制，关税不超过3%；酒关税从65%降至20%；牛肉进口税从目前的45%降至12%；猪肉从20%降至12%；鸡肉从20%降至10%；柑橘从40%降至12%；葡萄从40%降至13%；苹果从30%降至10%；杏仁从30%降至10%；乳酪从50%降至12%；冰淇淋从45%降至19%。敏感商品实行关税配额制，国有企业未使用完的配额将再分配给私营公司。豆油关税配额开始是170万吨，2005年增至358.7万吨，私营公司的份额将从50%提高到90%，关税税率为9%。小麦关税配额开始是730万吨，以后增至963.6万吨，私营公司占10%。玉米关税配额初始是450万吨，以后增至720万吨，私营公司的份额将从25%提高到40%。大米关税配额初始是260万吨，以后增至530万吨，中粒米和短粒米占一半，私营公司占一半。大麦无关税配额，关税税率将降到3%。豆粕关税不超过5%，进口量无限制。不向农产品出口提供补贴。

在WTO全部框架中，农业是最敏感、最难取得一致的领域，这一点不仅对于我国来说是如此，对于其他WTO成员国来说也是一样。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农业问题上不断谈判，不断争吵。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至今大部分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农业十分落后。许多人担心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会受到十分严重的冲击。我国粮食价格现在已经十分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如1999年3月份玉米的国内市场平均价格为1.44元/公斤，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0.72元/公斤。人们担心农业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加入WTO我国农业就必然会丧失竞争力。美国粮食价格相对便宜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粮食是土地密集型产品，美国具有比较优势。另外，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农业采取了诸多保护和扶持措施，包括农业科技开发、农产品出口补贴、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等。这些政策大部分都与WTO新近达成的农产品协议相悖，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WTO成员国正在推动旨在进一步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因此，美国现行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中的绝大部分是迟早要放弃的，由此造成的美国农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自然会大大削弱。西欧粮食生产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并不足虑。

我国农业人多地少，粮食生产并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之所在，进口一部分粮食等于是进口一些土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坏事。而且，现在粮食的国内价格水平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反映生产成本的实际状况，而主要是因为粮食的流通由国有部门垄断经营，效率不高，农民实际得到的收购价和消费者支付的购买价之间差距悬殊。按

照我国的承诺，这种状况在加入WTO之后会逐渐变化，因此，我国粮食的市场竞争力会有所提高。

另外，关于粮食的进口，我国和美国达成的是“关税配额制”，即在双方达成的进口配额数量之内实行低关税，在配额数量之外则实行高保护关税。中美协议规定的进口配额在开始时只有1440万吨，以后逐渐增加到2180万吨，一般来说进口数量不会突破这一配额限制，因为超过配额部分我们可以征收较高的保护关税，这些配额也不一定要全部用完。而且，即使将来2180万吨的进口配额全部用完了，进口粮食在我国粮食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到5%，影响有限。

除了粮、棉、油这些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之外，蔬菜、水果和畜产品在农产品贸易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产品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我国在这些农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一直是顺差，从1980年的5700万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8.2亿美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这类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2)] 要知道，这一成绩是在进口国很高的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之下取得的。WTO近几年已经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远的将来还会更进一步。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产品出口要方便得多。那时，即使是西欧和美国与我国竞争的农产品，在这方面也不一定能够居于优势，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成本高昂，它们现在的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保护取得的。可以预料，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产品出口将大幅度增加。沿海发达地区完全可以进口一部分土地密集型的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水果、蔬菜、畜产品生产和出口，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有效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同时实现农业结构调整和高级化，增加农民务农收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还有一个优点，即以往很少有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因此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从容与国外竞争。所以，总的来看，加入WTO并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意味着我国农业的大灾难，只要我们能抓住机会，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对农业结构和农业政策加以调整，加入WTO对于农业也是利大于弊的。

二、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电信部门的影响

中美协议规定我国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22.1%削减至17%，逐步取消所有进口配额和数量限制。我国同意将汽车进口关税到2006年从目前的80%—100%降至25%，汽车公司将享有充分的分销和贸易权利，我国也将允许外国对购买汽车提供金融支持，进出口不再必须通过中国中间人。外商可以从事产品分配、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业务。我

国同意外国投资者进入电信服务业，允许外商投资ICP（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中国加入后1年内允许外商拥有所注资公司49%的股份，两年后即可拥有50%的股份。我国将增加允许美国电影进口的数量，由目前每年10部增至20部。在纺织领域，中美双方同意，在目前和今后配额逐步削减过程中，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市场遭到破坏。

现在国内不少人担心的是关税等保护手段大幅度削弱之后会引起外国产品蜂拥而至，冲击民族产业。出现这种比较普遍的担心其实是好事，说明我国企业界已经认识到自己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会不会冲击民族产业则需要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他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渐减少，自从我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或WTO以来更是如此。比如1992年我国进口关税税率加权平均为40.6%，其中制造业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加权平均为46.5%，到1996年则分别降为22.6%和23.2%，进口关税降幅不可谓不大。但是，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并没有受到进口产品的强烈冲击，相反，经济还处于高涨状态。因此，既然这次我国承诺的关税减让幅度要小得多，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不会给我国民族工业带来大灾难。实际上，在我国全部进口产品中，占我国进口总值50%的加工贸易免税，三资企业进口自用投入品（占我国进口总值10%）免税，保税仓库进口商品（占我国进口总值的5%）免税，另外还有占我国进口总值10%的商品享受减免税待遇。由于减免税、走私等原因，我国实际征收的有效关税税率很低，有的研究认为甚至低于5%。

真正有可能受到冲击的是电信等垄断部门，这些行业由于高度垄断，经营效率不高，服务质量差，收费昂贵，加上这些部门对技术和资金条件一般要求高，一旦对外开放，很有可能受到国外资本、技术、经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强烈冲击。这次中美协议规定我国将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在电信领域，除了同意采用美国企业开发的作为下一代携带电话方式的符号分段多重传输方式（CDMA）之外，中国还将允许外资在所有电信服务领域中占49%的股权，在增值服务和寻呼等服务业中占51%的股权。目前中国电话费约为美国的7倍，服务质量因垄断经营提高很慢，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消费者的意见也较大。加入WTO后，将使中国电信市场由垄断转向激烈竞争。因此，这些部门就应该在加入WTO的过渡时期加紧调整，切实改变官商作风，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实力。当然，对于我国消费者来说，外国公司的介入会打破垄断，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福利改进。另外，电信、互联网部门一般资本密集、技术先进，初始投资量大，投资风险也大，并不是我国比较优势之所在，客观上也需要适当向外国企业开放，借助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加快我们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所以对其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汽车关税这次大幅度降低预计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毁灭性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汽车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很高，可是20年过去了，汽车工业至今也没有走出幼稚工业的局面。相反，高度保护形成的丰厚利润造成国内汽车厂家数量的繁荣，各地竞相上马汽车生产线，建立汽车生产企业，在地方保护主义作用下，全国出现几百家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汽车行业规模经济明显，如此众多的小汽车生产企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实力，民族汽车工业当然不能发展起来。加入WTO之后，地方保护主义违反WTO的非歧视和自由贸易原则，进口汽车带来的竞争，必然会挤垮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或迫使它们转变生产方向。这对我国汽车工业的整体发展未必全是坏事，已经成长起来的若干家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与进口汽车一争高低。相当大一部分汽车生产企业可以转向生产汽车零部件，为国内外汽车厂商提供专业化分工协作，一样可以发展自己。实际上，即使在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之下，我国市场上仍然充斥着大量进口汽车。高关税引诱人们通过各种途径低价进口汽车，得利的主要是走私者和少数有垄断权的机构。

至于进口影片从每年10部增加到20部，对于我国文化产品市场影响不大。影响我国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是其他因素，如国产音像制品的质量、国内文化设施的建设、居民文化素质高低等。

加入WTO之后，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大降低，将促进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纺织业、家电业、机电设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减少进口走私活动，从而部分抵消外部冲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国将能够更好地根据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入WTO之后，国内外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同一产品国内外的价格差距趋向合理，我们不得不接受国际惯例和国际价格体系，这样，长期困扰我国的产品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缓解。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那些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得到发展，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更为持久、健康。

三、加入WTO对我国金融服务部门的影响

中美协议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规定了我国必须承担的义务。据统计，到今年初，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在华共设立了191家营业性机构，总资产达36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已决定取消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从现在的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23个城市和海南省扩大到所有中心城市，并批准美国多家大银行的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批准多家外国银行的深圳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在保

险业，新允许四家外国保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设立合资企业。根据协议，我国加入WTO后，将在2005年之前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全方位服务业务，并允许外国银行在2005年之前开办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50%的股权，并增加设立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数。

可以预料，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业将越来越向境外金融机构开放。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金融业视为比较特殊的行业，不但对外开放十分谨慎，对国内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也有种种规定和限制。由于原来对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有诸多政策限制，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就会逐渐失去这种特殊的政策保护，外资金融机构逐渐享有国民待遇，我国金融市场将进入全面竞争时代。这给我国金融机构带来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金融业是我国与国有企业并列的两大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而又存在很大潜在问题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累积了比较严重的呆、坏账问题，政策性负担较重，同时，由于垄断经营，效率不高，整体素质差，缺乏市场竞争力。实际上，直到1994年我国才最终确立比较明确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并另外成立了一些地方性、全国性银行，保险公司数量也开始增加，对证券市场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加入WTO以后，四大国有银行垄断银行业的局面将被打破。它们的资产规模、经营业务量并不比国外的大银行大，经营能力和技术手段更是相形见绌，外资银行具有足够的冲击力来打破现在的垄断局面。当然，由于国内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银行服务网络，相对于外资银行有明显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能够保持多久，则取决于国内银行能否向外资银行学习，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力。而且，这种优势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主要的银行业务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外资银行可以比较方便地建立起自己的营业网点。外资银行进来后首先冲击的是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据统计，外资银行办理的出口结算业务已占我国市场份额的40%以上。

由于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服务效率高、种类全，在金融工具的创新上具有优势，实力雄厚，对客户吸引力大，所以很有可能出现一部分金融业务由中资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的大转移。比如存贷款业务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外资银行提供的服务周到，国内一部分企业和居民愿意将银行存款从中资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熟悉外资银行业务规则的外商投资企业就更愿意转向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开展贷款业务看重的主要是客户的资信和还款能力，业务规范、透明，国内

有实力的国有、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更愿意通过外资银行融通资金。在其他如票据贴现、保险业务、证券投资等业务上，外资金融机构都将拥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国有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倘若真的出现了银行业务的大转移，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引发金融恐慌，反过来加剧银行业务的大转移，以致国有银行实力大大削弱。国有银行是国有企业十分重要的资金来源，一旦国有银行衰落下去，那些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过来说，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金融机构在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只好奋起直追，努力向外资金融机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力。外资金融机构为我国金融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做法，能够提高我国的金融创新能力。这些都有利于发展我国的金融业，为国民经济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国内金融企业掌握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加快技术改造，积极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高服务质量，降低经营成本，我国的金融企业还是有可能与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竞争的。

加入WTO将打破我国原有的一些金融限制，这不仅有利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也十分有利于国内金融机构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国内金融业将出现自我调整，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将会迅速发展起来，效率太低的金融企业则会被淘汰。加入WTO之后，我国将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金融管理制度，政府将放弃长期实行的行政干预。预计利率将会市场化，国库券市场和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将更加规范，汇率的决定也将越来越市场化。这样，一些主要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都将市场化，国家的金融调控更为理性、透明，无论是非金融企业还是金融企业自身，在经营活动中都将获得更为稳定的预期。

四、加入**WTO**将深刻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加入WTO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发展中大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吸引大量境外企业进入，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加入WTO将增强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十分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加快现代化步伐。加入WTO还将为我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外市场针对我国产品和服务设置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大大减少，我国与外国的贸易纠纷有了更好的解决途径。开放程度的提高还将使我国人民和企事业单位更为方便、及时地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使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能够低成本地为我国人民掌握，加速知识、技术在中国的扩

散、推广。这些都十分有利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加入WTO后，我国也将面临十分重大的挑战。分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好处是有条件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往往需要我们作出一定努力之后才能实现。

加入WTO对我国最大的挑战将是我国政府将越来越难以用政策来支持、保护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试图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推行资金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和我国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想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为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支持优先产业的发展。(3)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变化，但是改革开放前形成的许多与我国比较优势不相符的重工企业还没有改造完成，而且，在许多人的意识里仍然留存着不切实际的赶超思想，还在热衷追求一些与我国当前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的产业的优先发展。为了维持这种产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2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残存着大量计划体制的东西，有些还是改革以后新出现的。加入WTO以后，这些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不适当的政府干预和管理手段都将不得不取消，与我国资源禀赋不相符的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具备自生能力，必然会面临困难。因此，我国需要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经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然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经济，将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更好、更快、更可持续地发展。要赶上发达国家最终必须在我国经济的总体技术水平上赶上，但是一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所以要提高总体的技术水平，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由于一国的土地是给定的，所谓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主要是提高每个劳动力所可支配的资本的数量。资本来自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所以要更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就必须更多地创造剩余。按照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将使整个经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积累最大的剩余，最快速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将能最快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的差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实现了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其秘诀就在于它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较好地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来作产业和技术选择。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上的诸多问题也在于它们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经济，结果欲速则不达。(4)

为了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也为了满足加入WTO的有关要求，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透明的法律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还习惯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政府政策多变，而且实际执行中弹性很大，对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法律制度不健全，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还比较突出。这种制度环境十分不利于企业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不能实现自主经营，经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经营能力，而且取决于政府可能的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许多事情必须求助于政府，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基本处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有些领域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垄断经营。非歧视和公平竞争是WTO的重要原则，加入WTO之后政府必须彻底放弃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放弃对一些行业的垄断。

加入WTO之后，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目标，就不能再依靠单纯的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而是要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间接调控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是在波动中发展的，为了使国民经济运行处于一定的目标区间，过去政府动辄使用直接的行政手段，或者利用企业所有者地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定它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经济过热时，强令金融系统紧缩银根，压缩信贷，直接掌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要求企业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经济不景气时，又强令金融系统放松银根，增加信贷供给，不惜采取行政措施要求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国家对粮食生产和经营的强大干预，甚至直接垄断经营，前几年还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这些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调控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其合理性，但是加入WTO之后则必须放弃，否则不但授人以柄，容易遭到他国援引WTO条款进行的攻击，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混乱，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奏效。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并不在于关税减让和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而是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作出重大改革和调整。一方面，它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是个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它对我们的改革事业也是个巨大的推动力量，把握得好，可以使长期困扰我们的若干体制改革难点顺利克服，加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立，改变沿袭已久的计划经济思维和不尊重法制的陋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全面履行WTO规

定的义务之前的过渡时期，应该抓紧时间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清理计划经济的残余，如打破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的市场化进程，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克服部门和地方利益的束缚，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

(1) 合作者胡书东，本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Z3期（2000年5月）。

(2) 卢锋："比较优势与我国粮食贸易结构：我国粮食政策调整的第三种选择"，载于林毅夫、海闻、平新乔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选编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80页。

(3)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外贸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经验地估计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传统上，人们经常使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计算外贸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既国民收入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按照这种

方法，某一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该年净出口比上年的增加量除以上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如，1999年外贸净出口比1998年减少约802.7亿元人民币（名义值，下同），而2000年的外贸净出口又比1999年减少约140.6亿元人民币。这样，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的1999和2000两个年度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负值。实际上，如果以1978年为基年，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然后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按照上述定义所给出的外贸贡献率，那么，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外贸贡献率分别为6.7%和-0.95%，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外贸贡献率分别为8.56%和-0.19%。而1981—2000年这20年中GDP年均增长率的简单平均约为9.66%，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简单平均却只有0.19%。按照这种“贡献度”水平，对外贸易的变化似乎不应该对整个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影响。但是，我们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直接观察却往往使我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出口滑坡往往是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认为，上述计算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进而，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2000年外贸贡献率为负值的结果也是值得怀疑的。怀疑的依据在于，按照上述方法，进口和出口的变动在计算外贸贡献率的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譬如，如果1999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亿元，2000年的净出口比1999年减少100亿元，则2000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1%——无论净出口的减少是由于出口减少了100亿元造成的，还是进口增加了100亿元造成的。实际上，出口减少100亿元与进口增加100亿元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因此，以会计恒等式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在计算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时将出口和进口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

为了避免传统方法的缺陷，我们建议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新的计算方法必须考虑到出口和进口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一般来说，出口的增加会同时导致进口、投资和消费的增加。进口与出口之间的紧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为了生产出口品需要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和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出口增加也会对消费和投资造成影响，则是因为出口的变化可以影响就业人口的收入和企业的赢利机会。另一方面，进口的变化则决定于国内的消费、投资需求的变化和出口的变化。

鉴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修正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将进口和出口分开考虑，即分别考虑出口和进口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我们主要关心出口增长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按照上述讨论，这一贡献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直接贡献。由于出口是国民收入恒等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口的变化必然对国民收入造成直接的影响。第二，间接贡献。出口增长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间接地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出口增长对进口的刺激作用则抑制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则是上述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之和。其次，即使我们想要构造一种能够和传统方法相对比的全面的衡量指标，即综合地反映出口和进口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指标，我们也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出口变动的间接影响，特别是出口增长对消费和投资活动的刺激作用。

当然，修正后的方法也带来了一些计算上的不便，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得到出口变化对消费、投资和进口间接影响的数据。出口变化的间接影响需要使用计量方法通过回归得到。这就涉及模型的设定、估计方法的选择和一系列统计问题的处理。因此，我们必须在上述各个方面作出缜密的安排。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设计了一个线形联立方程组模型来解决上述估计问题。该方程组包括四个方程，即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方程。消费、投资和进口方程的设定都尽量使用了标准的函数设定方法。然后使用1979—200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来估计出口的变化对收入和消费、投资、进口各个变量的影响，以便确定出口变化对国民收入变化的间接影响。最后，我们根据该回归结果来分别计算各年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于外贸贡献率，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定义为“净出口的贡献率加上出口通过引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间接贡献率”。

计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各个年度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变动的弹性接近0.1，即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个百分点。2000年度的出口增长率接近27%，因此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个百分点。此外，按照上面新的外贸贡献率定义，在考虑了出口增长的间接影响后，2000年度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再是一个负值，而是一个正值，1.48%。这表明传统计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关上述修正的详细讨论和估算，请参阅《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C2001008）。

最后，我们需要阐明上述修正的意义。该修正说明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始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当前特殊的宏观形势之下，我们既需要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对扩大内需重要性的强调与对外贸重要性的考虑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37期（总第259期）。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农民与消费者的影响 (1)

全球化和生物技术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十分有利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这又反过来促进国际分工与交易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生物技术或生物工程会带来农业产量的较大幅度增长，有利于增加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供应。从总体上看，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世界人民是有好处的，符合全世界的长远利益。然而，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利益群体在短期内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兴起通过作用于农业生产和国内、国际贸易而影响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对两者的影响一般是不一样的。本文打算探讨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全球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然后，针对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农民和农产品消费者的影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农民和消费者的影响

作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全球化导致进口农产品供应者多元化，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加上削减关税，进口国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就会明显下降，从而节省进口农产品所花费的资源。农产品价格下降对进口国消费者来说是福利改进，而对于生产与进口品相竞争的农产品的进口国农民来说，则很有可能是福利损失。

作为农产品净出口国，全球化导致出口市场扩大，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且，出口国能够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扩大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出口农产品的生产者有利。然而，出口需求的扩大会引起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这样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则是福利损失。

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会极大地增进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质，

因此会增加农产品市场供给，降低农产品价格。价格减低，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福利改进，但是对农民来说则有可能是福利损失。不过，如果在价格下降的同时，产量能够增加得更快，品质也能提高得更快，则农民的净福利还是增加的。然而，这种福利净增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农民必须能够及时低成本地获取生物技术。如果有一部分农民得不到这种技术，那么，这部分农民就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竞争中居于劣势，而那些能够得到生物技术的农民则占尽生物技术进步的好处。

另外，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将改变世界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生物技术可能极大地提高农产品产量，也可改进农产品生物特性。原来本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现在也可能因为技术进步而有了经济合理性。原来是农产品净进口国，现在也可能因为应用生物技术而成为自给自足甚至是出口的国家。即使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以前不适于在本国生产的某种特殊农产品，现在也可能因为生物技术的应用而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制约，可以生产出替代性农产品品种。这对生产某些特殊农产品，如生产香料的一些太平洋岛国，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二、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面对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兴起的大趋势，亚太地区不可能置身其外，必然会深深卷入其中，如何趋利避害对该地区是个重大挑战。当今世界大约有8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普遍营养不良，其中亚太地区就占了2/3，达到5.25亿人。亚太地区又是世界食品贸易的净进口地区，粮食需求量十分巨大。目前亚太地区人口数为33亿人，预计到2020年可以达到44亿，比目前增加1/3，充足的食品供应对于亚太地区是十分重要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该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好处，将极大地改变本地区食物供需形势，增加本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

其实，亚太地区对生物技术并不陌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绿色革命”就是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典范。正是依靠以先进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和化肥、现代灌溉技术的引入为特征的绿色革命，亚太地区极大地改善了本地区的食物供应，解决了大批人口的吃饭问题，基本避免了历史上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大饥荒威胁，极大地增进了该地区人民的福利。亚太地区耕地面积只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31%，农业人口却占世界农业人口总数的73%，人均耕地仅为0.28公顷，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人均1.4公顷以上，亚太地区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5。过去30年里，依靠绿色革命，亚太地区成功地养活了本地区占世界总人口56%的人口，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以1988—1998年为例，10年间

亚太地区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2.1%，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仅0.8%；亚太地区肉类总产量年均增长6.2%，而世界其他地区为4.2%；亚太地区水产品总产量年均增长11%，也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粮食单产现在已经达到3.8吨/公顷，而世界其他地区只有2.8吨/公顷。在亚太地区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绿色革命功不可没。

然而，绿色革命也存在一些不足。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造成环境污染，土地肥力下降，甚至出现土壤板结等问题，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绿色革命期间研究开发的作物品种经过长期使用，开始出现种子退化现象，病虫害增多，抗自然灾害能力减退。另外，绿色革命对灌溉条件的要求十分严格，而亚太地区属于季风气候，降雨的季节分布十分不均匀，大约70%的耕地需要依靠天然降雨才能得到灌溉，不具备现代排灌条件。加上化肥、良种需要一定数量的成本投入，以致那些土地得不到良好灌溉的农民很少能够享受绿色革命的好处。这些农民只好继续以传统农业技术和耕作方式为主，向自然界要效益，引起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据估计，亚太地区的森林以每天5000公顷左右的速度被毁坏。曾经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绿色革命是否加剧亚太地区农村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生物技术恰恰可以弥补绿色革命的缺憾。它提供了新的先进适用技术，人们利用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能够开发出具备更加适合人们需要的生物特性的农产品品种。农作物可以因此在增加单产的同时，增加抗旱、耐碱、抗病虫害的能力，增加农作物营养，改变农作物品种结构。一些原本具备高营养，但是产量偏低或不易培育的农作物品种现在经过改良可以大规模生产了，同时也可以在农产品中加入一些人们所需要的养分或特性，如在大米中增加维生素A。动物产品经过应用生物技术，品质能够得到改良，产量也会有大的增加。一些原本不具备饲养价值的动物经过改良也可以大规模饲养了。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增进亚太地区农民的健康，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生物技术开发对科研能力和资金投入要求很高，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发展层次高低不同，差异较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发达国家之列，在生物技术开发应用上有一定优势，可以与欧美国家开展竞争。中国、印度、韩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农业规模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科技实力，可以动员一定的人力物力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它们也一向较重视农业科研开发，所以对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兴起带来的挑战尚能加以应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抓住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带来的机遇。而那些比较小的国

家或地区要么经济落后，不具备必要的农业科研开发实力，要么本身农业规模小，从事生物技术开发在经济上不合理，因此，自主开发的能力基本不存在。

由于资金规模和风险的特性，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毋庸讳言，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跨国大企业，由发达国家掌握，并且因为有专利保护，一般生产者很难得到。这种技术垄断可能造成一系列后果。由于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从私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技术成果具备相当大的市场应用前景时，才值得研究开发。亚太地区各国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以及生物特性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各国间和各国内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农业技术的地区特性很强，跨国公司一般不愿意专门针对技术市场规模相对小的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所以，亚太地区许多国内自主开发能力低的地区的农民，可能得不到适用的生物技术。而亚太地区农民传统上使用的种子资源和生物品种特性，却很有可能被跨国公司白白拿走。亚太地区生产的大宗农产品在市场上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很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市场受到发达国家质优价廉农产品的巨大冲击，因此容易导致没有掌握先进生物技术的农民丧失市场机会，作为消费者得到的福利增进不足以弥补作为生产者遭受的福利损失。

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对亚太地区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的适用生物技术开发应用负有特殊的责任。国际上18所农业科研机构，如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设在墨西哥的国际小麦和玉米育种科研中心等，现在每年科研经费预算达3.4亿美元。冷战结束后，这些农业科研机构一度因为跨国公司的农业科研活动发达而对自身定位产生迷惑。以我个人的看法，它们可以将科研重点放在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研究开发先进适用的生物技术上，帮助这些国家农业应付全球化和生物技术带来的挑战，抓住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机遇。国际农业科研机构也需要帮助亚太地区落后国家培训专业技术人员，负责消化吸收国外现成生物技术，使之适合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也可以直接提供技术、资金和人员支持，帮助它们改良现有农产品品种。

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这样有实力的国家，应该加强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比较规范的专利保护制度，否则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是不愿意合作的。专利保护制度虽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的成本支出，但是却十分有助于它们获得先进技术，而且，专利制度有利于鼓励发展中国家本国科技人员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利于国

外先进技术的本地化。两相权衡，实行专利保护制度比不实行专利保护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

除了技术的供给外，要使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分享生物技术进步的好处，还要有其他条件。农民要采用生物技术，需要支付现金购买良种、改进配套设施，所以农村地区应该有比较方便的融资条件。另外，应该有能力调整就业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以便帮助那些因为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而失去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农民顺利转向非农产业或从事更有利可图的农业活动。如果缺少这些条件，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就不一定真正能够增进全体农民的福利了。

结　　语

总之，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亚太地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能够成功利用生物技术提供的机会，亚太地区不但可以巩固绿色革命的成果，克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可以顺利应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国内外市场上与进口农产品展开有力竞争。如果在生物技术应用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则亚太地区的农业就会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进而威胁广大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需要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政府、民间和国际农业科研机构作出共同努力，以趋利避害。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年第78期（总第210期），后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1)

联合国科技发展委员会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名为《知识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技术》的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科院也向中央递交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报告，知识经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正当其时。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知识创新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反映。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它以知识的不断创新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为基础，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国家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高等教育必须有所改革。以下就此提出四点建议：

1．普及信息技术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信息产业的兴起，信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信息的技术进步，标志信息技术进步的是计算机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知识经济对现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必须熟知芯片、光盘、计算机和各种应用软件。在发达国家，计算机各种新功能的普及从高校开始，学校计算机、信息设施和教学十分先进，学生在课堂内外有充分的机会使用这些设施，有些高校要求学生每人都有一台手提式计算机。相比之下，我国高校计算机、信息设施及教学相对落后，高校毕业生的计算机和信息知识尚难满足知识经济的要求。虽然限于财力，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为此投入巨资，但是仍然应该努力改善高校计算机、信息设施，加强此方面的教学，学校设施应尽可能向所有学生开放，增加学生课堂内外使用计算机和信息设施的机会，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培养合格的人才。

2．改善学科设置

从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创新呈现加速趋势，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普及应用，时间越来越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随之加速，而且，这种调整并不是事先能够准确预料到的。因此高校学生需要掌握学习新技术和转换职业的基本技能，而不是某一具体职业技能，大学所学不应仅限于毕业后即用的知识，而更应强调以后如何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我国高校的学科设置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专业设置太细使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与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学生毕业后经常要面对技术和行业调整的要求不相适应。国外大学十分强调基础教育，本科一、二年级以学基础课为主，一般不分专业，三年级以后再分专业。我国大学应将基础教育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学生不能只学本专业知识，应重点掌握学习新知识的本领。专业设置不可过细，本科

招生应以学院为单位，入校学习二年基础课程再分科系、专业。

3．加强科教结合

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是知识的生产。在国外，高校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最主要基地。我国科研现在分为科学院系统和高校两大块。高校目前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高校的科研往往与最前沿有一段距离，学生所学一般也不是最前沿的东西。科学院系统处于国内科研最前沿，但科学院不以培养学生为重点，由于缺少学生，也就缺乏可以将其科研成果带入社会的载体，科研新成果难以推广应用。最近，国家大力推动的高校间的横向联合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的，但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还应有纵向的联合，即科研向重点大学转移，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使我国高校像国外大学那样处于知识创新的最前沿。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应积极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使他们一开始就熟悉和参与最前沿知识生产的科研活动。

4．培养、引进人才

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最终是由人来完成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此，必须下大力气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留住国内优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知识创新上的作用。我国高校人才问题十分严重，普遍存在国内培养的优秀人才留不住，留学海外的优秀人才不愿回国的窘境，科研、教学力量薄弱，科研水平与世界前沿差距很大。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提供的科研条件与国外差距太大，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科研条件，所提供的生活条件也与国内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有相当的差距。真正优秀的人才可选择的机会很多，自然愿意回到或留在国内高校工作的人少，回来或留下来也不见得就能安心工作。要解决此问题，必须改善优秀人才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虽然国家还很穷，但是仍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如果不能在所有高校做到吸引、留住所有人才，教育部和若干重点大学应筹集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吸引海外各学科顶尖人才回国，留住国内优秀人才，改善他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在国内形成若干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知识创新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的投入就是对知识生产的投入，也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投入。国外高校有三个资金来源，即政府支持、学费收入和社会捐赠，名校更靠捐赠。我国高校也已建立起这三个资金来源，但社会捐赠做得很不够，可挖掘的潜力很大。中国历来有社会捐款办学的传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捐款能力也会不断增强。但现在我国在动员社会捐赠方面存在不利因素，国外向教育和科研捐款是免税的，我国则必须从税后利润中开支。这种税制安排需要改变，实行国际通行的免交所得税的制度，这样才能有利于动员社会对教育和科研的捐款。

(1)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8月14日。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与我国的产业发展 (1)

国内、国外最近兴起了一股讨论知识经济的热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于1996年推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书，接着联合国科技发展委员会于今年年初出版了《知识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技术》的专著，其他许多OECD国家也在最近一两年陆续出版书籍、文章，讨论知识、信息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则在去年年末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报告，国内报纸和杂志上的讨论更是连篇累牍。这股热潮实际上是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知识创新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反映。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提出知识经济概念的背景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发达国家的经济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计算机、电子和航空等高新技术产业是发达国家所有产业中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快的部门。在知识经济的提法流行之前，发达国家就有信息革命一说，各国就极为重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着手建立全国性电子通讯网络，其他发达国家纷纷仿效。可以说，知识经济的提法是信息革命的继续，反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知识、信息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提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尚低的发展中国家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机会和挑战何在？

现在，报刊上的不少讨论，一提到知识经济，似乎就意味着我国应该在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领域迎头赶上，认为经济的发展可以具有跳跃性，原有的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发展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切入点，积累资金、技术，逐渐改变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然后再逐步将产业结构升级到资金、技术比较密集产业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

上述观点传播甚广，原因还在于东亚最近发生的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是整个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经济，当时美国的经济已呈盛极而衰之势。到了90年代，美国由于发展了计算机、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而信息、高科技产业比较落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于1997年开始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一下子后退了十几、二十年，接着连东亚地区经济最

发达的日本也不能幸免于难。由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强烈反差，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看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韩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低级，高新技术产业不发达。由此进一步推断传统的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过时，我国应该跳越过从资源禀赋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否则，我国将丧失知识经济时代初露端倪所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是，这种论点貌似有理，实则不然，而且十分有害。

事实上，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是一个国家取得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的最佳途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按照它们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造成的。日本和东南亚的问题根源于其金融体制不健全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其原因不在于信息和高科技产业不发达，也不在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否。而韩国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正是自70年代以来韩国热衷于发展汽车、重工、重化等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高度密集的计算机芯片产业的结果。但是，相对于欧美、日本等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而言，韩国资金的成本较高，因此，在韩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成本高、不具有竞争力，靠市场力量发展不起来，韩国政府就以政策扶持大企业集团来发展这些产业。然而，即使在政府的扶持下，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大企业集团只能靠负债来经营，内债不够用，就举外债，开始时，外债少、债信高，但越借越多，最后导致了债务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潮和经济危机。与韩国相反，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在汽车产业上以生产零部件、在计算机产业上以组装、在规模上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远不及韩国的大企业集团，但因这些产业较好地利用了台湾地区经济现阶段的比较优势，产品有竞争力，获利能力高，自我积累能力强，产业发展不依赖外债，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害最浅。两者经验的比较，应可说明，抵御金融风险的最好办法还在于发挥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

当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会给我国产业的发展带来不少新的机会和挑战。首先，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劳动相对比较密集的传统产业，必须不断吸收、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改造，以降低其成本，提高其竞争力，任何新的、能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的技术都应该积极采用，否则，在面对国际竞争时，我国从资源禀赋上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也会被其他具有类似资源禀赋国家的产业所淘汰。

其次，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是信息产业的兴起，信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信息技术进步，标志信息技术进步的是计算机的不断发展。信息产业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硬件和软件。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另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如英特尔为开发新一代的计算机芯片，每年投入研究、开发的资金为我国全国开发研究总投入的5倍，而每一条新产品的生产线的投资都在数十亿美元之巨。每条生产线一般只能用一两年即被另一代新产品的生产线所淘汰。以我国目前物质资本的禀赋来说，这些产品的开发、研究、生产并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万不可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发展。还有一部分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组装、计算机键盘、显示器、外壳，甚至许多较初级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则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些产品的生产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应积极开发的新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给我国的另外一个重要机会是软件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一个特点是软件的开发和生产可以独立于硬件的开发和生产。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主要依靠的是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独立，在这方面我国大有可为，但其基本道理依然是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发挥。物质资本的积累在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将其缩小的。但是，人力资本的差距则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如果接受了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一样良好的教育，其人力资本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基本没有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差距。这是为什么微软在印度设立庞大的软件开发中心，而一些小国如智利在软件的开发生产上能有相当竞争力的原因。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那么，我们就可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在尖端的软件产品开发、生产方面，特别是在市场前景广阔的中文软件产品开发和生产方面，赢得一定的优势。

从实践看，我国目前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类型和上述论断是一致的。联想集团和方正集团是我国信息产业中两家最成功的典型代表。联想主要从国外进口资本密集型的芯片和关键元器件，利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技术人员来开发设计新机型，然后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在国内从事劳动密集部分的计算机组装、经销业务。北大方正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优势，从事中文软件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活动，其

激光照排技术已占领了全世界80%以上的中文报业市场。

在传统产业和信息技术的硬件产业上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会不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导致我国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进而导致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和遭发达国家的盘剥？其实答案正好相反。

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结构。当资本相对稀缺时，这个国家最有优势的产业是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反之，当资本相对丰富时，这个国家最有优势的产业就变成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因此，要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关键在于提高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的结构水平，也就是，提高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一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时，其产业的竞争力较不按比较优势来发展时高，经济剩余较多，资本积累的速度会较快，而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劳动力的增长则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比较缓慢，因而一个国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时，其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会较不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时快，资本会较快地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比较优势发生变动，产业结构自然要升级，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技术含量相应提高，到那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不仅和自己相比，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较快地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也能较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差距。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处于技术的最高水平，技术要再进步，只能靠自己的研究发明，而研究发明的投入大、成功率低，所以，总体的技术进步率不高，在此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低，资本的积累率也就不高。而发展中国家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时，可以以比自己发明低得多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可以快得多，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也会相对高，资本积累的速度相对快，和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结构，进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差距也就会较快地缩小。日本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比较好地利用了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结果。日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重点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了资金，提升了资源禀赋结构，60年代时才将产业发展方向伸向资本较密集的产业；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也不是一步到位，一下子就去发展资本最密集的产业，而是先发展资本密集产业中劳动较密集的造船、钢铁等产业，等这些产业站住了脚，创造了利润，积累了资金，资源禀赋结构进一步提升时，再去发展资本更密集的汽车、电子等产业。日本以此方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在80年代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

总之，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重要特点是技术变迁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快。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企业提供了用信息技术渗透、改造传统产业，降低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的机会。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一个国家应该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向知识、信息和高科技产业，是因为这些产业较传统的重工业更为资本密集，符合其资本更为丰富的新的禀赋结构。就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来说，固然由于软件业的兴起，使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取得超过发达国家的成就，但是在硬件的生产上，我国仍应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从劳动密集的生产做起，逐步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再往资本较密集的产品发展。只有这样，我国才能较快地改变资源禀赋的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舍比较优势战略别无捷径。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8年第36期（总第057期），发表于《国有资产研究》1998年第6期。

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 (1)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论述的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是“劳动分工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分工的程度和市场的规模成正比”。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促进了分工的细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顺应这种要求，产业革命以来，信息记录、传播与处理一直是技术革命的重要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并因此逐渐形成方兴未艾的IT产业。1971年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上市服务的美国NASDAQ证券交易系统建立，吸引了一大批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从1992年开始，NASDAQ迅速扩容，股价连年翻番，1998年底综合指数已经达到2166点的历史新高，1999年第一季度成交量已经超过了老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2000年3月综合指数更越过了5000点。在这段股市空前繁荣时期，涌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IT企业。戴尔计算机公司的股价从1991年的1.5美元升到73美元，英特尔公司的股价由1991年底的5美元升到119美元，微软公司的股价则从不到6美元上升为139美元，等等。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风险投资业在美国兴起，极大地支持了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IT产业的崛起与风险投资业和NASDAQ系统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孕育了一个个近似神话的投资故事。东亚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美国IT产业的成功中受到启发，近一两年也纷纷设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以发展IT产业，并和美国一样，带来了股票市场的空前繁荣。香港的恒生指数在沉迷了近两年后，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在2000年初冲上了17000点，连连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点；韩国的KOSDAQ在1999年上升241％，远高于美国NASDAQ的86％的升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IT产业也出现了迅猛发展之势，许多人对IT产业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将其作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龙头和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认为IT产业在发达国家还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现在加入竞争，差距未远，应该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寄望能够在尖端的IT产业发展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并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

赶超发达国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几代人的共同愿望，如果发展尖端的IT技术真能实现我民族百余年来的愿望，当然求之不得。的确，我国是个大国，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IT技术在我国可以运用的范围很广，对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事关重大。但是，IT产业涉及面很广，我们是否应该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在IT产业的所有领域都与发达国家一较短长？我们是否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换句话说，发展IT产业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否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按比较优势的原则，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产业入手，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再来进行产品、技术、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策略已经过时？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它所提供的信息处理、信息交换、信息储存服务能够使一个企业的内部管理、生产组织、库存、销售安排等更为经济、合理，大大降低营运成本。我国现有的产

业，包括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也应该积极运用这种新的信息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利润率。比如传统的纺织业在经营管理中也可以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加强存货、信息处理、广告等的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知识经济时代并不改变成本和效益的基本经济学原则，一种新的技术在现有产业中的使用只要带来的效益大于采用这种新技术的成本，包括购买、学习这种新技术的支出和放弃、拆除旧技术的费用，我们就应在现有的产业中积极采用这种新技术。所以在运用IT技术于原有的产业的问题上，我们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新技术并无不同。而且，在IT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非IT的传统产业如食品、服装、汽车等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并未萎缩，我们仍然应该按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有关的产业，紧紧地依靠我们的比较优势占领这些产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在出现IT技术以后的新经济时代，我国是否应该发展IT产业，如果要发展，侧重点应该放在那里，是个较有争论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推广运用IT技术的新产业，二是IT技术本身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产业。

如前所述，一种新的技术可以运用于已有的产业中，以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率，此外，有时也会围绕着这种新技术的运用而出现新的产业。如因蒸汽火车的发明而出现了铁路运输业，因飞机的发明而产生了航空运输业，因电报、电话的发明而出现了电信业。同样的道理，由于IT技术，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IT技术的运用而出现了门户网站和“B to B”以及“B to C”的电子商务的新商业形态，对广告、销售、信息传播产生了近乎革命的影响。就像火车和传统的驿马车的比较一样，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和旧的商业形态在功能上相同，但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给消费者更快、更好、更多选择的服务。这种新商业形态是新出现的，这几年在欧美发展得热火朝天，我国应该如何对待？

电子商务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在未达到规模之前只有投入而难有产出，而市场厮杀的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只有一两家生存下来，成为大小通吃的大赢家，因此，在电子商务的发展上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且要面对很大的风险。就像100年前还在使用马车和轿子的时候，面对火车这种新技术，虽然修建铁路需要的资金比购买马车、轿子，修建传统的道路巨大的多，但只要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量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达到一定的规模，修建跨省跨州的铁路不仅是经济合理的，而且可以推动两地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要把全国发展成统一的大市场，特别需要低成本的信息和商业交易手段，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可以大大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发展，我国应该创造条件，引进

风险投资，积极发展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新产业。

IT技术的生产本身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又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方面又可进一步细化为研究开发（R&D）、核心芯片和主要元件的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

IT技术的研究开发目前主要集中在美、欧、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主要元件像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的生产，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占有相当的份额；至于发展中国家，在IT技术的生产上一般只是从事最终产品如计算机、键盘、显示器的组装，和外壳或一些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和决策界争议最多的是我们是否也应该在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上和发达国家一争长短。

IT尖端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以1998年为例，几家IT产业大公司的研究发展费用大致如下：惠普公司耗资23.7亿美元，英特尔公司耗资26.7亿美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耗资56亿美元，康柏电脑耗资45.49亿美元，日立公司耗资45.29亿美元，北方电讯耗资42.09亿美元，爱立信耗资34.58亿美元，NEG耗资33.80亿美元，摩托罗拉耗资30.60亿美元。当核心技术开发出来后，大规模生产所需的资本投入仍然很大，但和研究开发相比就小得多了，以计算机的芯片为例，每条生产线的投资大约要10多亿美元。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则相对来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

IT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分布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个经济在决定IT硬体产业的发展上，比较优势仍然是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大致相同，比较韩国IT产业最著名的三星电子和我国台湾地区IT产业最著名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的表现很能说明这点。韩国的资金密集优势不如美、欧发达国家，三星电子以开发技术等级比发达国家开发的计算机的中央处理芯片低一档的记忆芯片为主，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台积电在初创时则在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不作研究开发，主要依靠引进技术，然后根据用户需要加以改造，从事硅片、芯片等产品的生产加工及服务业务，只有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研发一些技术等级较简单的芯片。从产业的等级上看，台积电不如韩国的三星电子。然而，1997年台积电的营业额达新台币439亿元（约14.6亿美元），毛利达新台币211 亿元（约7亿美元），净收入179亿元新台币（约6亿美元），台积电的总资产为1085亿元新台币（约36亿美元），资金利润率（净收益/总资产）达16.5%；而三星电子在1997年的营业额为153亿美元，毛利润为48亿美元，但因每年要投入10多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和高

额的管理、销售支出，其净收益仅为1.02亿美元，三星电子的投资规模非常大，在1997年时固定资产净值为50.6亿美元，加上其他资产，资产总值达161亿美元，资金利润率仅为0.6%。由于台积电的资金利润率高，投资主要靠自己的资金积累，而三星电子的资金利润率低，自我积累资金的能力低，投资主要靠借债，1997年的资产负债率达223%。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禀赋的技术和产品，必须依靠外债来补充其国内资金之不足，结果是利润率较低。在1997年时，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当国外的金融风波一起，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时，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韩国经济也立即应声而倒，出现危机。台积电走的是标准的台湾企业发展模式，根据台湾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和技术，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升级来决定技术、产品的升级。台湾地区企业选择的技术等级虽然较韩国企业选择的低，台湾地区的最大企业的规模仅为韩国最大企业的1/16，但台湾企业通常利润率较高，几乎不用外债，因此，较不易受金融波动的影响。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风暴中，台湾经济是亚洲四小龙中惟一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而且还保持6%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的一个，其道理即在此。在IT产业上，台湾地区虽然没有大的名牌产品，但发展非常神速，在2000年初已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55%。

我国还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为478.7亿元人民币，高等院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为54.45亿元人民币，英特尔和IBM两家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的总和已经超过我国全部科研经费；1998年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为3126亿元人民币，大约只和IT产业10多家最大公司的研究发展的支出相当。固然我国的科研人员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工资低，在费用上能有些节省，但发达国家的研究积累比我国多，同样的研究，他们成功的概率比我们高，因此，要取得和他们同样水平的技术突破，我国可能省不了多少经费。IT产业的新产品价格的变化出现每18个月就减价一半的摩尔定律，开发的速度稍慢一点，原来的投资很可能就完全付之东流。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和IT产业的几家大公司竞争，研究开发他们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产品。

金融资本的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金

融资本的积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缩小的。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现阶段在IT的硬体产业中的定位应该是大力开发以组装为主的产品，以此积累资金和技术，然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寻找新的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产品，以逐渐实现产品和技术的升级。

IT产业在软件的开发和生产上的特性和硬件有所不同，软件的研究开发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设备非常简单。只要接受了和计算机程式设计有关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程式设计师的人力资本差距不大。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IT产业软件发展上的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印度、以色列、爱尔兰、智利等国在国际软件市场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依赖的就是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在软件开发尤其是中文软件开发上将大有可为。目前我国在以英文为主的国际计算机软件市场上的竞争劣势是对市场的需求变动趋势的了解不够、不及时，难于自主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要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我们可以和上述印度、以色列、爱尔兰和智利一样，加强与微软等发达国家的软件企业的合作。1998年印度30亿美元的软件业出口中，50%是由国外的软件公司提出产品的设计、规格，然后由印度的程式设计师编程的劳务输出，30%是依照合同开发新产品并出口开发成果，在这30亿美元的出口中几乎没有带印度自己公司品牌的产品。

IT技术的升级非常快，在传统产业上有很大的运用空间，而且，又出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新行业，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势头。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IT产业是不是会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导致中国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悲剧？

上述忧虑看似有理，然而违背一国的比较优势去进行产业和技术上的赶超，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一国最有竞争力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结构，必须先在要素禀赋结构上赶上发达国家。我国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竞争不过发达国家，但在劳动密集的产业占有很大的优势，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几乎已垄断了美、欧的市场即是证明。根据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产业，将使该国的产品的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能占领国内、国外最大的市场份额，取得最大的利润，创造最多的经济剩

余，使该国的资本积累最快，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快，从而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以最快、最可持续。

如果违背一国的资源禀赋条件，硬性去发展一些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为了保证生产这些技术、产品的企业的生存，政府就必须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和其他要素的价格，使这些企业能获得廉价的投入品，并让这些企业拥有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或使用高关税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和这些企业竞争。受到保护的企业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创新动力低，效率低，利润水平低，剩余少，无法担负起增加积累、提高整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责任。而且，把经济中有限的资金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必然挤压了可以用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减少了市场份额、利润和剩余的总额，降低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能作的贡献。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必然是减缓了整个经济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升级缓慢，经济的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从各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实行了资金密集程度背离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弦更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惟一的例外，它们在二战后都先发展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纺织、轻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积累资金，然后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再逐渐发展资金、技术较为密集的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结果到了80年代成为惟一真正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97年开始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经济，其原因是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于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果，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导致高额负债，当国内资金不足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在其他国家发生金融风潮时，也就难逃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

在做人方面，我一向主张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勇气，但是在关系国家命运的经济发展方面，就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为。我国发展层次还很低，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拔苗助长是要不得的。绝对不能一时头脑发热而不顾经济全局，孤注一掷地举全国之力于少数几个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够多的了。我们的当

务之急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我国的产业，以提高竞争力，增多利润、剩余和积累，加速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同时加快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我们在IT产业的发展上，也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重点发展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软件和部分硬件，努力消化吸收国外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造，使之为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让信息技术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提高我国各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效率和竞争能力，而不是热衷于开发少数十分尖端、资本投入十分密集的技术和产品。

---

(1) 本文原为我在参加2000年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期间，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趋势”论坛上所作的报告，后整理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年第19期（总第151期），并发表于《中国投资》2000年第6期。

新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发展 (1)

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距甚远，那时几乎无人能够预见日本经济可在不长的未来赶上美国。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维持了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在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业的竞争中，美国反而处于劣势。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上中经数据栏目所整理的世界银行的资料，仅用20年的时间，日本的人均GNP到1970年时已经与美国持平，其后日本的人均GNP一路领先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时，许多专家、学者看好日本经济，认为美国已经像英国一样从巅峰走向衰败，美国的经济地位将会被日本取代。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经济突然发生了一个大逆转。日本从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一直未能摆脱萧条的困境，美国则出现了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涌现出一批信息产业巨头公司，如IBM、英特尔、微软、席斯科、朗讯、亚马逊、雅虎，带动了美国经济连续10年的蓬勃增长。

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似乎也是一副良方。1997年

东亚爆发金融危机，股市暴跌，一般人预计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可能要用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是不到两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就普遍开始复苏，到1999年，股票指数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这次股市复苏与该地区投资者对新经济的信心和憧憬有很大关系。例如韩国，成立了一个类似美国纳斯达克（NASDAQ）的高斯达克（KOSDAQ）交易系统，1999年指数上涨了241个百分点，远高于纳斯达克当年上涨的86个百分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股市也依靠信息、科技板块很快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国的经济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自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放弃了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很大的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家电等轻工产品，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美国市场。现在到美国访问，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带回国内做礼物，总要很小心的挑选才能避免买回在国内生产的产品。但是，面对信息产业所带来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势头，以及代表传统经济的日本和代表新经济的美国在90年代经济表现的强烈反差，很容易让人对我国传统产业的前途感到忧虑，到底传统产业是否还有前途？我国是否还可以依靠传统产业的发展来维持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人都不能不深思的问题。

其实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对大多数传统产业不仅不是坏事，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美国以传统产业为主的道—琼斯股票指数在1987年10月出现黑色星期五以后到90年代初，一直在2000多点到3000点左右徘徊。以中小型高科技产业的融资为服务对象的纳斯达克建立于1971年，1992以后随着信息、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快速扩容和上升，在这段时间，传统产业的股票价格也跟着一路攀升，到1997年出现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道一琼斯股票指数已达到7000多点，随后一路狂飙，指数最高达到11000多点。而且，当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的5000多点跌回到现在的2600点上下时，道一琼斯指数仍然维持在10500点左右。正是由于传统产业的强韧，才使美国经济没有因为新经济泡沫的破灭而马上出现硬着陆的可怕恶果。

为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对美国的传统产业不仅没有造成威胁，反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传统产业的发展？其道理有三：

1．信息产业提供的是信息服务，而人们消费的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如住房、服装、食品、旅游等。信息产业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的产品并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且，在新经济的热潮中涌

现了许多高科技新贵，带动起一股高消费热潮。美国市场很大，美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高，但其实美国经济还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经济，因为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只占其GDP的15%左右，其中出口大约占7%，进口大约占8%，每年都有贸易逆差。也就是说，美国国内生产的93%是用来满足国内需求的，高科技新贵的高消费也主要靠国内的生产来满足，他们消费的既然绝大多数是传统产业的产品，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就必然从需求方面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2．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即提供信息收集、储存与处理的服务。任何产业，包括那些传统的产业，不管是飞机制造、机械加工，还是旅游业、银行业，都需要这种服务。靠人工来处理这些信息不仅费时、费事，而且容易出错。比如企业的存货管理，如果运用计算机就比用传统的人工方便快速，而且通过计算机管理，还可以提出预警，即当一种物品存货下降到一定数值时就提醒经理人员马上去订货，当一种物品用量突然增加时，也可以提醒经理人员查看是否在生产环节中出了问题。所以，通过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化管理可以做到所谓的“just in time”，大量节约管理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

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的第一个经济发展原则是：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信息技术的运用除了可以降低一个传统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本之外，还可以降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靠电子网络，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以极低的信息成本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进行“B to B”或“B to C”的交易。所以，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将使传统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经济效率提高，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其实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勃勃生机和日本经济在同一时期的重重困难，原因也不在于美国从传统经济成功转型到新经济，而日本未能及时完成这个转变。日本在信息产业也有不少世界领先的著名公司，如生产计算机记忆芯片的日本电气公司，生产手提计算机的东芝，经营互联网的软库等。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起源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随之而来的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

对任何经济来说，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供给弹性小的要素和商品的价格会比供给弹性大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上涨快，房地产和股票在短时间内属于供给弹性最小的要素和商品。当人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预期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将会快速增长时，就会对其投机而促使其价格更为快速上涨而形成泡沫。但当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时，供给弹性小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降的速度也会比其他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快，

进行投机的人为了避免损失，就会抛售手中所拥有的房地产和股票而使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灭。

如前所述，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靠利用和国外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和股市价格也节节上涨，到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相当严重。单在1985—1989年间，日本股票价格就上涨了两倍，年均上涨31.3%，地价年均上涨约15%，而同期GNP年均仅增长5.7%，按1988年地价计算，国土面积仅为美国1/25的日本，国土价值却是美国的4倍多。股价、地价的狂飙，使日本国民的总资产中股票和地产比重大幅上升。但日本经济在80年代末已成为世界技术最前沿的国家之一，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因而放缓，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随之在1990—1992年破灭，股价和房地产价格暴跌使国民的总资产大幅缩水。

在日本的总需求中，个人消费约占55%，固定资本投资约占30%，两者合计超过总需求的85%，总出口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净出口不到2%。日本和美国同为世界贸易大国，但也和美国一样，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在股票和地产泡沫高涨时，由于财富效应，消费旺盛，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国内投资不断增加以提高生产能力满足消费需要。当泡沫经济破灭，金融机构所拥有的房地产和股票抵押的价值大幅缩水，必然降低其资信，引发金融危机，使企业融资不易，投资需求下降。同时，泡沫经济的破灭也使居民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消费需求因而减少。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在泡沫高涨时投资形成的不少生产能力就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职工将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导致职工的永久性收入预期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也跟着下降。当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双下降，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更加不振，通货紧缩的情势更为严峻，从而使整个经济出现恶性循环。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至今的10年，经济一直欲振乏力，国民经济的增长每况愈下，其道理就在于此。

从上述分析可知，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出现，不仅没有使传统产业的产品变得过时，或是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只要传统产业能够利用新经济所提供的先进信息技术来加强内部管理，减低外部交易成本，新经济还为传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资金稀缺、劳动力相对密集，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衣、食、住、行的传统产品，人总是要吃饭睡觉，这方面产品的市场需求过去很大，未来还是很大。在出现新经济的时代，我国仍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样我国的产品才会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最大竞争力，赚取最大利润，创造最大的经济剩余。而且，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不仅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同时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缩小城乡差距，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样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快速、稳定、健康的。

在新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加快发展我国落后的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只有教育事业发展了，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广泛普及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我国传统产业，提高其竞争力，使传统产业能够借新经济之力获取更大的生命力。

---

(1) 本文为2000年9月23日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后整理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3期。

遵循比较优势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1)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三省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发展步伐相对落后于其他沿海省市。1978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均GDP仅次于三大直辖市，但是到2001年，三省在全国排位分别下降到第8、第10和第14位。尽管如此，东北三省在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以工业为例，2001年东北三省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15924亿元，占全国的11.76%，其中固定资产净值7318亿元，占全国的13.2%；创造的工业增加值3052亿元，占全国的10.78%；实现的利润总额723亿元，占全国的15.29%。

为加快东北乃至全国的发展，中央作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并将之和西部开发并列为现代化建设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思路、措施和战略振兴东北，目前的认识可以说还不统一。根据媒体报道，不少人士认为应该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项目和资金支持，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我们认为，中央的决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本而言，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原则来确立今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首先要彻底解决大量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其次，一定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而必须把东北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东北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上，这样东北的经济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下面首先介绍东北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步伐滞后的原因。

一、赶超战略对改革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不利影响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以来的发展，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行政计划动员的力量，举全国之力，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北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之一，特别是重型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兵器工业、化工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等资本密集的企业，主要建立在东北三省。这些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北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

自生能力，是指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没有任何外来扶持的条件下，获得市场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能力。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当中，只有具备这样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经营。一个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必要条件是企业所进入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与其所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吻合。如果不符合，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国内或国外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会缺乏竞争力，而不可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会有人投资设立，并被继续经营下去，而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设立和继续经营就只能靠外力支持，主要是政府给予的政策性补贴和保护。我国东北三省大量的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结构，都是资本密集，甚至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些企业是在建国初期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意图，靠政府以行政的力量压低利率、汇率以及各种投入品的价格，并以计划动员和配置的方式，集中方方面面的资源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系列扶持和保护措施之下，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较国内其他地区快速。

然而，赶超战略尽管使我国在极低的发展水平上拥有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在政府的价格扭曲和计划干预之下，整个经济的效率低下，资本积累的速度缓慢，后继投资乏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处于停顿状况。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后，我国政府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2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为同期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立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不需还本付息的财政拨款改为需要还本付息的银行贷款。随着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放开，以及产品价格随着市场开放和竞争的增加而下降，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由隐性变为显性。

除了自生能力的问题之外，改革前我国推行的是低工资制度，职工退休以后的养老，由国家以财政拨款的方式通过企业来承担，改革以后，这部分负担转移到企业来；另外，改革以前的投资主要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投入很大但是创造的就业很少，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经常一个工作岗位安排好几个职工，出现了许多冗员，改革以后，也增加了企业的工资负担。

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是由国家的发展战略导致的，可以称为战略性负担；由养老、冗员等问题所导致的企业负担可以称为社会性负担。两者都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因此，合称为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必然导致政策性亏损，政策性亏损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就必须给予有政策性负担的企业以政策性优惠和补贴。可是，在不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状况之下，政府难以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企业就有可能把任何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亏损。当政府无法区别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时，就只好把所有亏损的责任都背负起来，从而形成了经济学家所形容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可以

不断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来弥补其亏损，维持其生存发展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当、效率低下、发展缓慢也就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后，东北三省负担沉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振兴老工业基地必须消除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拨改贷”的原因，但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当国家不再以财政拨款而以银行贷款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时，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自然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归还银行的贷款而形成呆坏账；同时，当国家以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和养老负担时，呆坏账的形成必然更为增加。如果政策性负担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将国有企业现在的债务豁免，或是推行“债转股”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欠账转变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虽然能够让国有企业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仍在，亏损和呆坏账的积累将不可避免地又迅速增加，隔不了多久就会又要国家给予解困疏难。所以，振兴东北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并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靠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可以预期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率。只有这样，预算软约束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关于剥离养老、冗员等社会性负担的问题，社会各界已经有了共识，我国政府也正在通过建立统账结合的社保体系和实施冗员下岗再就业等措施来解决。但是，由于对于资金密集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问题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社会性负担剥离了，在开放、竞争性的市场中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仍然需要国家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那么，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就不可能根除，公司治理、产权明晰等改革措施也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振兴东北三省和其他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点还在于解决存在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

根据国有企业产品的特性和国内市场的大小，可以以下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

第一，生产国防安全必需产品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任何国家都只能由国防预算直接拨款来维持其经营和发展，由国家直接给予必要的监管。我国自然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第二，生产有很大国内民用市场的产品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则可

以用草船借箭的方式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方式获取国外资金，克服国内资金相对稀缺的比较劣势。发达国家的资金相对丰富，资金的成本较低，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合资或是直接到国外上市，都可以克服我国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劣势，而使国有企业变得有自生能力。对国外资本来说，如果该国有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那么和这个国有企业合资或是购买这个国有企业的股票，是进入我国市场的一个捷径。因此，这是一个双赢的措施。东北的汽车制造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已有的转轨经验也表明，引进发达国家战略投资者的资本，是大中型企业转轨的最有效途径。

第三，生产国内民用市场很小的产品的企业。有一些老军工、重工企业，产品老旧且市场容量小，但拥有相当好的工程设计力量。对这一类型企业，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转产劳动力较密集、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办法。四川的长虹、重庆嘉陵等老军工企业即是这类例子。

最后，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其产品已无国内市场，而又无工程设计、管理力量上的优势，缺乏转产的可能，则只好让其破产。

三、转变政府职能，顺应比较优势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在解决好历史遗留的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剥离企业的社会性负担的基础上，东北老工业基地就可以轻装上阵了。但是，东北三省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抛弃赶超的传统观念，顺应比较优势，才能使东北的经济取得稳定、持续、快速的发展。对此，中央政府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向。温家宝总理在长春市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时，明确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五方面指导思想和六项主要任务，明确指出：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企业重组，都应主要依靠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划和政策，营造投资、创业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东北三省具有非常好的生产要素条件：大量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大量的熟练劳动力，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比较雄厚的机械、装备制造能力，稠密的高等级的交通网，比较便利的出海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长足的提升，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也对西部的农林、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此情况下，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东北振兴的进程中应该享受国家的大量投资，而且主要投资于这里的装备制造

业。利用东北现有的比较优势发展装备制造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应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旗号下，发动新一轮的赶超。各级地方政府尤其要避免以拔苗助长的方式发动和鼓励当地企业进行产业、技术赶超，再一次导致新的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历史教训已经非常严重，不应该重走同样的弯路。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积极转变职能，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创造条件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符合比较优势的的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这样东北三省必然能利用其资源、人力资本和优良的工业基础的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再次胜出。

---

(1) 合作者刘培林，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3年第62期（总第404期），发表于《经济要参》2003年第4期。

粮食问题与农村发展

关于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意见 (1)

在2001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城市化”提到了显著位置。为什么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下？如何促进城市发展？如何促进农村现代化？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上述问题我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一、城市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和政策选择

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计算，我国在1999年达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在世界206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2%，排第141位的洪都拉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达52%，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也远低于下中等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为43%的平均值。

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钱纳里等曾经描述了在常态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水平上平均的城市发展水平。

表**1**　不同收入（**GNP**）水平上城市化预测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4年美元不变价）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城市人口比重（%）	22	36.2	43.9	49	52.7	60.1	63.4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以1964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54美元，可以与表中100美元或200美元的时点相比较。该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不仅大大低于200美元时点上的城市化预测值，而且低于100美元时点上的城市化预测值。所以城市发展水平低的问题在我国可以说由来已久。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城乡隔离政策”，以为取消了这个政策，就能解决城市发展水平低下的问题。殊不知，“城乡隔离政策”本身是一个果，而不是因，城市发展水平低

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

在建国以后，政府为了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目标集中反映在“一五”和其后的各个五年计划中。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重工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不具备自生能力。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政府创造以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为特征的扭曲性宏观政策环境，实施以计划和行政手段为特征的资源配置制度。

但是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因此，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结果，改革前的27年里，农业的产值份额从57.7％下降到32.8％，下降约25个百分点，而农业的劳动力份额由83.5％降至73.3％，仅下降10.2个百分点，劳动力份额下降明显滞后于产值份额变动。

而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框架下，采取的是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为了防止农民进城增加政府低物价政策的负担，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防止农民分享城市工人所获得的压低价格的食物和住房等供给。虽然从政策上讲，农民可以通过国家招工直接改变（或通过服兵役间接改变）身份，但实际上农民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在文革期间，由于城市里创造的就业不足，还把大量的知青下放到农村。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到了矫正，非农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隔离政策被修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猛增，“留足了国家，交足了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剩余的控制权和投资权。亿万农民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非农产业，为扭转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这个几十年来一直困扰政府的大难题，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78—1999年间，仅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增加量（9877万人）一项，就占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25259万人）的39.1％。如果再把农民在其他载体（如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独自进城当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经商等）中从事非农活动考虑进去，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更大了。同时，政府也将农民只能居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户籍和职业的双重管制改为单项的户籍管制，即摈弃了农民不能擅自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管制。

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则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2000年的53.1%，变化幅度高达23.6个百分点。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问题得到初步矫正。

对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病，主观上若不加以深刻认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影响。虽然随着信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重工业不再是先进产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也没人再提，但是其变体还深植人心。50年代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其弊端在于，重工业是一个资本极端密集的产业，而中国当时是一个资本极端稀缺的经济。虽然经过过去50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积累迅速，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要素禀赋的特性还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如果忽视这个禀赋特征，而去优先发展资本过度密集的产业或产业区段，那么，就业、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绩效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因此，要提高我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本密集产业上的赶超。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只有创造足够的城市就业机会，打破“城乡隔离”的政策才不会导致城市无业游民和贫民窟的大量涌现，一些现有的大城市也才不会继续采取各种形式的歧视农民、阻碍农民进城的政策。

劳动力密集产业多数为中小企业，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需要有适当的配套政策。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消除各种形式的对劳动密集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歧视，鼓励创业；在税收方面，应纠正对中小企业各种形式的不公平待遇；在金融上，应大力发展能够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从而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为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持续发展扫清障碍。

二、“城市化”抑或“城市发展规划”

我国城市发展水平落后，确实有很大的缺课要补，但是一国城市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到底多少人口从事非农领域活动？多少人口从事制造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主观臆断，也不应该拔苗助长。而且，城市的地点、规模，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不能由“长官意志”主观决定。譬如厦门因“五口通商”而兴起，上海得益于绝佳的国际贸易条件，“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城市随着陆路交通的式微而相对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面积广阔的国家，我们仅能

知道会有几个超级城市、许多大城市及数量更多的中小城市，但到底各种规模的城市数量应该各有几个？各个规模的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多大？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永远难于争论清楚。在这种情形下，谈“城市化”容易引起计划经济的办事方式，主观决定城市人口的比例以及城市的地点及规模。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如使用“城市发展”的措辞而不用“城市化”一词。

虽然城市发展的水平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自发决定的，但是政府也可以在城市发展上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政府实施灵活的土地政策、灵活的工商业发展政策、灵活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可以使新城市在有条件出现时自发形成，现有的城市可以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规模。其次，在现有城市里，必须有比较好的各种功能和配套条件的规划，政府可以透过专家，对城市商业区、绿地、教育、交通、环境、道路、卫生等作出专业规划，以利于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的环境。

总而言之，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既不能“长官意志”，对城市选址、城市规模横加干涉，又不能“放任自流”，放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三、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应该并重

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农村的现代化。我国现在还有8亿人生活在农村，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能只关注城市居民，也必须给这8亿农村居民提供适当的现代生活条件。

我国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农户都是生活在有百户、几百户居民以上的自然村。以这些自然村为单位，给农村居民提供上水、下水、电力、道路等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是农村现代化的必要内容。

对于上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些学者担心会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变成浪费。实际上并不会如此。我国现有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8%，即使最乐观的估计，到2030年我国至少仍然有30%的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全国人口总数到那时，按保守估计将有16亿人，也就是到2030年至少会有5亿人仍然居住在农村。现在为改善8亿农村居民的生活而投资的基础设施，到2030年仍有5亿人在使用，绝不能算是浪费。

固然，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在许多方面会有差距，第三产业和不少现代生活的设施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只有在一定规模的城市才能发展起来。但是我国人口密度高，绝大多数地区内乡村

与城市之间距离较短，随着摩托车、小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价格的降低和普及，乡村与邻近城市的交通往返变得非常方便，住在农村的居民也可以方便地到城市里消费第三产业提供的现代服务，从而使农村生活仍具有很大吸引力。所以，我国未来的城乡发展模式，很可能在几个超级城市和大城市外，形成星罗棋布的以中小城市为核心的城郊社区群，现有的农村变成中小城市的卫星社区。如果未来我国的城乡按此模式发展，那么，现在为农村现代化而在上水、下水、电力、交通上的投资就更不会是浪费。

农村的现代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本来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且，在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通货紧缩势头尚未减缓的形势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十分必要。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启动市场。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一般规模较小，使用的物资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有了这些现代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以后，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将会释放出来，涌现家用电器购买高潮，以及“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将我国各行各业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使我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正常的快速、健康增长。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35期（总第257期），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3.2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6.4%，为同期世界各国之冠。但是，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实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曾经被认为是农村奔小康所必须达到的目标，可是这一目标自1989年以来，除了1996年外，其他年份都没达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仅比1999年增长2.11%，和1997年相比也仅仅增长了10.5%。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在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比人口年均增长率高出5.1%，从中外农业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中外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业生产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调整。(3)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一直沿着上述的两个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进行，但是从1997年起，农村产业、就业出现了逆向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滑坡，1998年、1999年农村工业从业人员净减少1000万人左右，而农业从业人员不减反增，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出现了滑坡、停滞的现象，“三农”问题因而转为严峻。

一个国家农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农业就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前提是该国家非农产业的不断增长，可以容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城市出现一批无产、无业的游民，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问题。1997年底，我国国民经济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出现以后，一方面，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开始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城市企业开工不足，导致投资下降，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难于转移到城市就业，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下，技术、管理、产品质量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受到的冲击远比城市企业严重，不少乡镇企业停工、破产，使“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就业结构调整逆转，不少农村劳动力回流到附加价值较低的农业，并牵连乡镇政府普遍高额负债，据调查，全国每个乡镇的负债平均高达400万元，这些债务最终必须由农民来归还，使农民的负担问题更为雪上加霜。

在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一般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意愿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

职工将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导致职工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消费趋于谨慎，加上我国这几年的医疗、保险、教育、就业、福利制度改革增加了职工未来的支出预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在2000年占我国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4.8%，当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意愿双双下降，而生产能力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时，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意愿更加不振。因此，要实现农民就业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启动内需，消除国民经济中的过剩生产能力，遏止通货紧缩的势头。

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是存量的过剩，要在短时间内消除普遍过剩的生产能力，必须要启动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存量需求才能实现。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必然已经得到满足，因此，不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需求存量，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后，总是旷日持久，国民经济每况愈下而无法走出困境的原因。但是，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基本上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条件不充分，市场发育不完全。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全国总户数2/3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有一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2000年农村每百户居民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48.7、12.3、28.6，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价格仅为1991年时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也仅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见，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作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农村电价每调低一毛钱，对彩色电视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农村居民用电和城市居民同网同价，在农村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锅做到村村通电视，建水塔实现村村通自来水，农村地区将会很快出现一个家用电器的消费高潮，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将不再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农村地区还会自发地掀起“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

高潮，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

而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在农村地区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经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都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展，而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加强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国民经济可以恢复健康、快速、持续的增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可能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缩小地区差距

我国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东中西部之间收入差距如何不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关于此点，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在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进行地区间的产品串换，那么，各个地区间劳动者的收入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拉动另外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粮食为例，当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人多地少，工资水平高，因此，粮食这种土地相对密集的农作物在东部地区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就会越来越不合算，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拉动力。(4) 同样的道理，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会增加购买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推动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会随着东部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而不断缩小。所以，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大市场。

当然，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易是需要交通、运输、仓储、信息等成本的，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依靠“要素价格均衡理论”的道理来使各个地区间的收入达到均等。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还有赖于要素的流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第二层意义是发育和完善全国统一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市场。东部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会越来越短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富余的劳动力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累资金、信息和技术力量，而且可以使留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土地资源来从事生产，创造收入。这样，东中西部地区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有机结合，东部地区的发展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东中西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就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

我国现在已经正式加入WTO，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实施WTO的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迎接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不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但违背WTO的原则和我们的承诺，而且东部发达地区有可能抛开中西部地区，利用高度开放的新形势与国外开展分工合作，比如从国外进口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以及资源密集型矿产品，这样，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比较优势发生变动而让出的市场和转移出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很有可能落到了境外，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就无法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获得拉动力，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愿望就会落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也将有利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发育市场，然而，这绝不意

味着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活络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能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而且调控的面也大大拓宽了。（1）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当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时，才有可能从应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脱出来，着重研究和解决一些真正属于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问题。（2）通过市场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政府将主要依靠一套规则而不是一笔资金或审批来协调经济运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员因参与微观经济运行而滋生的受贿、索贿等陋习，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观调控方面。（3）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面临特殊挑战，政府直接对农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既违反WTO规则，实践中又难以奏效，对于农民来说，在政府规则面前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计划分配的物资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

虽然经过多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但是，目前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不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政府应该继续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从市场的特性来说，交换是市场的基础，而产品和要素的交换只有在两个所有者的效益都能增加时才会出现。交换时所需的交易成本越低，交换的效益就越大，参与就越踊跃，市场就越活络。同时，随着市场的深化，生产者面临的市场风险也越大。政府在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两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这些领域负有直接投资和发展的责任，在必要时也可以开放、鼓励民间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另外，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而货币则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动。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质是所有权的交换，所以只有在所有权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所有权的直接侵犯，不仅使农产品在地区之间调剂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变动和比较优势的发挥遇到很大的障碍。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权，以法律的方式来保障所有权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发育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

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而且，消费和需求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准确预测的。但收集和处理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应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资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给的边际成本为零的方式让众多农民分享。这些信息由各个分散的农户自己来处理，显然缺乏经济合理性，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三、加速科技和体制创新，增强竞争力，迎接入世的挑战，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根据我国和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我国有可能利用这个潜力在新世纪继续维持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GDP年均7%左右的快速增长。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6%的水平。

人均GDP增长会引起膳食结构的改善，对肉食品需求的增加必将导致饲料用粮大幅度增长。同时，我国人口在2000年底时是12.66亿，预计2030年达到顶峰时将有16亿，比现在增长1/4，基本粮食需求会随之大致同比增长。但是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差，耕地面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呈减少趋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耕地还会进一步减少。另外，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急剧下降。2000年时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6.1%，如果能在未来30年保持年均7%的GDP增长速度，届时农业就业人口有可能降低到25%或更低的水平。除了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外，经济增长也必然要求农业自身的生产结构随之调整。经济发展导致生活水平提高，对农产品品种选择和质量的要求提高。同时，农业劳动投入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只有不断往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转移才会有生命力。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将更为开放，农产品只有在品质上、成本上不比进口农产品差，才能有竞争力。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30年保持快速的增长，将对农业产生两个挑战：一是在农村就业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我国的农业能否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自己；二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引进新产品，并改进现有品种的质量，使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伴随经济增长而顺利进行。

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到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水平，那么，从现在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1%，粮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目标应为

1.8%，到2030年粮食产量应比现在高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况下，我国未来能否增产这么多粮食的关键在于单产能否不断提高。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二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这一途径潜力有限。所以，要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主要依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实，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我国从60年代以来的粮食增产也同样是有赖于此。

在1991—1993年间，我曾经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就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在全国各地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根据调查，我国现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的差额约为实际单产水平的1.5—3.5倍，这个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种现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潜力。这项调查又发现，如果我国政府对粮食科研给予足够支持，有一半的潜力可以用传统育种的方法改进作物品种来实现。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政府就特别重视粮食科研，而且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我国在1964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1976年开始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1990年代初我国仍是世界上惟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所以，只要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重视，依靠传统育种的方法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和实际单产水平之间的潜力，就应该能达到每年增产1.8%，实现在2030年比现在增产70%的目标。如果考虑今后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在育种上的运用，只要政府给予粮食科研足够的支持，我国就一定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

当然，从经济合理性考虑，达到百分之百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不是最佳选择。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而我国恰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更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入WTO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经济增长对我国农业的主要挑战在于前述的第二点，即如何增加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养殖品、农产加工品的品种、质量，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农业的竞争能力。我国农业科研体系在粮食科研上有足以傲人的成绩，但在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的科研能力还相对薄弱，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适应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需要，提升这方面

的科研创新能力，不断给农业提供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的质量，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政府应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科研及成果推广，缩小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在质量、品种上的差距，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靠的就是科技和体制创新，今后创新的重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品种、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上。在体制创新方面，尤其要注意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的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创新关键是要让广大农民及时、低成本地得到所需要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由于市场秩序混乱，经常发生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农事件，今后应该配合市场秩序的整顿，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由于这类事件一旦发生，给农民造成的巨额损失事后无论怎么惩罚肇事者也无法挽回。可以考虑改革良种、化肥、农药等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经销体制，培育大规模连锁经营方式，规范市场秩序和信誉，一旦发生坑农事件，生产资料经营企业也有足够的财力加以赔偿。

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与进口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将我国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组织建立和执行农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体系，为广大农民和农产品市场经营者树立明确的努力方向。目前农民对国际市场和外国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卫生检疫要求等情况并不了解，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职责，所以并不是直接的农业保护或补贴，也符合WTO规则。只要广大农民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所提供的机会，他们自然会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样，打赢加入WTO这场战役，将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改进品种、质量的农业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国自己的能力外，我们还可以加大农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品种。在这方面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值得特别重视，我国内地农业科研不足之处正是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科研体系的长处，两岸农业科研体系在这方面合作的空间很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地区的农业部门也跟着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大米和甘蔗两大类传统农产品生产相对萎缩，并保持净进口态势，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和水产养殖的生产则依靠农业科研部门和推广体系的卓越成绩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目前随着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

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在台湾地区的竞争力正在逐渐丧失。加入WTO以后，中国内地农业可以与台湾地区开展分工合作，鼓励台湾地区农民到内地来投资，将品种、技术转移过来，以加快内地本身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既有利于台湾地区的农民，有利于内地的农民，也有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加速农民就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以后，政府不再能够给予某一个产业直接的补贴，非农产业的大发展必须是这些产业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这就要求这些产业符合我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讨论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时，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区段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无法完成，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出现种种困难而“欲速则不达”。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快，资本在我国将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就能够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赶超发达国家。

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有灵活的金融市场的支持。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

放，面临的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业的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而动员资金的功能其实从属于配置资金的功能，因为资金配置得好，经济的效率高，经济中的剩余就会多，可动员的资金就多，而且，资金配置得好，资金的回报率高，储蓄意愿就会高，在经济剩余中用来作为积累的比例也就大，这样，资金动员的效率也就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速度就会减缓。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居多，一般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和发展，在技术选择上比较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对实现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WTO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加入WTO后，我们需要对境外投资企业和进口产品实行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实际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对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落实非歧视和国民待遇的原则，所有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都应该更加彻底地向我们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一些不向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也应该向自己的民营经济开放。本来无论加入WTO与否，我

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民营经济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思想观念不够解放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而没有及时调整到位。行业进入限制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现实情况是，许多已经向外资开放的投资领域在政策上也还仍然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民营经济在财税等政策上仍然与外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甚至与国有企业相比，在体制上还比较容易受到歧视。新形势下，发展民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投资领域需要全面向国内民营经济开放，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结　　论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很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了加快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为了开拓广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当前国民经济中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问题，走出通货紧缩困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纯收入中仍然要以来自农业的收入为主，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努力方向。我们应该结合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开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业产量，改进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不断依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依靠体制改革，培育现代农产品营销方式，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和执行广泛的农产品质量、卫生标准，为农民和农产品经营者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能力。为了推动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还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努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出口。通过发展中小银行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配合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我们应该首先消除对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限制和政策歧视，加快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民营经济培育成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的一条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实将使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国民经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

(1) 本文发表于《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期。

(2) 本节根据2001年1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汇报的“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一文整理。

(3) 由于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小，如果没有农村人口就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不断调整而仅仅是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谷贱伤农”，农民的收入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而增加。

(4) 同时，只要粮食价格上升，中西部地区农民产粮的积极性提高，中部增产的粮食将能够弥补比较利益低的东部地区减少的产量。并且，粮食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区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就越大，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也就会越小。

促进农村发展的几点战略和政策思考 (1)

促进农村发展的“中原突围”思路

众多农村人口无法实现顺利非农化转移，是我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减少农村人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并为整个经济体制转型创造条件和提供空间。但针对如何减少农村人口的问题，目前存在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中期内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重点，应该从中部传统农业地区开始着手，解决了中部劳动力的转移就有可能为解决其他的农村问题提供空间和余地。成功解决中部农村地区的人口转移的主要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工商业；二是解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而推动小城镇的发展。

本文中所谓的中部地区不仅是地理区位上的中部地区，而是人口高度密集、长期以传统农产品生产为主、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地区，大体包括河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等10省区。中部省份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一半以上，其中农村人口超过80％的有6个省。2000年中部10省区中有8个省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促进中部地区工业化及劳动力流动应是农村战略的一个重点。这些地区是中国传统农业地区，上千年垦植历史使得它们在传统农产品生产中具有竞争优势。如果在不断促进中部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下，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培训等公共投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优势将得以重新发挥。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又可以使农产品净消费规模得以扩大。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在未来的20年中，中部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

中部地区是中国农村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巨大的乡村人口的压力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和包袱。由于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这些地区也是生态破坏最严重、恶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只有减少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乡村人口的迁移，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空间。解决中部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实施中部地区乡村人口转移的战略，有以下好处：一是可以增加净消费商品性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的人口规模，增加农产品的需求；二是为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提供了市场空间；三是可能实现生态脆弱区的移民目标；四是可以利用新增的财政收入对移民之后的生态脆弱区进行保护；五是可以抑制目前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的快速恶化。显然，促进传统农业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和劳动力流动，与政府扶贫和生态保护的基本战略并不矛盾。

一些专家对于发展县及县以下的中小型工商业始终心存疑虑，认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十分低下的这类企业，进入目前制造业产品普遍过剩的市场存在很大困难。因此，发展这类企业经常造成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等等问题。事实上所谓加工业产品过剩，与其说是产业结构或产品结构问题，不如说是产权问题、人口问题和农村发展问题。所谓产权问题是指国有部门的问题，如果继续依照过去的投资模式，所有的投资失败的责任始终要由政府来承担，那么过度投资和重复投资当然会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但在所有的投资都是私人投入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过度投资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逻辑。人口

问题是指由于没有足够多的非农业人口来消费现有规模的加工制成品。而农村发展问题则是指由于消费现代工业制品的各种基础设施的缺陷和障碍，造成制造业产品市场规模的限制。

中部地区农村人均收入相对高于西部地区，这是优先推动中部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前提。例如，对一些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来说，即使具有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也可能由于收入水平太低，无法支付外出打工的交通费用。优先支持中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化和劳动力流动，比西部大开发具有更多的优势，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中，中部地区农村人口的边际收入增长比西部地区更具有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如不能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支持中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劳动力流动，下一步经济的高速成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乡村人口迁移的目标就难以尽快实现，西部农业发展因缺乏市场需求也将难以为继，生态脆弱区移民也就无从实现或者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因此，如果不能推动中部农村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也就难以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生态问题。

中部农村发展培育农产品市场是关键

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禀赋不同、比较优势各异的地区，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结构，然后通过统一市场进行地区间产品串换，就能促进各地区间劳动者收入趋同，从而使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带动另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存在交易费用，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会十分明显，市场体系结构会非常复杂。目前，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了我国多样化的交易市场形态。就农产品交易而言，各种交易市场的存在适应了当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需求的特征，满足了各种交易对象的交易需求。逐步发育和完善各种市场交易制度，促进我国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市场化程度，是促进中部和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的交易市场的形态主要有：（1）集贸市场。集贸市场在我国已有上千年历史，当代中国集贸市场已经成为遍及城乡的一种市场交易形态。尽管其形态较为原始，但对于满足近距离的、社区范围内的农产品交易需求却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集贸市场适合于数量少、交易频繁的农产品，且较少地受到运输距离、保存、储藏等交易费用的影响，适应了小规模农户多样化经营的需要。（2）专业市场及综合性批发市场，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市场、安徽亳州的药材批发市场等等。这些市场的特点是为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农户降低交易费用并提供了良好交易条件。（3）远期合同交易市场，如广西正在发育之中的

糖业远期合同交易市场。远期合同交易市场成为农产品交易的一种新的市场交易形式。（4）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大连期货交易市场正在试验运用现代市场交易工具进行相关的市场改革的探索。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农产品交易的市场化发展是其必然的要求。全国多样化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政府如何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制定全国统一的、完善的农产品质量体系标准及农产品安全的检验、检测标准，已经成为市场建设过程中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同时，利用WTO的绿箱和黄箱政策，改善市场交易的条件，支持各种市场主体参与到市场建设的过程之中，同样也是政府需要积极探讨的重要政策问题。

就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来说，市场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讯、金融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区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体系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都很大。为了避免市场发育因这些硬件设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扶持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活动。此外，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产决策就越准确，市场的风险就越小。所以政府在这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商情预报，指导农业生产，以减少农民生产经营的风险。

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

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在日渐扩大，流动速度也在加快，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下降，劳动力流动加速、规模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形成异地就业、回乡安家或创业的模式，与家庭承包集体所有土地的制度密切相关。这种非农就业的模式，从近中期看，将会是农民增加收入、进行非农创业及进入小城镇的重要基础。他们通过广泛接触大中城市现代生活，通过在现代工业和其他产业中学习，不仅获得了信息、学到了知识和技能，同时也积累了进行非农创业的原始资本。这样的流动模式是当前制度框架下农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支持农民的这种流动就业应该是政府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关注的重点。我们认为在农民自发的这种流动就业中，政府政策应在以下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第一，消除目前大中城市关于农村居民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积极鼓励吸收农村居民就业的企业及其他团体的发展。帮助各级政府建立对农民流动就业的管理，使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能够相互密切合

作，就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进行创新。

第二，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门槛和成本。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于目前分布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的专门培训，为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更大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支持条件。目前位于地（市）、县一级的农业中专学校和农村职业高中长期由地方政府负担费用，不仅使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造成这些学校没有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对专业、课程、培养对象进行灵活多样调整的积极性，造成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如果将政府过去的直接财政投入改变为对参与学校建设的私人投资者的补贴，整个局面将会发生重大改变。

第三，中央政府应把对劳动力流动的支持重点集中在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有较高农村收入和相对良好的地方财政资源，大多数已经不需要中央财政给予直接支持。西部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民面临着如何摆脱贫困和维持收入的稳定增加的问题。中部地区不仅是农村人口最为集中、土地资源压力最大的地区，而且是农村流动就业的主要流出地，同时中部地区流动的农村人口，无论是教育水平、收入水平都要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公共投入的边际收益显然会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第四，通过帮助县及县以下地区工业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劳动力流动就业与小城镇发展。尽管目前小城镇的建设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政策和体制的限制，但是从实际经验上看，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不足是小城镇发展缓慢的主要障碍。例如，许多县、乡虽然已经放开了对农村居民的户口限制，但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加快；一些中部地区小城镇虽然修建了街道和楼房，但街道空空如也，商业十分萧条，说明工商业的繁荣才是一个小城镇兴衰与否的关键。如何帮助、鼓励和支持回乡农民建设家园和回乡创业，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的政策内容。目前实行的不论工商业规模大小一律收取同样税赋、所有的工商业者必须注册登记并每年交纳各种费用等政策，都对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抑制和障碍作用。更广泛地来观察，目前中央、省及县乡之间增值税和所得税划分留成体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因而应对这些政策加以改革调整。

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体制创新

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已经成为政策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广泛关注的问题。自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战略之后，农村金融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反而出现了更加令人担忧的各种新问题。不仅众多的农村人口得到的基本的金融服务在不断减

少，县域内经济发展获得的金融资源也在下降，同时在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战略性“撤退”之后，作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正面临政策和体制的约束，众多的不良资产和累积亏损形成了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中央银行对于农村金融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改革试点，中央政府也正在制定国有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案。但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方案无论设计得多么完善，也很难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金融体制创新与金融市场发育与农村其他制度改革一样，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一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并依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其农村金融的基本构架。如果依然采取中央统一决策，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采用相同政策、管理体制和监管手段，便很难让所有地区都达到政策设计目标。

农村金融改革在目前阶段应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应首先考虑分拆，分拆之后才能积极推动非国有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只有逐步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才能够形成商业银行真正的竞争局面。在分拆和民营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根据不同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民营化之后回收的国有股权资本中央与地方分成，留在地方的可以作为金融风险防范基金。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应逐步加强包括储蓄保险体系、监管体系的建设，学习管理中小型银行及银行业市场；逐步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可依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地方金融管理局，在中央银行统一政策框架下，对辖区内的金融市场实施监管。

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应由各地方政府提出自身改革方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或者归并到现有的商业银行（中部地区），或者归并到政策性银行（西部地区），或者直接改制为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或者继续保持目前的信用社合作性质但必须进一步明确产权。中央对于不同的改革模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扶持措施。未来监管将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负责。

三是进一步关注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一方面必须扼制恶性高利贷和金融诈骗活动，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在正常范围的、符合资金供求规律的民间借贷活动。同时还应该关注一些具有创新性质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活动，如温州票据交易市场、已经关闭的淄博股权交易市场、私募基金、民间的各种信用担保活动等等。同时应继续坚持农村利率自由化改革试验，并在试验过程中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协调作用。

---

(1) 合作者陈剑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4年第1期。

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 (1)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发展，是完成在2020年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包含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三方面来论述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将农民收入增长放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背景中来看，是一个相当戏剧化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在农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从传统的集体生产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这个生产制度的变革意想不到地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从1978年到1984年连续6年的快速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7%，与1952年到1978年集体生产时期的年均2.9%相比，增速提高了1.65倍。这段时间农民收入增长很快：1978—1984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4%，高于城市一般工人和公务人员收入增长。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中国政府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信心，所以从1984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启动了第二阶段改革，将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进入第二阶段改革后，中国总体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78—2002年的24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高达9.3%，中国经济翻了三番，即如果以1978年经济规模为100，2002年达到850，增速高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提出的20年时间翻两番的年均增长7%的速度。

虽然中国总体经济发展很快，然而作为改革发源地的农村地区近年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焦点，“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去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社会上的一个共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农村。对此中国政府给予

了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仔细分析“三农”问题，其实可以发现农业本身问题不大。从农业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农业能长期维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中国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长已经达到了6.2%。就是在大家认为“三农”问题很严重的1998到2002年这5年，农业每年的总产值的增长率也达到4.7%。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经验来看，这都是相当好的成绩。“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真穷，反映的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真苦，反映的是农民负担很重，一方面收入低，另一方面还要交很多税费。但是这两者共同反映的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的问题。2002年的数据表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702元，农民可用纯收入只有2476元，仅为城市居民的32%，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5226元。而且城市居民的7702元收入基本可用于生活消费，而农村人均纯收入中，还要扣除一大部分用来支付生产投资、税费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1998到2002年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4%，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3.4%，上述收入差距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因而，中国的“三农”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有些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

如何才能根本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这方面的政策建议很多，包括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提高农业的技术投入和生产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等。仔细分析起来，这些政策建议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不见得能够持续推行。

首先，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其实中国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空间很小。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贸易自由化是世界贸易组织正在举行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可预期趋势是农产品贸易将越来越自由化。我国农民主要生产粮食，而我国粮食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价格，有些产品如玉米、小麦的价格有时还高于国际价格，因而在农业贸易将更为开放的前提下，基本没有继续提价的空间。更何况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会升值，进口的农产品的价格会更低，因此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相当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是很难继续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来长期使用的。

其次，给予农民补贴。由于这几年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社会上有许多呼声要求政府给予农民直接的收入补贴。这个政策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所允许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协议规定，中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在2002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是27390亿人民币，8.5%即为2328亿。目前中国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只有780亿，即还有1548亿的补贴空间。但问题在于，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2.6%，即农业中还有9.3亿人，即使加上这1548亿的补贴，农民的收入也只不过人均提高166元，而2002年的城乡平均人均收入差距达到了5226元。因而，对农民来说，补虽然比不补要好，但是实际意义不大。而且，除非给予农民的补贴的增长能够以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来增加，否则补贴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要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不允许给予农业这么多的补贴；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2.6%，不可能依靠27.4%的城市人口的税收来实现农业人口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政府给予农业人口的补贴很多，但是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是很少的，通常不到总人口的3%，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2.6%，因而，依靠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在目前的阶段是不可行、难以持续的。

第三个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增加农业产出水平。这项政策的问题在于，新的技术出现后，第一个采用的农户能增产又能增收，但是所有的农民都采用以后，常常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情形。这与农产品本身的特性有关，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很低，供给增加一点点，价格就会下降很多。中国有一句古语叫“谷贱伤农”，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结果往往是产量增加，市场价格降低，农民增产不增收。所以单靠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也不能作为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第四个经常被提到的方法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产业化，增加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但是，农产品还有一个特性，即农产品的收入弹性特别低，居民收入增加以后，对各种农产品，包括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所以经常出现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以后，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多了，价格也同样下跌，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有限。

所以，上述传统政策思路并不能长期、持续、大幅地提高农民收入。要长期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惟一可行的、可持续的办法是减少农业人口，把农村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会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了农产品的需求者，

农产品价格会相应提高，从而克服了农产品收入弹性低和价格弹性低对农民增产增收的先天制约；另一方面，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出来以后，留下的农业生产者人均可用的土地等资源就会增加。这两方面都可以增加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收入。从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够使得农村人口的收入快速增长，使得城乡差距不会扩大甚至越来越小的有效政策就是减少农业人口。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劳动力都在农村，但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农村、农业人口通常都在5%以下。欧洲、美国是如此，东亚的经济也是如此。日本在1950年时，务农人口还占48%，到现在只有3.9%；后来的新工业化经济，如韩国，1950年农村人口达到74.3%，现在只有8.8%左右。

中国自己的经验也和上述外国的经验吻合。1978—1984年这一阶段，农业和农村发展主要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民离土不离乡，从农业生产者变为农村的工业生产者，吸纳了1.2亿劳动力，农民收入继续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到90年代中期，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由此看来，“离土不离乡”转移了1.2亿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转移了1亿农村劳动力，所以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三农”问题变得严重，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形势，新增投资减少，减少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民很难继续转移出来。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利用短缺经济空挡大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在全国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情况下出现大量破产，原来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又从非农产业回流到农业。新增农村劳动力难于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因此，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

由上述的分析，无论是理论的推论还是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只有实现了农村劳动力不断的、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要生产足够的粮食、农产品供城市人口消费，就要求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城市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对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要求进行农业结构调整。这样，提高农业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三、农村教育与发展农村经济

无论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或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提高科

技投入水平，都与农民的素质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果农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好，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以后就能比较容易地掌握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同时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转移所带来的摩擦会比较小。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生产新的作物也需要新的知识，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素质，才能够掌握新的耕种、施肥、灌溉等等方面的技术。科技投入水平的提高也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素质以掌握更新的、动态的，甚至是风险比较大的新的技术。劳动力素质决定于教育水平的高低，因此，农村教育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中国政府对农村教育是重视的，提出了要在农村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对于总体经济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而且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好处。目前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教育负担不公平的问题。城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费用基本上都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绝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己承担的，也就是在第一部分提到的，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2476元，但是这些收入并不能全部作为生活费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要用来支付农业生产和子女教育的费用。在第一部分也提到，“三农”问题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民负担问题，而农民负担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用来负担子女或者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中政府不用财政拨款来支付的学校建设、教师工资和经常性办公开支。

义务教育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指父母有义务将学龄儿童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如果父母不执行，应该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又是政府有义务为学龄儿童提供教育。在中国的农村，政府虽然已经提出了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是做得不够。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农村地区提供义务教育呢？这涉及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问题。根据粗略的估计和测算，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工资的费用。现在中国农村的小学教师有380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保证这些教师每月500元的收入，即一年6000元，那么需要经费232亿元人民币。每月500元工资在东部发达地区可能不够，需要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再补贴一点；在中西部地区，每月500元的工资基本能够稳定小学教师队伍。全国农村地区的中学教师有223万人，如果中央政府财政保证每月800元的收入，这个工资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应该能够稳定教师队伍了，东部地区同样需要地方政府再补贴一点，总的费用是214亿元人民币。两项加起来是446亿人民币。2002年中央和地方合起来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18913亿人民币，446亿只不过占到2.3%，财政上是能够承担得起的。2002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0390亿人民币，即使这笔费用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也只占到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4.3%，也是中央政府承担得起的，因此由中央落实义务教育的精神，用中央财政来支

付义务教育中最大的一笔费用即教师费用，是完全可行的。做到这一点，才是名正言顺的义务教育，才能够稳定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队伍。

除了农村的义务教育之外，农村劳动力要大量进入城市，子女、家庭会跟随劳动力一同转移出来，目前对于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子女的教育也是很不平等的。中国有户籍制度，政府在城市只保证有城市户籍的人口的子女的教育。进城的农民工的子女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如果要受教育，需要交纳很多费用，很多转移出来的农民是负担不起的。因而很多外出的农民工把子女留在流出地，即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但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所得，包括货币和其他福利，应该包含其自身的生活基金，以及自身与子女的发展基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里，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拿到的是货币工资，对流入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财税收入作出了贡献，因此流入地政府应该为其子女提供和在当地工作的有户口的居民的子女同样的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对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和当地政府的税收已经没有直接的贡献，其子女留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流出地的政府和留下来的农民就要承担起这些外出劳动力的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等于是流出地的农村在补贴流入的城市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之下，转移出来的农民如果将子女留在农村地区受教育，将成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如果农民工的子女伴随父母进入城市，但是付不起教育费用而失学，这些子女长大后绝大部分会留在城市就业，将来就会降低城市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结　　语

农村义务教育，无论是对我国农村发展，还是对整体经济而言，都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目前中央政府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正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几个保证，其中第一个就是保证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农村的教育会发展得比较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负担的减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会大受其益，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也会进行得更好，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能够顺利达到。

---

(1) 本文为2003年10月19日我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教育国际论坛”上所作的题为“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发言，后整理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3年第72期（总第414期）。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过去与未来 (1)

1996年中国人口达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和欠发达经济体总人口的38%。 (2) 但是，中国人均耕地大约只有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之一，径流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有大约1/3可开发，年降雨量分布十分不均匀，北部水资源短缺严重，而南方经常发洪水。由于自然禀赋和气候条件差，除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外，中国农业生产经常遇到挫折，西方观察家一度将中国视为“饥荒之地”（Mallory，1926）。中国最近几十年成功养活自己，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尽管过去取得了成功，但中国将来能否养活自己最近又成为国际关注的一大热点。中国经济被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长（Lin et al., 1996）。一方面，经济迅速增长预计会极大地削弱中国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Anderson，1990）；另一方面，城市化、市场化和饮食多样化将显著增加中国的食物需求，而且中国人口到2030年还要增长40%，达到16亿。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太大，她的食物需求和国内供给之间的缺口的微小变化都会对世界农产品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中国食物生产在未来几十年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将首先讨论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她的庞大人口的，然后讨论中国是否有潜力满足未来的食物需求，以及如果中国试图在将来继续养活自己，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一、中国过去是怎样养活自己的

尽管中国政府努力控制出生率，中国还是像世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当代经历了人口的迅速增长，1952—1996年中国人口从5.75亿增加到12亿。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人均耕地面积的相应减少。50年代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足半英亩（1952年是0.45英亩或0.18公顷），80年代更减少到仅1/4英亩（0.1公顷）。 (3) 尽管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下降，但中国人的营养在过去几十年却大大改善，

到20世纪90年代，人均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日摄入量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在50年代是粮食净出口国，但在60年代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不过净出口和净进口从未超过国内粮食生产的5%，中国事实上是粮食自给经济。中国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长到1996年的4.9亿吨，增长了3倍，同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85千克增长到400千克。

由于工业开发、居民住宅建设等挤占耕地，尽管中国努力开发新的耕地资源，但总耕地面积自5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其中粮食播种面积自1956年1.36亿公顷的最高点持续下降到90年代的1.1亿公顷。尽管耕地下降，但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这是单产增长的结果。粮食单产在过去40多年间上了三大台阶，从50、60年代的不到2吨/公顷到70年代的2吨/公顷，再到80年代的3吨/公顷，最后到90年代达到4吨/公顷，1952—1996年的44年间，粮食单产年平均增长率为2.75%，这是世界农业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如何迅速发展农业以应付由人口爆炸性增长引起的食物需求增加并支持城市工业化，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上面的回顾可知，中国曾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但同时也犯过许多错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49年，89%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1952年，中国政府采取斯大林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尽快地建立国家生产资本品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在这一战略下，农业事实上被视为向重工业提供支持的部门。

当时资本极端稀缺，自愿储蓄率太低，不能为战略所追求的重工业高投资率提供资金支持。为了促进资本迅速扩张，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申出产业工人的低工资政策。设想是通过低工资，国有企业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并将其再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资本项目建设。此外，实行能源、运输和其他原料如棉花的低价格的做法也是出于同一思路。

实施低工资政策，需要政府为城市人口提供廉价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包括住房、医疗服务和衣物。1953年政府创立了一个限制性食物配给制度（该制度实际上一直保存到90年代初）。(4) 同时，为确保城市配给系统的低价食物供应，1953年在农村实行了强制性低价粮食收购政策，中国国内粮食贸易实际上被国家垄断。实施这种工业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城市工人增加，工业原材料需求增长，需要扩大农业出口

以赚取外汇来进口工业项目所需装备，导致农产品需求剧增。在这一结构下，农业停滞和歉收不仅会影响食物供应，而且对工业扩张也会有几乎立竿见影的、直接的负效应。

因为不愿将资源从工业向农业转移，政府就执行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战略，该战略依赖广泛动员农村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如灌溉、防洪、垦荒，使用传统手段如密植、精心育种、施用更多有机肥提高农业单产。政府相信集体化的生产可以将这些付诸实施，因此发起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独立的家庭农场是中国农村传统的耕作制度。典型的农场比较小且细碎。集体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政府提倡“互助组”制度，四或五家相邻农户临时或永久地将他们的农具和牲畜聚拢在一起，相互交换劳动。集体化运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追求规模经济，动员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运动初期出奇地成功，没有遇到农民的抵制，推行比较顺利。这大大鼓舞了政府领导层，诱使政府采取粗暴手段，耕作制度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的变化，农场规模迅速扩大，平均每个人民公社包括500家农户和10000名劳动者。

如预期的那样，几十亿劳动日被动员出来，但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1959—1961年间一场深刻的农业大危机告终。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在1959年下降了14%，1960年下降了12%，1961年继续下降2.5%。最重要的是粮食产量在1959年减少了15%，1960年又下降了16%，1961年继续保持上年的低水平，直到1962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产量水平。仔细研究新近公布的人口资料可以得出结论，这场危机导致1959—1961年间大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大约3300万人没有或推迟出生（Anton et al.，1984）。[5]

危机之后政府没有取消人民公社，但农业经营管理下放到一种小得多的单位，即由20—30家相邻农户组成的“生产队”实施。这种体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从1962年一直保持到1979年，被以家庭为基础的耕作体制取代。

但应该看到，危机之后的政府变得更现实，许多年都给予农业发展以优先地位，政府政策开始强调现代要素投入。灌溉面积从1962年的3055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29.7%）增长到1978年的4497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45.2%）；但是如表1所示，这种增长绝大多数来自机灌的推广而不是劳动密集的渠坝建设。化肥施用也大大增长，从1962年每公顷4.6千克的低水平增加到1978年的每公顷58.9千克。电力使用的扩张同样引人注目，1962—1978年增长了17.5倍。

然而，最显著的变化是建立了现代的农业研究和支持系统，事实上这是中国政府值得骄傲的领域。中国农业科学院1957年在北京成立，我国29个省（市、区）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农业科学院。国家和省级农业科学院都由几个独立的研究所组成。另外，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和一些大学也从事农业研究。中国农业研究体系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破坏，中国农业科学院和省级、地级农业科学院被改组，许多研究人员以小组为单位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业研究体系得以重建，那时许多县也建立了自己的农业科研机制，各级农业科研机制经费由所属政府预算划拨，农业和国家科委也对下级机构的科研项目提供资助。

表1　现代要素投入的使用

年份	灌溉			机耕面积		化肥		电力
	总灌溉面积(百万公顷)	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	机灌面积占总灌溉面积比重(%)	总面积(百万公顷)	机耕占播种面积份额(%)	总量(百万吨)	每公顷(千克/公顷)	百万度
1952	19.96	18.5	1.6	0.14	0.1	0.08	0.5	50
1957	27.34	24.4	4.4	2.64	2.4	0.37	2.3	140
1962	30.55	29.7	19.9	8.28	8.1	0.63	4.6	1610
1965	33.06	31.5	24.5	15.28	15.0	1.94	12.4	3710
1978	44.97	45.2	55.4	40.67	40.9	8.84	58.9	25310
1984	44.64	46.1	56.4	34.91	30.9	17.40	120.6	46400
1995	49.28	51.9	65.6	n.a.	n.a.	35.94	239.7	712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业经济统计资料大全》，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品种改良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农业科研的核心。在50年代早期，重点放在最优秀的地方品种的挑选和改良上，同时也从国外引进了水稻、小麦、棉花、玉米和其他农作物新品种。水稻育种的重要突破发生在1964年，当时中国开始全面推广具有高产潜力，施用化肥增产效果好且抗倒伏的矮稻品种，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推广亚洲其他地区发起绿色革命的水稻品种IR-8早两年。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改良的棉花品种以及其他农作物新品种也大约同时得到改良、推广，高产品种在生产中被迅速改良和采用。水稻育种的第二个重大突破发生在

1976年，当时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杂交水稻生产商业化的国家。一些研究者将杂交水稻创新和商业开发视为70年代水稻育种的最重要成就（Barker and Herdt，1985，p.61）。到1979年，水稻的高产品种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0%，小麦为85%，大豆为60%，棉花为75%，花生为70%，油菜为45%（农业部计划司，1989年，pp.248—249）。

在研究和应用技术方面所作的努力预计对农业产量增长贡献巨大。一项实证研究直接测算了科研对生产的贡献，发现1965—1993年间农业产量增长的20%可以归因于科研诱致的技术变迁（Fan and Pardey，1997）。另一项实证研究集中考察了1970—1990年间中国的水稻生产，也证实技术变迁在解释产量增长方面最重要（Huang and Roelle，1996）。但是，当我们看总要素生产率（TFP）而不是土地生产率的变化，看1952—1996年整个时期的生产率变化而不仅是一个短时期时，情况就会大为不同。樊（Fan，1997）和文（Wen，1993）的研究表明，TFP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低于50年代的水平，没有超过1952年的水平，直到1979年开始农业改革为止。这就存在两个谜团：（1）现代技术如高产品种、化肥和更可靠的机灌系统应该会提高农业生产率，那么为什么尽管在60和70年代广泛使用了现代品种，对现代投入的使用也很密集，可TFP甚至还低于现代技术很难得到并很少使用的1952年曾达到的水平？（2）为什么TFP在耕作制度从家庭经营变为集体耕作的1952—1958年间增长，在1979年耕作制度从集体耕作变为家庭经营以后再次增长？

如上所述，当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政府同时把集体化视为农业发展战略加以提倡。由于农业生产的时空跨度和生物属性，有效监督农业集体组织中的劳动成本高（Lin，1988）。农业集体组织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依赖集体组织成员建立的心照不宣的自律协议，但自律协议只有当其他成员不尊重他们的承诺时，集体组织成员有权退出集体组织的情形下才能得到维持（Telser，1980）。集体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政府虽然积极鼓励农民加入集体组织，但是仍然遵循自愿原则，当集体组织不能让个体农民满意时，允许他们退出，结果自律协议在绝大多数集体组织中得以维持，农业整体绩效因集体组织存在规模经济而提高。但是，集体化运动初期的成功蕴含着内在的危机，由于集体组织成员的时间偏好、能力及其他禀赋不同，一些集体组织成员就会利用集体组织的低监督努力逃避自律协议规定的责任，结果，即使运动的整体绩效是好的，一些集体组织的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集体组织瓦解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Holmstrom，1982），它使潜在的违规者认识到尊重协议符合他的利益。但是在初期成功的鼓舞下，集体化运动热心

的政治领导者却将一些退出集体组织的成员视为运动的敌人。为了防止其他集体组织跟着瓦解，采取了强迫手段，这样集体化就由自愿的运动变成强迫的运动。在一个强迫的集体组织中，劳动激励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Lin，1988）。由于农业集体组织中的生产监督成本太昂贵而不可能有效，农民劳动激励低，农业生产率降到低于个体家庭耕作时的水平。林（Lin，1992b）的测算表明，强迫的农业集体组织的生产率比家庭农场低大约20%，麦克米兰等（McMillan et al.，1989）、樊（Fan，1991）及黄和罗泽尔（Huang and Roselle，1996）证实了林的发现。于是，尽管有现代技术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TFP仍低于50年代的水平。TFP在1952—1958年间的增长是由于在此期间退出权受到尊重，1979年后TFP也增长是因为耕作制度从强迫的集体化变为家庭耕作。

二、中国将来怎样养活自己

如表2中数据所示，虽然中国在过去45年里养活自己的能力受到高度评价，但是中国农业在1979年改革开始以前并不存在真正杰出的成就。自1979年起，主要的改革包括用家庭责任制代替生产队制度，扩大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放开除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农产品价格（Lin，1997a）。其中，实行家庭耕作制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大（Lin，1992）。在耕作制度变化之初的1979年到1984年这一变化完成期间，农业TFP和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最高（参见表2）。但是，耕作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到1984年这种影响可能已经耗竭。1984年以后，虽然TFP增长率依然明显高于改革前，但是粮食产量年增长率大大下降，1984—1996年间年均增长率只有1.55%，甚至低于1952—1978年改革开放前2.14%的年均增长率，结果1984—1996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率只有0.14%，是1952年以来的最低期。粮食生产绩效不佳主要是因为政府一直干预粮食生产和销售。由于政府已经放开了绝大多数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和销售，粮食生产不再像其他产品一样有利可图，使得农民没有足够的激励来增加粮食产量（Lin and Li，1995）。

表2　TFP、粮食、GDP和消费年均增长率

时期	农业TFP	粮食总量	人均	GDP	消费水平指数	消费水平指数	消费水平指数

					（全国）	（城市）	（农村）
1952—1996	1.51	2.52	0.77	7.7	4.5	4.7	4.0
1952—1978	-0.25	2.41	0.40	6.1	2.2	2.9	1.8
1978—1984	5.10	4.96	3.70	9.3	7.7	4.5	9.0
1984—1996	3.91	1.55	0.14	10.2	8.1	8.5	6.4

资料来源：TFP数字来自樊（Fan，1997），其他数字来自各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注：TFP是1952—1995年间数字。

农村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1978—1984年家庭责任制的成功鼓舞中国政府采取大胆措施改革整个经济，结果GDP年增长率从1978—1984年的9.3%提高到1984—1996年的10.2%，全国整体消费水平和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参见表2）。

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政府采取了渐进和增量改革的方法。中国的经验显示，这种方法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十分有效（Lin et al.，1996a）。这是因为一个经济中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是资本积累、资源配置改善和技术变迁。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每年达GDP的35%），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资源配置改善的余地很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因为存在后发优势，低成本技术赶超的余地很大。中国GDP可能会再维持20或30年近10%的年增长率（Lin et al.，1996a）。

目前中国人均营养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标准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从动物产品中摄入的营养太少（参见表3）。当然，一个人的每日饮食中有多少动物产品是由许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决定的，而不是仅由收入水平单独决定的。但是，根据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的经验判断，当中国收入增长时，对动物产品的需求也会成比例地大幅增长。这意味着，虽然随着收入增长，人均的直接粮食消费量会下降，但是由消费动物产品增加的间接需求将抵消直接消费需求的下降。另外，人口增长也会增加粮食需求。目前中国已经

有12.2亿人口，到2030年人口还要增长30%到40%，即使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中国的粮食需求也将大幅增长。可是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耕地将会由于建设房屋、道路、工厂和基础设施而减少，自1988年以来每年有190 000公顷被用于这些目的。环境退化会进一步减少可耕地数量。新的土地将被要求用于耕作，但是土质太差，比较贫瘠（World Bank，1997，p.66）。

收入增长也将增加蔬菜和水果的需求，这会与粮食竞争有限的耕地。粮食播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78年的80.3%下降到1996年的73.8%，而同期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从2.5%增长到7.7%。类似地，对水产品的需求也会减少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土地数量。

表3　人均日营养水平和来源，**1995**年

项目	中国内地		发达国家		中国香港		韩国		日本	
	总量	来自动物产品	总量	来自动物产品	总量	来自动物产品	总量	来自动物产品	总量	来自动物产品
能量(千卡)	2 741	506	3 191	861	3 285	1 048	3 268	511	2 887	596
蛋白质(克)	72	24	98	55	109	78	85	35	96	53
脂肪(克)	69	44	114	63	137	72	82	38	80	36

资料来源：FAO，FAOSTAT。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增长，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不仅土地，而且劳动、水和其他资源都将从生产粮食转向生产其他更有利可图的农业和非农业产品。最近出现了许多研究中国未来粮食需求和供给的文献（Brown，1995；Garnaut and Ma，1992；Huang et al.，1997；World Bank，1997），绝大多数研究因为有类似的人口和收入增长假定，对中国粮食需求的预测差异不大，但是对粮食供给的预测差异十分悬殊，以致对中国未来的进口粮食需求量的估计十分混乱。(6)

撇开需求问题，中国未来的粮食进口取决于中国国内能够生产多少粮食，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产量增长的技术潜力

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中水稻单产最高，也是中国惟一一个在世界上单产最高的粮食作物。1995—1997年中国水稻单产平均达6.2吨/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3.8吨/公顷高63%，仅比在波多黎各达到的世界最高水平8.3吨/公顷低25%。不过，中国实际水稻单产大约仅相当于试验田里最高单产的35%。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中，小麦单产最低，1995—1997年单产仅为3.7吨/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2.5吨/公顷高出48%，比荷兰的8.7吨/公顷低57%。中国小麦试验田单产的最高记录是13.2吨/公顷。实际单产和最高试验田单产差距达9.5吨/公顷，或相当于目前单产水平的257%。

中国1995—1997年的玉米单产是4.9吨/公顷，仅比世界平均水平4.0吨/公顷高出22.5%，只相当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到的世界最高单产18.8吨/公顷的26%。中国玉米试验田单产的最高记录是19.1吨/公顷，只是稍稍高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实际单产。(7)

观察到的中国的实际单产和世界最高单产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实际单产和中国的最高试验单产之间的差距，是对中国粮食增长潜力的两种不同衡量，我们可以得出中国仍然有很大的粮食增长潜力的结论。

2．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投资

存在于农场实际单产和试验田单产或世界最高单产之间的差距是由一些技术约束造成的。(8) 为了判断技术约束对观察到的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的实际单产和最高单产潜力之间差距的影响，1992年中国2000多位农学家和育种工作者进行了专业考察，表4列出了考察结果。

表4　技术约束

技术约束造成的单产差距(吨/公顷)	水稻	小麦	玉米
	8	9	11.5
影响因素(%)	100.0	100.0	100.0
1. 农作物特征	52.0	52.5	49.0
2. 环境条件	32.1	32.3	35.2
3. 土壤条件	7.4	6.2	6.9
4. 病虫害种子	2.2	2.4	2.7
5. 气候条件	5.3	6.6	5.2

资料来源：Lin，Justin Yifu et al.，1996b。

考察结果表明，在实际单产和最高试验田单产之间的差距中，水稻有8吨是技术约束造成的，小麦有9吨是技术约束造成的，玉米有11.5吨是技术约束造成的。农作物特质差异如植物结构、光合能力、成熟期等方面的差异有很大影响，约占技术因素造成的三大粮食作物单产损失的一半。第二大重要的技术因素是试验田和普通农田的环境条件差异如日照期、积温和湿度等方面的差异，约占技术因素造成的单产损失的三分之一。其余的单产损失是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病虫害和种子造成的（Lin et al.，1996b）。技术约束可以通过培育具备所需特性的种子和开发其他新技术加以克服，它们是提高单产的研究方向。

中国农业科研体系过去相当出色，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中国政府依靠现代技术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1961年以后，中国科研人员数量每年增长7.3%，农业科研经费每年实际增长5.7%。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科研队伍，农业科研人员取得的试验田单产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9] 中国农业科研集约度（ARI）（该指标测量的是与农业GDP相关的农业科研投资）在60年代早期是0.41，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0.24的同期平均水平，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ARI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Fan and Pardey，1997）。正由于有了这些努力，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在粮食科研的许多领域中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展望未来，中国农业科研体系已经出现若干危险的征兆。

90年代的农业科研融资政策改革成为整个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政府减少了对农业科研的财政拨款，融资从固定的支持转向竞争性资助，并鼓励科研机构将它们的技术商业化，用部分收益补贴科研活动。来自技术商业化的真实收入显著增加，但是用于补贴科研的比重远不足以弥补财政拨款的减少（Huang，1997）。[10] 新农业技术如基因工程需要大量科研投资，科研融资减少会损害中国长远的农业科研能力。

中国农业科研体系还有一个问题，即科研人员报酬低下。一个高级育种人员的薪水大约仅相当于非熟练体力劳动者的报酬。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对出色的青年学生从事高级农业科学研究起了阻碍作用，打击了许多在国外受训的天才农业科学家回国工作的积极性。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加深，这一阻碍作用会愈加严重。事实上，农业科研体系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开始流失其科研人员，1986年不包括大学的国家农业科研人员总数为232683人，到1996年仅为196708人，下降15%。[11]

3．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由于人口增长，如果比较人均标准，能够用于农业的土地和水肯定会越来越少，人口压力还会引起农业生态环境退化，包括土壤侵蚀和盐碱化，减少适于耕种的土地。培育高产并对生态环境适应性强的作物品种也许可以弥补耕地衰减。不过，采取措施保护资源基础不受侵蚀、防止水旱灾害、提高土壤肥力也十分重要。改革前，中国政府动员农业劳动力在农闲季节从事改良生态环境的活动，如改进灌溉系统、控制盐碱化、重新绿化、修筑梯田等的能力强大；实行家庭耕作制度以后，动员农村劳动力从事这些活动很困难，政府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维持、改良农业资源基础就越来越重要。

1978年末开始改革的时候，政府决定将以后各年预算中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当时的13%增长到18%，但是实际只增长了一年，1980年以后，该比重就由于农村改革成功地带动农业显著增长而急剧下降。农业在预算内基础设施投资中所占份额也有类似的变化。1985年以后，由于粮食生产停滞，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份额稍稍回升，但90年代粮食产量恢复增长后，其份额再次下降。用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1979年的最高点降到后来的只有大约一半的水平。可能是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压力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锐减，中国农业抵御洪水、干旱和其他不利气候影响的能力下降。如果政府不大大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抵消由人口压力和经济活动加强引起的生态环境压力，中国农业系统抵御不利气候影响的能力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持续、稳定地增加单产和总产量的希望就会落空。

4．农民采用新技术、保持土壤肥力的积极性

新技术为通过提高单产而不是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总产量提供了可能。但是新技术只有被农民在生产中采用时才能发挥作用。采用新技术是经济决策，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是否会采用一项新技术却取决于由此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采用新技术的成本主要由推广服务和种子生产、分配体系的完善程度决定。采用新技术的收益取决于单产提高或成本减少的程度及产品价格水平。实行家庭耕作以后，中国农民对采用技术的成本和收益更加敏感（Lin，1991c）。

改革以前，行政网络在推广新技术、方便农民得到新技术方面十分有效。有证据表明，实行家庭耕作以后，原来的推广网络瓦解了，并对采用新技术的成本产生了相反的影响（Lin，1991c）。政府收购价格对采用新技术的获利能力有很大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放开了绝大多数市场，但依然控制着国内粮食贸易，目前全部粮食销售的大约

3/4由政府购买（World Bank，1997）。政府主要关心城市消费者的福利，常常将收购价格压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仅仅当国内粮食供应威胁到食物安全的时候才会提高价格。为了增加对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激励，需要政府一方面加强技术推广网络，另一方面也要放开粮价，使生产粮食像生产其他农作物一样有利可图。

中国绝大多数农田已经连续耕作几千年，土壤肥力显然没有下降，广泛施用有机肥和绿肥对保持土壤肥力贡献巨大。不过，保持土壤肥力的措施属于一种长期投资，如果长期收益有保证，农民将有积极性实施那些措施。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实行家庭责任制的时候，集体土地出租给个体农户的租期仅为1到3年。合同期太短，不足以回收农民用于保持土壤肥力等的长期投资。政府后来为了适应需要，允许合同延长到15年，现在是30年。但现实是经常有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再分配和再配置的情况。为了提高农民保持土壤肥力并进行提高土壤肥力的投资活动的积极性，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确保农民土地合同租期的稳定可靠。

与土地类似的是维护水资源及用水权的问题。水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甚至更为稀缺，可水的使用却十分浪费。由于各级政府责任分割过于细碎及预算拨款太少，绝大多数排灌系统陈旧老化，缺乏保养。水费太低，一方面降低了农民在生产中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投资和维护灌溉系统的积极性。为了提高农民节约用水和政府公共投资的积极性，必须改革现有的低收费政策，价格必须提高到可以给予灌溉项目投资合理回报并足以维护灌溉系统运转条件的水平。

三、结　　论

中国过去成功养活自己的关键是农业科研、现代技术和家庭耕作制度。

中国政府仍然推行在国内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未来食物需求的政策（Huang，1997b）。这种政策存在成功的潜力，不过需要进行一些政策改革以挖掘这种潜力。正如约翰逊（Johnson，1994）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将来发生粮食问题，那一定是一系列政策失误造成的，不过我们确实有理由保持乐观。过去的经验显示，无论什么时候粮食生产威胁到中国的食物安全，政府都会调整政策并给予农业部门适当的支持。

如果中国政府将来放弃粮食自给自足政策，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而是恰恰相反！伴随贸易自由化，除了出口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产品，中国还可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高附加价值的食

物，就价值来说，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食物净出口国（Lu，1996），而且资源配置的改善将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和用于饮食的家庭预算，中国人民甚至会更好地养活自己。

参 考 文 献

［1］黄季焜：《浅谈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政策》，《农业技术经济》1997年第2期（1997a）。

［2］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林毅夫、沈明高和周浩：《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我国主要粮食作物育种科研的供给和需求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1996b）。

［4］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资料大全（1949～1986）》，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版。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版。

［7］Anderson, Kym, *Chan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Effects on Food，Feed，and Fibre markets*，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f OECD，1990.

［8］Ashton, Basil; Hill, Kenneth; Piazza, Alan; and Zeitx, Robin,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 pp. 613—645 Dec., 1984.

［9］Barker, Randolph and Herdt, Robert W. *The Rice Economy of Asia*，Washington, D. 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85.

［10］Brown, Lester, *Who Will Feed China？Wake 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95.

［11］Fan, Shenggen,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Vol. 73, No. 2, pp.266—275, 1991.

[12] Fan, Shenggen, and Pardy, Phillip G.,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Vol. 53, pp. 115—137, 1997.

[13] Fan, Shenggen, and Agcaoili-Sombilla, Mecedita, "Why Do Projections on China's Future Food Supply and Demand Differ?", EPTD Discussion Paper No. 22, Washington D. C.: IFPRI, 1997.

[14] Garnaut, Ross and Ma., Guonan, *Grain in China* , Australia: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992.

[15] Huang Jikun and Roaelle, Scott, "Technological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Engin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Vol. 49, pp. 337—369 , 1996.

[16] Huang Jikun and Roaelle, Scott, Mark, W., "China's Food Econom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upply, Demand, and Trade", 2020 Vision Discussion paper, No.19, Washington D. C. : IFPRI, 1997.

[17] Holmstrom, Bengt, "Moral Hazard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3, No.2, pp. 1—4.

[18] Lin, Justin Yifu,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Food Policy* , Vol. 22, No.3, pp. 201—212, 1997a.

[19] Lin, Justin Yifu, "Hybrid Rice Innovation: A study of Market Demand 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74, No.1, pp.14—20, 1992.

[20]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98, No.6, pp.1228—1252, 1990.

[21] Lin, Justin Yifu,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Vol.36, No.4, pp. S199

—S224, 1988.

[22] Lin, Justin Yifu and Li, Zhou, "Current Issues in China's Rural Area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 Vol.11, No.4, pp.85—96, 1995.

[23] Malory, Water, *China* : *Land of Famine* ,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24] McMillan, John, Whalley, John, and Zhu, Lij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97, pp. 781—807, 1989.

[25] Telser, Lester G., "A Theory of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 Vol.53, No. 1, pp.27—41, 1980.

[26] Wen, Guanzhong Jam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 1952—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Vol.42, No.1, pp.1—41, 1993.

---

(1) 本文系根据作者1998年1月在“国际小麦和玉米研究中心（墨西哥城）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文中使用了黄季焜未出版的作品和数据，特致谢意，也感谢助研阎伟。（通查）后来，本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2)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统计摘要》。

(3)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耕地面积数据是9600万公顷，一般认为官方数据将实际耕地面积低估了30%，最近的农业普查证实了这一猜测。中国政府将来公布普查结果时会把这一数据修改为1.2亿公顷。

(4) 除了粮食，食用油、猪肉和食糖也被包括在配给之内。

(5) 已经有许多人尝试解释这场危机，对粮食产量突然减少的传统假说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和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管理不善，以及由人民公社规模过大难以控制引起的激励问题。林（Lin，1990）发现实证资料没有支持传统假说，并提出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剥夺了农民退出集体组织的权力。组织形式的这一转变改变了对农民的激励结构，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率。进一步的讨论放在本部分的后面。林和杨（Lin and Yang，1997）也发现大饥荒年代粮食分配的城市偏向远比食物供应状况对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横断面差异更有解释力。

(6) 布朗估计203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2.07—3.69亿吨粮食，他认为这会买断世界市场供给，强迫粮价上涨，将其他低收入国家挤出世界粮食市场。然而，他的预言建立在曲解数据资料和错误假定的基础之上。布朗的预测在中国和世界都激起舆论和社会各界对这些问题的广泛关注、了解，不过，他的研究经不起学术检验，可以不予理睬（Alexandratos，1996）。

(7) 1995—1997年平均产量数据来自FAO的FAOSTAT，最高试验田单产数据来自Lin etal.（1996b）。

(8) 不是所有的单产差距都可以归因于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如选种、施肥和排灌的时间选择也会影响实际单产和最高单产之间的差距。

(9) 应该承认，中国农业科研人员中仅有5%—6%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队伍中这一比重却达60%—70%（Fan and Pardey，1997）。

(10) 实际上中国80年代的ARI已经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四分之一，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ARI大大增加（Fan and Pardey，1997）。

(11) 科研人员数字由黄季焜提供。

再与布朗谈粮食 (1)

——对布朗就世界粮食最高单产水平和中国粮食生产潜力观点的评论

中国人口在1997年是12136亿，到2030年将达16—18亿，比现在增长1/3至1/2，基本粮食需求随之大致同比增长。中国经济预计在2030年前将保持8%—10%的年均增长率，到2030年，国民经济的规模可比现在增长大约8倍，人民收入的增长会引起膳食结构的改善，对动物食品的需求必将导致饲料用粮大幅度增长。中国粮食总需求的增长预计会比人口增长快。但是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差，耕地面积长期以来一直呈减少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6年末耕地面积只有9497万公顷，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耕地还会进一步减少。1994年，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主要根据中国的这种农业禀赋和粮食需求前景提出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下个世纪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布朗先生最近在北京举办的一次中国粮食前景国际研讨会上，再次对21世纪中国养活自己的能力提出质疑。除了上面所列的人口和自然禀赋理由外，他这次又强调了技术原因。因为中国能否养活自己的关键在于粮食单产能否提高，如果能，就会抵消或减轻耕地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中国仍有可能养活自己。一般说来，提高单产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加农业投入，但是如果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会起作用，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会下降，农业投入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变得不可行。提高单产的另一个途径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现有农业资源的生产力。本世纪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单产提高，6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

增产，依靠的主要也是这个途径。

但是，布朗先生对技术进步很悲观。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上粮食高产国家的单产水平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并据此推断世界粮食最高单产已经达到粮食作物的生物极限，难以再有大的提高。布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既然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现在已经十分接近世界高产国家的单产水平，那么中国依靠提高单产增加粮食总产量的想法就很不现实，下个世纪中国将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和生产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存在2—4亿吨缺口，要靠进口来满足。

布朗先生的上述观点看似有理，其实不然。首先，根据最新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中国耕地面积长期被低估，实际耕地面积为112亿公顷左右，因此中国粮食单产与世界粮食高产国家的单产水平之间仍有一定差距。当然，为了满足2030年的粮食需求，中国粮食单产仍然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0%以上。如果目前粮食高产国家的单产水平是粮食作物生物极限的话，布朗先生的预言或迟或早就会变为现实。但是，高产国家的粮食单产真的已达到粮食作物的生物极限了吗？单产的进一步提高已不可能了吗？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产国家粮食单产提高缓慢是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粮食单产已达农作物的生物极限。世界上的粮食高产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对粮食价格采取保护政策，政府支持的粮价一般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粮食生产过剩，只好由政府出面收购或提供价格、仓储、休耕等补贴，构成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负担。由于农业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通过专利制度加以保护，各国农业科研活动也大多由政府财政支持。发达国家因为粮食过剩和沉重的财政包袱，政府自然不愿支持以提高粮食单产为目的的科研活动。由于缺乏此方面必要的科研投入，发达国家粮食单产自然提高缓慢。所以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粮食最高单产水平的徘徊是发达国家政府主动的政策选择所致。如果将来世界发生粮食短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发达国家政府不必再对粮食生产进行价格补贴，财政包袱解除，它们就会有积极性增加用于提高粮食单产的农业科研投入。只要科研投入有保证，发达国家的粮食单产水平就会继续提高，这在技术上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就中国而言，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自然不能坐等发达国家提高单产水平后再来提高自己的单产水平。实际上自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中国的粮食科研就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且在许多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浙江省水稻品

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而中国在1964年就开发并推广了同类品种，并且于1976年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直到90年代，中国仍是世界上惟一大面积生产杂交水稻的国家。最近，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正在作杂交水稻由三系向二系过渡的研究。可以说，现代生物技术为中国和世界未来粮食单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描绘出了极为光明的前景。布朗先生对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持悲观论调的另一个理由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作物光合作用效率并未提高，他认为在不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情况下，要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十分困难。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根据笔者1991—1994年进行的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列研究表明，我国在试验田已达到的最高单产水平大约为大田粮食平均单产水平的1.15—3.15倍。也就是说，即使光合作用效率保持不变，中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依然很大。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我们以此为目标，并假定2030年之前人口年均增长率不超过80年代年均1.48%的水平，那么中国仅仅通过挖掘现有最高单产水平下的粮食单产潜力，把大田粮食的平均单产水平提高，就能够在下个世纪成功地养活自己。

前面的分析表明，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在21世纪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但是从经济合理性考虑，中国最佳的策略可能不是达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中国恰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从经济合理性来说，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种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然后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才能改进我们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这样做，不会像布朗先生预言的那样“使世界挨饿”，因为世界粮食增产潜力并不是如他所说已经耗尽，中国粮食进口增加只会引致世界粮食产量的相应增加。到那时，中国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中国人民的收入将大大高于目前水平，中国不但能够养活自己，而且中国人民还会吃得更好。

---

(1) 本文发表于《中国改革》1998年第8期。

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 [1]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于25年前的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1978—1984年间，中国农业产量年均增长高达7.7%，农民的收入也获得了年均13.4%的快速增长，这些成就为1985年开始的向城市工业企业推进的第二阶段市场导向改革提供了信心。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9.3%，2002年中国的GDP按可比价格计算，为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8.5倍，中国是这25年中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长期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案例之一。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去年中共中央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国各界有一个共识：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建设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到要将中国的农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问题是中国当前最需要解决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一般论述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并提，但是农业的问题其实不是很大。过去25年中，农业生产每年增长速度达到6%，就是在大家认为“三农”问题非常严重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1997年—2002年），中国农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5.7%。一般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比人口增长高一个百分点就是不错的成绩，中国农业生产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国内、国外的农业发展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农村问题指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负担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农民负担的加重，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引起的。所以，大家关心的“三农”问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核心其实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长期、持续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关于加入WTO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国内外有很多讨论。有些观点很悲观，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是一个悲剧。得出这样观点的论据如下：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1.5亩，一个农场的规模只有6—7亩，也就是1英亩左右，但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一个农场的规模通常有200—300英亩，因此，认为中国的农民无法用1英亩的土地去和拥有几百英亩土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民竞争。不仅如此，中国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很低，技术、机械化程度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学者就此认为，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村将会出现大量破产的农民。这样的一个判断

又似乎为政治的渲染所证实。例如，在中国和WTO的各成员国谈判加入WTO的协议时，最艰难的谈判之一就是农业问题。中国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时，中国附带要求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项附带条件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克林顿总统将相关法案提交给国会讨论时宣称，在中美的农业谈判中，美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从冷战的思维来看，谈判的一方取得很大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受到很大的损失，美方的宣传更加深了许多人对中国的农业加入WTO以后的悲观看法。

当然在加入WTO以前的讨论中，也有乐观的观点。尤其是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普遍是比较乐观的。诚然，中国的人均耕地非常少，但是反过来说，在每块土地上的劳动力就非常的多。农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农产品加工品等。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方面，中国是缺少比较优势，如果没有贸易障碍，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会进口越来越多的土地密集型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但是，加入WTO以后，贸易关系比较正常，出口的渠道比较畅通，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的出口也会增加，这会有利于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中国加入WTO已经一年多了，最近两年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乐观者的判断。比如说，2002年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和2001年相比增加了13%，从2001年的119亿美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135亿美元。进口也有增加，但是非常少，只增加了2.1%，从2001年的99.8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亿美元。出口增加较快的农产品主要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等。

按理说，加入WTO以后，中国允许进口粮食，粮食的进口也应该相应增加。但是，一方面中国国内这几年粮食生产过剩，所以进口的意愿小。另一方面，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粮食产量减产，国际粮价上升，高于国内的粮食价格，中国自然不会进口粮食，而且，玉米还增加了出口。

由于中国已经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因此，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必须放在WTO的框架下来考虑。

如上所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目前国内的学术界和决策界有比较大的共识：要长期、持续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关键在于将目前还占全国总人口72.6%的农业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以后，剩下的劳动力还需要着手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低附加值、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转向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蔬菜、水果等的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加入WTO会给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三方面带来哪些机遇，或者需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让这三方面得到更好的实现？

首先，加入WTO后，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整合。中国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会降低或取消。外国的产品更容易进入到中国市场。同样的，WTO的各成员国也会取消对中国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会比较好地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的优势是劳动力丰富，素质高，价格便宜。劳动力密集的产品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入WTO给我国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能更快地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在这一点上，加入WTO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加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

加入WTO对于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也会有帮助。加入WTO以后，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技术，包括种子和机器设备更容易进入中国。中国的粮食科研在国际上属于前列，但是在蔬菜、水果、畜产品等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方面则和国际有很大的差距。加入WTO让中国的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上现有的优良技术，提高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助于农民的收入的增长。

最后，加入WTO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到底有什么影响？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入WTO以后如果没有贸易的障碍，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上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保持年均7%—8%的增长速度，中国在粮食生产上将会越来越没有比较优势，需要进口的粮食会越来越多。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怎样让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能够顺利地出口，将来随着经济的增长让更多的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能够顺利地进口。

就上述这一点来说，单单加入WTO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上设立了各种政策障碍。正在举行的多哈回合的谈判给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尽快取消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保护。如果能够成功，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机会就会大很多，中国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的机会就会增加。

中国希望多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则希望将土地密集型的粮食出口到中国来，目前的主要障碍是各国都有的粮食安全的考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对资源配置的改善、经济的增长，甚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都有好处。但是，有些出口大国常以粮食作为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各个国家都不愿意自己的粮食安全被其他国家控制，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也就不能也不愿意大量进口粮食。所以，利用这次讨论会，向澳大利亚来的学者和朋友提一个建议：国际上，在生化武器方面有《禁用生化武器条约》，在核武器上有《核不扩散条约》，因此，建议澳大利亚的朋友在国际上倡议达成禁止将粮食作为武器的协议。如果这一协议能够达成的话，中国的粮食进口数量将会大量地增加，而其他土地比较稀缺的国家进口粮食的数量也会大量地增加，这对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世界各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3年第67期。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经济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但是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却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一、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韩国、台湾地区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差强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发现，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状况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政策最终会在多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下面将予以详细阐述。

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对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使收入分配趋于恶化：

首先，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那么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尽管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则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上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的比例，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对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以外，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降低，从而会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所差异。而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按照管制的低价进行资源的地区间转移，其后果必然是获得扶持的资源输入地区的发展水平高过资源输出地区。而且赶超的力度越大、优先发展的部门增长越快，则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

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第四，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正问题恶化。

笔者根据1970—1992年期间36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赶超战略的确会使收入分配问题恶化。(2)

三、结　　论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需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进一步，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够给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从而使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也能够均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2年第37期。

(2) 详细的分析结果可以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2007。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 (1)

——评世界银行新的“惠及贫困人口的农村发展战略”

首先，请允许我向世界银行表示祝贺。我的致贺不在于世界银行已经为大家提供了一份新的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而是在于世界银行不仅勇敢地承认了它以前提出的农村发展战略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在努力探索新的农村发展战略。这种勇气在世界性组织或政府机构中是不多见的。

此次咨询会议旨在提高世界银行提出的新农村发展战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作为咨询专家，为了达到此次会议的目的，请容我直言不讳：这一新战略虽然已经从旧战略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在我看来，这一新战略很可能重蹈旧战略的覆辙。

一个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发展战略要成功，我认为首先应该了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特点、其生产的特性以及他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把有关政策措施建立在这些特性上，这个发展战略才有成功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可能性。

农村贫困人口的特点，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拥有的最为重要的资产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所在。不管穷人、富人，每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对于富人来讲，除了劳动力之外，他们还拥有一些其他的资产，如土地、资本、良好的教育、人际关系、政经网络等。但是，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产。因此，除非我们能使他们拥有的劳动力在农村变得相对稀缺，因而具有相对高的价值，否则就不可能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地位。

第二，农村贫困人口仍然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上，自然灾害、疾病、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突发冲击都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正因为他们的生活仅仅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每天只能关心一日三餐如何为继，对政治问题他们通常冷漠，而且缺乏影响力。因此，各国政府通常会漠视贫困农民的需求，政府的政策一般有很强的城市偏向，公共

投资的重点是城市。

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也有自身的特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主要是和食品有关的种植业。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由于收入弹性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增加农产品的需求的刺激作用不大。而且，个别农户的增产固然可以增加该农户的收入，但多数农户的同时增产，在农产品价格弹性低的特性下，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

过去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农村发展战略把重点放在增加农业的生产能力上面，通过贷款和援助鼓励各国政府加大对农村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并直接设立近20个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如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墨西哥的国际小麦和玉米改良中心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良作物品种。然而在城市偏向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经常只是为了得到贷款或是援助而表面敷衍，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即使各国政府认真地按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制定的发展战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推广优良品种等等，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在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低的影响下，农民也经常遭遇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贫困的问题继续存在。

在我看来，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必须把重点放在减少农村劳动力上。当农村劳动力减少，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就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这样，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和相对价值就会增加，以劳动力为最主要资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也就会相应提高。同时，当务农劳动力变为非农劳动力，他们就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导致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内移而需求曲线外移，农产品的价格随之上升，务农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和工资也会相应上升，这样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就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减少而不断上升。此外，减少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还能缓解人口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还必须使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在城市非农产业部门能够找到工作，否则，只是把农村贫困人口变为城市无业的贫困人口，整个社会的福利并不增加。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印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拉美和其他一些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产业资金非常密集，投资巨大，需要的劳动力很少，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农村劳动力。而且这些产业不是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无法存活。政府必须向他们提供许多政策优惠，如低息贷款、市场垄断等等。其结果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是政府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将大量的贫困人口滞留在农村，改革前的中国就是如此。第二种情况是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可是由于城市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就转变为城市贫困人口。

同时，不具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不断的资金的投入，发展中国家用完国内的资金后，可能会依靠国外的资金再维持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产业不具国际竞争力，无法赚取足够的外汇来还本付息，当他们必须偿还外汇借款时，就会出现金融、货币危机。而且，因为国内优先发展起来的产业不具比较优势，而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缺乏资金得不到充分发展，此时，如果他们被迫打开国门，实行完全开放，危机就会爆发。当危机发生时，贫困人口，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总是受害最大的一群。所以，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也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我们应该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战略。

我认为，一国政府应该优先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为如果政府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那么企业就会具有自生能力，无需靠政府的各种政策性优惠或行政性垄断保护来生存，寻租、贪污腐化的行为就会失去存在的土壤，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大大地提高。同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是其相对丰富的资源，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比较优势。发展这类企业不仅能够向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吸纳大量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使得减少农村人口成为可能。由于这些企业有良好的竞争力，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因此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这一战略还会有助于该国成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如果国内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就会给该国带来好处。

不幸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推行的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说新的战略是正确的话，应该如何实现由旧战略向新战略的转变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传统发展战略向新的发展模式的过渡有两种形式：一是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休克疗法，二是中国和越南推行的渐进式改革。从实证的经验来看，后者比前者成功得多，国际学术界和发展机构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改革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单轨制（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控制）到双轨制（部分经济由国家控制，部分经济由市场调节），再由双轨制逐步收敛到新的单轨制（市场轨）上来。这种过渡是如何实现的呢？中国政府允许非国有制经济通过自身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国有制经济的发

展是建立在中国的比较优势上面的，因此他们非常有竞争力，由此创造出许多新的资源，可以用来补偿体制转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这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够一方面维持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取得快速增长的原因。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世界银行的这一个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应该对经济总体的发展战略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在这份草稿中有整整一页是讨论经济总体政策环境的，但是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不仅应该将农村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加以思考，而且还应该实行一个正确的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采取的都是旧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此在这一研究报告中也应该更加重视新老战略的衔接，提出旧战略如何有效地向新战略过渡的具体建议。其次，因为农村发展的核心是减少农村人口，所以应该重视劳动力的转移，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了提高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应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再次，世界银行应该更加重视救灾工作及对受灾人口的救助工作。这是因为，在过渡时期，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仍然维持在最低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上，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最后，当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出来，非农部门人口的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传统农村发展战略中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目标的各项措施也就变得有意义了。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2年第12期（总第299期）。

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 (1)

会议主持者要我谈谈当前经济形势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问题。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三个问题：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平均每年达到9.3%，23年间国民经济翻了三番。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反贫困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二，为什么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改革。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方向。

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快，为什么城市贫困问题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想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前通货紧缩形势的影响。我国的“通货紧缩”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8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下降了2.6%，1999年物价下降了3.0%，2000年下降了1.5%，2001年下降了0.8%，2002年前6个月物价下降速度达到1.6%，经过这几个月努力，到10月份时，物价与去年相比还是下降了0.8%。这期间，中国政府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每年增发特殊公债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以启动投资需求，五年来共增发了8100亿建设公债；同时还实施了提高公务人员工资、推行假日经济等等措施，以增加消费需求。但为什么通货紧缩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其实这与“八五”期间连续几年的投资热潮有关。1980年到1985年社会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9.5%，1986年到1990年社会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6.5%。到了“八五”时期，即从1991年到1995年，社会投资平均每年增长36.5%，比过去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增加了20个百分点。衡量社会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固定资产的净值。1995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比1990年增加了173%，在这个时期非国有企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比国有企业还快。在这五年之内，生产能力至少增加了200%，但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只增长了大约50%左右。中国经济突然从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短缺经济转变为一个全面过剩的经济。目前社会上有政府部门调查的600多项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形。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由此造成投资下降，新增的就业机会减少。“十五计划”这几年，城市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达800万，新增就业机会少，不少学生毕业后就加入失业的大军。而且，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状况不好，有些企业面临破产，已经就业的人还可能面临失业。所以这几年城市里失业造成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

第二，“三农”问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的成功加强了中国政府在城市改革的信心。但是最近“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成了社会上的一个热点话题。其实这是不大确切的。农业并不危险，改革开放23年来，农业每年的增长率是6%。就是大家认为“三农”问题很严重的90年代末，农业的增长速度也达到

5.7%。研究农业经济学的人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多一个百分点或维持3%增长率的话就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农业本身并没问题。农村真苦、农民真穷，这倒是真的。背后的原因是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就越来越凸现出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的一般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今年年初的时候，世界银行对50年来世界银行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了一个总结性回顾，请我作评论。在评论里，我说，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成功，原因是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很低，如果因为农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改进而增产的话，农产品肯定会增收很多，但这样会出现我们传统上的“谷贱伤农”的现象。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惟一可长期持续的办法是大量减少农民，理论分析和外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支持这一点。我国除了在1978到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加靠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外，1985年之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还是减少农民人口。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则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机会。但由于这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被阻塞，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然也包括农村。江主席在十六大报告里把减少农村劳动力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战略思想。如果要让农民的收入有比较合理的增长的话，在十五计划期间，必须每年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在城里就业的机会。这样，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也给城市里的贫困问题的解决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三，和加入WTO后面对的新形势有关。加入WTO是我国政府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措施，从长期发展来讲，加入WTO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肯定有好处。WTO的基本精神是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按我国政府同WTO达成的协议，所有的承诺要在3到5年内全部落实，届时我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产业除了还有14%的关税保护外，必须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全面和外国的企业竞争。固然，我国的经济未必会经受很大的冲击，尤其对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如此。但也不可否认，我国有一些没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里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非常低，过去它靠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垄断和政府用各种压低资

金价格、压低工资的政策扶持来生存。加入WTO之后，市场必须开放，对外国企业必须实行国民待遇，这种特殊的保护是违反WTO原则的。为了迎接WTO所带来的竞争，必须加速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里有许多冗员，减少冗员是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而释放出来的冗员，如果不能再就业，就变成了失业人群。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虽然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非常好，但是，城市失业和贫困人群在近几年的增长趋势也是非常严峻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问题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解决，没有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有必要按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来改革，原因如下：

首先，有许多需要保障、救济的人并没有工作单位。比如新增的劳动力，因为缺乏就业机会在没有找到工作前就失业；再如进城的农民工，如果失业，也不会有工作单位来照顾他们。其次，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即使可以由各个单位来负责解决，这种方式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如果由各个单位来负责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这些单位会把这些保障和救济当作是一种额外的社会性负担。各个企、事业单位需要保障、救济的人数不一样，成本负担不一样，在市场上就不会是公平的竞争。目前许多单位的社会保障和救济，是由政府过去的投资、用人政策造成的，企业会把这种负担当作是一种政策性负担，由此造成的亏损是政策性亏损，政府对政策性亏损负有责任，因此，就必须给予企业各种政策性优惠和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分清楚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和由于企业经营不善或经理人员多吃、多拿所造成的经营型亏损，只好把企业的所有亏损都背下来，形成了经济学上讲的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有预算软约束，企业可以以政策性负担为由向政府要优惠、要补贴，而政府又无法逃脱给予企业优惠、补贴的责任的情况下，对企业的任何公司治理的改革都不会有效。

为了给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出现的没有工作单位的失业人群必要的保障、救济，也为了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必要改革传统的由各个单位自行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体制，建立一套独立于企业之外，由一个专门系统来负责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

关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应该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建立的问题，我只谈两点看法：

第一，要处理好“救急”和“救贫”的关系。“救急”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救贫”则属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范畴。我个人认为，在新的城市反贫困社会工作体系的建立方面，要以“救急”为主，“救贫”为辅。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以“救贫”为主，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会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有不少国家因此而出现了财政危机。如果我国未来的城市反贫困工作以救贫为主，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政府只能是加税，或是多发票子。税加多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会下降，新增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失业的人反而会增多，需要保障的人就会更多，只好进一步提高税率。这样会形成税率提高，需要保障的人增加，税率再进一步提高的恶性循环。如果不提高税率，财政出现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就必须多发票子，从而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实际上也是一种税，通货膨胀税对于失业后拿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和已经退休拿退休金生活的人的伤害，远大于对还在工作、有正常工资的人的伤害，而前两者正是社会保障体系所要保障的人。所以，救贫的工作只能把最低生活保障线定得很低，并且以特定的失掉工作能力的人群为保障对象。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群，只能以救急为主，在他们因病、因为企业破产或减员而失业时，给予短期的救济。中国有一句古话“救急不救贫”，道理就在于此。对“贫”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最好是多创造就业机会，给有工作能力的人最大的工作机会。

第二，在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的建立及其改革当中，资金的来源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一定的政策保证。但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怎样来甄别需要救济和保障的人。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真正得到救济和保障好处的人，经常不是需要救济、救助的人，真正需要救济、救助的人反而求助无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再多的钱也于事无补。做好甄别工作，不能只靠立法，或寄望于行政体系的清廉，需要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在民政部提出的《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主题报告》中，没有讨论到怎样解决甄别的问题。建议将来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些试点或展开一些研究。

江泽民主席在十六大报告里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未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2000年相比翻两番的目标，应该不难达到。但是，只有把贫困人口减到最少，使因失掉工作能力、因病、因残、因变换工作而暂时失业的人能够得到救助，才是真正落实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解决好城市、农村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1) 本文原为我在2002年12月12日民政部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上所作的发言，后整理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政策性研究简报》2003年第1期。

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 (1)

一、世界贫困的现况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世界人口大约有60亿。如果把贫困线定在每天每人两美元的标准，全世界还有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全世界47%的人是贫困人口。即使把标准降低到一天一美元，那么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也还有12亿贫困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0%。由于贫困，在低收入国家有很多儿童营养不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低收入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有50%营养不良；由于营养不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有20%活不到5岁。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并且，产生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因为实际上现代的社会是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问题的。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在公元1000年到1820年期间，全世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每年只有0.05%。但是工业革命使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提高，从1820年到1998年这将近180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前800年比较起来提高了24倍，达到1.21%。从公元1000年到1820年这820年间人均收入只提高50%；可是，从1820年到1998年这17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8.6倍。以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贫穷和营养的问题。

但是，现在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上的好处并不是在全世界人口中平均分配。同样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把1960年，也就是40年前的20个最富有的OECD国家同20个最贫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作对比，最富有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的18倍；但到了2000年，这个差距增加到37倍。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贫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很慢，甚至恶化，以至于全世界有20%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还不到的状态，全世界贫穷国家的儿童有50%是营养不良的，有20%的寿命

不到5岁。

二、中国扶贫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25年的经验给全世界减少贫困的前景带来了一束曙光。在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5亿，占当时全部人口的25%，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占农村人口的30.7%。但是1978年开始，农村从集体生产转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市场在农村地区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源的配置得到改善；同时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到了1985年的时候，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1.2亿。1985年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继续加快，出现了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给农村1亿多个劳动力提供了非农的就业机会；从90年代开始，许多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出现了近1亿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加上中国政府从80年代中开始实施的专项扶贫计划，到1993年时，中国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降到8000万。1994年中国政府分析当时贫困的状况，提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增加了对农民和贫困地区的投入，到2002年时，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2820万。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2.2亿。可以说，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减贫经验很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研究和借鉴。

三、中国减贫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虽然在减贫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今天会议的主题“贫困，增长，平等”在中国也还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在减贫问题上面临着六个新的挑战。第一，展望未来，减少贫困人口会越来越难。从1978年到1990年的这12年间，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8500万，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但是从1990年到2000年，即使政府投入很大力量，市场化的改革也在向前推进，中国的贫困人口只从8500降低到3200万，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500万，为前面10年的一半；2001年，贫困人口只减少270万；2002年贫困人口只减少110万，总数为2820万；2003年贫困人口则又增加了80万。中国现在还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按照目前这样的速度，完全消除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现在贫困人15非常分散。按总人口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到3%，可是这些人并不集中，即使在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所谓的贫困县，贫困人口也不过就是全县人口的9%。这2900万贫困人口分散在全国各地，给政府采取强有效措施增加了难度。第三，虽然已经有2.2亿人口脱贫，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只要发生疾病或是自然灾害，就会有大量的人口回复到贫困的状态。第四，中国在过去减贫的努力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定的标准

较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每人一美元的标准，那么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在1亿左右，这是相当大的数字。第五，固然每个人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收入、生活、健康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2.4比1，现在是3.1比1，可见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没有达到“贫困，增长，平等”中的“平等”这个目标。第六，贫困人口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限于农村，城市里面也出现了一群新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政府的统计，目前在城市领取政府最低的生活保障的人口有2180万，占城市人口的4.5%。

四、达到减贫、增长和公平目标的政策

上述六点是中国在减贫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怎样来应对这些挑战？减少贫困人口最重要的是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贫困人口的特性是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力来创造收入，所以只有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才有希望真正减少贫困。要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第一，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扶持劳动密集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二，要让贫困人口有能力去掌握这个机会。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农村人口除非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不然就很难适应城市里面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进入到城市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技术结构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必须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才能够适应工作的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机会。第三，进入到城市以后，面对的是市场环境，市场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可能面临失业，面临重新就业的压力，这种市场的风险也同样要有较高人力资本才能够应付。所以，要减少贫困，除了要增加工作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现在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这样才能够真正让农村里的贫困人口用自己的劳动力来减少贫困。当然，人口当中总会有一群人是没有工作能力的，包括孤儿、老人和因病、因残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及在很偏僻的、市场经济达不到的地方的人口，这部分人口要度过贫困的难关，就必须要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帮忙，这样他们才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对于减少贫困的努力，中国在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谓“全面”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现在处于贫困的人口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今年中国政府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把发展的目标定为“以人为本”，提出“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只有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才能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实现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新战略指导下，相信在21世纪，中国减贫工作应可以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为世界再创造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

(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4年第12期（总第428期）。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近年来撰写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30余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发展战略、技术进步、体制变革、对外开放、产业政策、农村发展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反映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本书中，作者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这一统一的逻辑框架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纷繁复杂而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和借鉴性的重要政策建议。